

WOMAN & MAN

Gendered Nation(s):
Sexuality, Capital and Culture

25

不同國女人

性 / 別、資本與文化

何春蕤◎著

女性身體自主權如果不要淪為一句空話，
就不能止於「我們不要」什麼，
而要更具體的說出「我們要」什麼。

—何春蕤

自序

在我們的社會中，女人活在一個次等的國度裏。她們在恐懼中成長，在壓抑中形成自我，在受教育的路上坎坷，在就業工作的過程中挫折。

不管人家怎麼說「命運共同體」，說「我們是一國的」，女人的切身經驗告訴她，她是不同國的，因為她所受到的對待和期望是不同於男人的。

因此，不同國的女人看她周圍的世界時，是用不同國的眼光來看的。她看到的不是主流的、男性的觀點所關心的，相反的，她看到的是不同的國度，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世界圖像。

可是，不同國的女人本身也不見得是同一國的。她們占據著不同的位置，有著不同的經驗，擁抱著不同的慾望和夢想，她們甚至可能有矛盾的、混雜的利益與前景。

這本書可以算是對這兩種意義的不同國女人的呈現。

這本書的副標題相當程度反映了我個人寫作的思考主軸。「性別」一直是我的中心關切，但是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集中在「性」與「別」之間的可能辯證關係，而這個關係對我而言是時刻糾纏在資本（我們社會日前的主導推動力量）和文化（我們之所以變成我們現狀的這個形成過程）上的，我的

寫作則企圖由各個角度和層面來探究其中的共謀關係以及抗拒的策略。

我從一九八三年開始發表文章，這之中除了學術性的論文、神學評論、文學批評，甚至食譜外，還寫了不少社會文化評論，現在我從後者中挑選出一些自認尚值一讀，而且不和我其他書的內容重疊的文章，集結成書。除了數篇文章外，木書中的文章絕大部分在島內外各種媒體上發表過；為了使這些文章不受寫作當時的時空脈絡限制，在編選的過程中我也對部分文章做了相當幅度的修改，以使這本社會文化評論集更能貼緊現實。

我的「性解放」理論在我另一本書《豪爽女人》（皇冠，一九九四）中已有完整的呈現，現在本書的「女性情慾」篇（第一章及第二章）則偏重對性文化現象的解讀與批評。第一篇「男男女女」（第三到第七章）思考的是我們文化中對兩性的社會角色所做的規範，我希望能呈現邊緣的、壓抑的聲音，來挑戰現存的價值觀念與實踐。第三篇題為「資本主義、性別與國家」（第八到第十一章），它所呈現的是資本主義發展以及國族－國家機器－我認為眼下形塑我們社會的兩大主要力量－如何作用在和性別相關的議題上。第四篇「文化・教育」（第十二到第十六章）則更細緻的來觀察我們的社會文化及教育在各種力量衝擊下所呈現的顯著問題，這些問題很根深柢固的影響我們的未來生活世界及態度，因此做為本書的收尾。

這些篇章在某一定程度上呈現了我自己的知識揉合。對我的世界觀和現實感影響深遠的當然是求學過程中遭遇到的弗洛伊德諸多心理分析著作，以及馬克思的許多經典著作（特別是他的《資本論》），它們給了我一雙全新的眼睛來理解周遭的事物，也構成了我研究本身學術專業（文學理論與文化研

究)的基本思路，充分肥沃了我對各種現象的分析與批判。

在這麼多年的社會文化評論寫作過程中，我曾經受到許多朋友不同程度的支持與鞭策，我無法在此一一列名致意。幾位編輯兼熟友在這些文章的催生及發表上幫忙甚大。他／她們是楊澤（最早在美洲中國時報，後來則在中時人間版）、劉克襄和顧秀賢（自立早報）及莫昭平和蔡珠兒（中時文化觀察版）。蔡建仁先生對我早期關於社會文化方面的想法頗有啟發。卡維波先生也一直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另外，我在中壢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各行各業識與不識的人們，更是我寫作社會文化評論素材的源頭活水，我的不少文章甚至是直接和她／他們相關的。在此，我謹懷著一顆感謝的心，祝福她／他們。

目次

自序

□女性情慾篇

第一章 情慾解放……………

- 性探索 014
- 誰來說「性」 019
- 性，不危險 022
- 打破處女情結 027
- 女身女性 030
- 性感的女人 033
- 新女「性」三則 035
- 性解放的政治（卡維波） 039
- 女性解放是反對勢力的重要環節 050

第二章 情慾自主……………

- 前言 054
- 情慾人權 056
- 性解放教育從小開始 058
- 臺灣情慾文化的貧瘠 060
- 大聲說我要 062
- 我們女童 065
- 陳淑樺・陶晶瑩・性 067

□男男女女篇

第三章 家庭主婦／母親…… 不一「偉大」的母親，萬歲！ 074 懶女人 077

脫軌的女人 079 一餐一菜 081 私房錢 083

袋鼠媽媽喊救命——何春蕤 & 朱天心 085

第四章 同性戀…… 同性戀拒服役 090 異性戀霸權退出校園、媒體 092

假開明與同性戀 094 阿比阿弟的秘密 096

第五章 婚姻…… 一面倒的專家 102 試婚 105 不婚 107

解「毒」婚姻 110 為什麼妳應該同居而不結婚 112

第六章 愛情…… 速食愛情其實很快樂 116 不再與青蛙接吻 120

天長地久 122 分手總在當兵後 124

第七章 女人・男人…… 女人好吃？ 128 男人好色？（卡維波） 133

〈何德何能〉的兩性狂想 135 星期五的男人 139

「星期五」與善良風俗 142 女廁 144

□資本主義、性別與國家篇

第八章 專業與性別……………為什麼大廚都是男人 152 專業與性別 154

專業的積累 156 穿什麼上班 158 中年就業 160

電話簿與專業主義 162

第九章 資本……………想要飯碗就少吃飯 166 誰的智慧？誰的財產？ 171

論自主消費 174 環保必須控制資本 183

第十章 階級……………鄉鎮公車族 186 金錢與性 188 讓勞工說自己的故事 190

弱勢者沒有私有財產權 194

第十一章 國家……………「激情」過後 198 大爺受辱記 200 選舉 202

我們沒有（國）家 206 知識／權力：誰在養小孩？ 210

反社會主義還是反國家崇拜？ 212

□文化、教育篇

第十二章 文化觀察……………原鄉不遠 220 什麼人唱什麼歌 222 臺灣漢堡 225

司迪麥與豬哥亮 228 天堂一瞥，邪教烏托邦 231

第十三章 電視媒體……………誰怕大陸女星 236 為何檢查電視？誰在檢查？ 238

金泡的幻滅 242

第十四章 生活環境……………今天別呼吸 248 無車階級的權益 250

馬路如虎口，行人沒處走 252 核電異形 254 吹哨人 256

第十五章 教育……………誰與成年人立約？ 260 學生上電視 262

無教有類 264 校園民主 267 罷教也是一種再教育 270
惡雨將落 272 灌水書 275 談人文主義 277

第十六章 解放師生戀……………師生倫理死了？埋了它！ 282 解放師生戀 285 師生戀 288

附 錄……………文章出處索引

女性情慾
篇

第一章

情慾解放

性探索

——多做少說的七〇年代

不管父母師長或輔導專家們如何苦口婆心地勸告我們的青少年：「性是一件既自然又美好的事情」、「性是一件你找到終生的伴侶才可以做的事情」、「性是兩個人之間非常嚴肅神聖的活動」、「性是包含著義務與責任的享受」；不管成年人以多麼急迫緊張的眼神和語調細數，多因性失足，悲劇以終的虛實故事做為恫嚇——我們每一代情慾波動、躍躍欲試的年輕孩子們總是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義無反顧的探索自己和彼此的身體，尋求愉悅抒洩的泉源，在無數試驗實驗的經驗中累積出他們對性的認知。因為，性慾是那麽一股沛然莫之能「馭」的力量。

雖是在九〇年代的眼界中回顧七〇年代青少年的性探索活動，我們卻發現當年的衝動與創意一點也不輸給今日，其間的差異大概只是今日青少年的情慾活動愈來愈和商業活動分不開，這也就是說，情慾被資本主義金錢邏輯滲透甚深，以至於情慾活動或情慾表達都需要借助商品（花、禮品、名牌衣著、狄斯可等），才能進行。

七〇年代的情慾空間其實也很多樣，其共通點則是經濟上的耗費較少。以當時最流行的家庭舞會為例，只要父母不太嚴厲，願意讓出客廳來給孩子爭個面子，孩子便可呼朋引伴，借得各方的唱片，

調點果汁，撒上滑石粉，在自己家中名正言順的扭暗燈光，進行最起碼的肢體接觸。參加舞會的朋友通常一點錢也不花，只要幫忙打雜就可以了。

這種紓解情慾的活動由於多半是在朋友之間擴大邀約，因此情慾的網路也沿著原有的人際關係向外擴散，由同學、玩伴擴散到他們的同學和玩伴，很少有像九〇年代那種與全然的陌生人進行情慾試探的各式場所（如狄斯可、PUB、來電交友中心等）。

家庭舞會既然提供一個多多少少有人際關係基礎的安全環境，再搭配著當時大量輸入的慢拍西洋情歌舞曲，不少青少年男女因此得以沈緬在昏暗但穩定溫暖的氣氛中，隨著旋律和舞步逐漸進入情況，在相擁中感受異性身體的刺激，初識不久便跳三貼舞的男女不在少數。這種緩慢舒展但熱情澎湃的情慾，十分適合當時還頗依賴人際交往的青少年，不似九〇年代習慣疏離和原子化的青少年們在震耳欲聾、詞調不清但節奏狂野的音效及閃爍著不安變化的燈光乾冰中爆發著自我身體的能量與情慾。

七〇年代家庭舞會是在集體的場域中隔著衣物感受身體貼合的觸感，如果希望更進一步探入衣物，往往就需要轉進更私密的空間去。在許多青少年沒有自己的房間，又不想被家人監督的狀況下，黑咖啡館應運而生。在高背座椅、濃密盆栽、和昏昏的燈光中，一對對情侶在卡座中探索身體的極限，從親吻、愛撫到互相手淫都是例常的公式，少數慾火燃燒得比較烈時又比較有創意和膽量的情侶，甚至可以不脫衣服地在狹窄的椅子上坐著性交。黑咖啡館的多功能性質也因此使它成為七〇年代最具歷史意義的情慾文化地標。

在性刺激與性誘惑的圖像尚未大量進駐媒體的七〇年代，情慾雖然緩慢舒展卻絲毫不減其強度。

入夜之後，另外一些不太耗費金錢的黑暗角落開始人影幢幢，不但有熱情的情侶，也有飢渴的窺視者。當時新近完工，地形轉折，樹叢很多的國父紀念館或故宮博物院，各個大小公園，甚至施工中的大廈國宅工地，都是熱門去處。故宮博物院對面的民宅一到傍晚就開始向騎摩托車經過的情侶拉客寄車，傳聞故宮的清潔人員一大早就得先清除散落在草地樹叢間的大量衛生紙團，以免妨礙觀瞻，由此可見夜間活動之興旺。

我們一般的印象總覺得男性的性生活比女性來得活躍，但是以七〇年代的時代背景來看，恐非如此。越戰期間駐紮在遠東的美國軍人以臺灣為極其重要的休假地點，不管大兵們本來是否已經結婚，到了異國，挾其帝國主義殖民經濟的優勢，莫不想在本地女性身上尋求慰藉。於是，不少出路有限，前途無亮的眷村女子占地利之便，發展出許多異國戀情或投入非職業性的伴遊同居，反正短暫的歡愉也是歡愉。此外，七〇年代初露端倪的青少年問題之一就是逃家少女的湧現。這些「落翅仔」經常在西門町閒逛，以身體換取些許金錢或過夜地點。她們和捲入異國關係的女性一般，很早便已掙脫了貞操觀念的束縛，而且累積了不少異質的性經驗，有些或許終究墜入風塵，但是也有許多後來默默帶著她們個人的故事遁入婚姻家庭。

這些特殊的歷史因素為當年的女性開創了更多以性活動為主要目標及內容的交往關係，如果再和前面說的那些一般的性探索連起來看，我們發現七〇年代的性活動一點也不貧乏。

事實上，在一九八二年優生保健法使人工流產合法化之前，臺灣地區的墮胎比例已十分可觀。由於保險套尚未普及，青少年多半倚賴計算安全期或斷斷續續服用的避孕藥來實行避孕，意外失手的比

例很高。有統計數字顯示七〇代的墮胎率已達百分之十一點八，這當然包括了已婚婦女的墮胎數字，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這是在墮胎合法化之前，許多手術——特別是未婚少女的墮胎——不會報給官方，那麼，即使扣去已婚婦女可能占去的一大部分，未婚婦女的墮胎率仍然不低。這也間接證實了七〇年代性活動的頻繁。

指出七〇年代性活動的頻繁並不意味著這種探索和享受的分配是平均而普遍的：都會區的機率和頻率還是比鄉村高很多，中上階層的青少年也比其他青少年更傾向性開放。但是一般來說，由於情慾空間和花費都還算經濟，青少年男女交往也還未被吸納進入市場的金錢邏輯，因此情慾探索很有個別色彩，而且是大部分人都可以加入的。時至九〇年代，花費較少的情慾空間愈來愈難找，最起碼的前奏暖身活動也往往要坐落在昂貴的情人套餐和豪華的休閒場所中進行，居於初識和上床之間的過渡空間（如黑咖啡館）幾乎付之闕如，取而代之的是對當代文化最具影響力的硬體裝備：汽車。這個退可暖身進可直攻的交通工具把情慾活動由都會擴散到鄉間的度假場所，但同時也更緊緊的把情慾活動關進了汽車和賓館的內部密閉空間。而汽車所代表的金錢實力也使情慾活動漸次兩極化，有車的那一端在情慾活動上大占便宜，無車的那一端則困難重重。情慾資源的積累不再像七〇年代那樣沿著人際關係進展，而是沿著資本主義的金錢邏輯來擴大，使優勢階級的子弟得到更多的情慾滿足。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代的情慾發展意味著中上階級的情慾空間和流動性擴大，這個解放是和下層階級無緣的。

對於活過七〇年代並在其間嘗試性探索、累積性經驗的人而言，九〇年代的情慾活動似乎太現實太任性了一些，但是這個印象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九〇年代有關性、有關兩性人際關係變遷的眾多論述

來建立的。七〇年代的情慾活動沒有人述說，我們擁有的遺跡只是形諸規範、見諸政策的壓抑措施，以及口耳相傳的失足故事和父母師長的殷殷勸誡，或許這些圍堵的跡象正標示了那個「多做少說」的時代。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九〇年代狂熱出櫃的情慾恐怕正是因為我們已經在七〇年代把情慾推到了一定的高度和強度，按著「情慾如過河卒子，有進無退」的原則，我們在九〇年代需要愈來愈強、愈來愈禁忌、愈來愈多樣的性刺激才能達成情慾的滿足。

如果說七〇年代的青少年在摸索中發現了彼此的身體和情慾，那麼，或許九〇年代的我們有機會在他們的情慾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身體觀。這個新身體觀相信身體不是用來交換金錢、愛情或婚姻的手段，身體的愉悅本身就是目的；它也相信身體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被當成性器官來獲取愉悅，無處不是情慾。在這個多做也多說的年代中，只有人人都來說、大家動手寫的各式情慾故事可以對抗那些企圖壓抑馴訓情慾的性論述。

我們期待情慾出櫃文學時代到來。

誰來說「性」

做為一個禁忌話題，印刷媒體中的「性」，過去多半在不登大雅之堂的管道中出現，像是男生必讀的小黃書或是坊間不入流的小出版社發行的性寶典之類，呈現的方式則清一色的以男性為出發點，不是敘述男主角如何攻城掠地，以性征服故事中的所有女性，就是教導男讀者們如何辨識女人、挑逗女人、彰顯雄風等等。這種性書的旁門左道形象使它們永遠上不了檯面，只能在被窩下或暗室中偷偷讀，並同時進行一些個人的性滿足活動。

但是，這一類的性材料卻往往構成了許多男性的性啟蒙，這些材料中所蘊含的性權力關係也悄悄地沈澱為男性對性的認識與了解。

近年來像《新金賽性學報告》之類的性學書攻入通俗市場，可以說是對上述那個性知識、傳統的干預。挾帶著醫學科學的權威與張老師協談機構的正派形象，性學報告以中性客觀的語言呈現各種研究結果與統計數據；性不再是可羞的個人行為，而是連先進國家也常在公開正式場合討論的社會現象。書裏面所傳達的知識不再限定於男性立場，它的敘述方式是不帶曖昧、不勾情慾的科學語言（很少人會懷疑有人會一面看性學報告，一面自慰）。在這些條件下，性學報告不必再偷偷摸摸，它可以堂而皇

之的站在書架上，向訪客宣告書主的坦白、好學、與趕上潮流。

性學報告的正當性與正派性甚至吸引大量女性購買以便按照書中所言來自我檢查自己是否正常。這是她們首次可以透過一個詳細的、有系統的資料來一窺禁忌題目的內容。長久的封閉使她們相信羅曼史小說中的性愛情節總是在浪漫的情節中盤旋，因此性愛過程之外的知識還得靠性學報告來指導。

性學報告做為性知識的正當公開管道，形成了某種程度的開放效果，至少看起來女性們有了新資源，對性知識渴求已久的社會大眾也覺得有了一個可信賴的寶典。

可是，性不但是生理活動，不但是肉體和情感的感覺，更重要的，性是男女權力關係的具體呈現。這種權力關係既然不是醫學或心理學研究的範疇，也自然在性學報告中被壓抑了。

而且，同時被壓抑的還有性學報告本身所占據的權力位置。科學醫學本身並非中立不帶價值判斷，事實上，當代的科學總是在當代的視野中形成的，它所呈現的「客觀事實」也總會反映此刻的道德限度。此外，透過數據與科學分析，性學報告建立起一個新的「正常規範」，不合這個平均值或不合統計限度之內的經驗及行為都被視為異類，因而更強化了現存的中心權力位置，更強化對身體的控制。

由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下一步需要的不是更多抹煞個別性的統計數據或科學報告，我們需要的是各種各樣的個別情慾經驗與幻想的主觀式陳述，而且是以解放身體、解放兩性的角度來陳述的。

補記：

一九八七年，公共電視製播性教育節目「人之初」，在社會衛道壓力下無疾而終；一九九〇年，遠流出版社翻譯兒童性教育叢書《我從哪裏來？》輿論譁然，乏人問津；可是，一九九二年底《金賽性學報告》出版，銷路卻直衝十萬本，一時間各類「性書」紛紛搭便車登場。「性」成為出版界、報紙專欄的票房保證。本文便是在這樣的背景寫成。文成後才一年的時間，臺灣的邊緣次文化圈便出現了女性情慾 DIY 小說，也就是《島嶼邊緣》雜誌所刊載的「妖言」或「出櫃文學」專欄。

但是情慾論述所激發出的能量也有被主流及商業加以收編與消費的可能趨向，因而使得這些能量未能形成改革社會的動力，而只是侷限在體制內以及舊有的權力關係中安全的被消費（例如，一些溫馴的、非變態的、符合主流道德的情慾敘述），更無法形成與體制或父權制對立的出軌鬥爭。

據我的觀察，臺灣的情慾論述近來有三個新趨勢。第一，性論述的預設對象由男女不分的中性轉變為女性。第二，由偽裝客觀的科學語言轉為表達個別差異或獨特性癖的主觀經驗感覺之陳述。第三，由保守道德的框架轉變為較開放多樣的性模式，同性戀及性變態的性模式紛紛浮現。

性，不危險

有一位著名的性教育專家非常義憤的在座談會上說：「談性而不談愛滋，這種人應該天誅地滅。」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不禁想起過去曾經流行過的一連串類似的話，許多人（特別是在我們社會上有專家權威就性事發言的人）都曾以嚴肅的口吻警告世人，性和淋病、梅毒、疱疹有關。性和愛滋配對只不過是這種警語的最新例子。

這些警語表面上看來是對人體的健康關心，但是，令人納悶的是，在提出警語時，專家凝重的態度專注於把性描繪為危險的、可怕的活動，把禁慾當成最主要的應付方式，而無心於談論如何在性活動中保護自己的健康。這麼一來，我們倒覺得專家們的警語不是醫學專業上的結論，它們聽來更像道德上的恐嚇之詞。

奇怪的是，我們很少聽見專家用同樣的義憤說：「談一夫一妻制，卻不談單一性伴侶生活之可能枯燥貧乏，是應該天誅地滅的」，「談養兒育女卻不談父母個人生命的耗損與浪費，是應該天誅地滅的」等等。

不過，專家們倒不是唯一喜歡強調性是危險的活動的人，事實上，在我們這個性壓抑的社會中，

即使不反對性的人也會習慣的談性的危險。目前在臺灣各大城小鎮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情趣商店，都會在販賣各種幫助性情趣的用品之時，順便還賣女子防身術的書籍錄影帶，或者是防身噴霧，甚至電擊棒等等。這些防身商品和假陽具、薄紗內褲、潤滑劑等等並列，一方面宣示我們可以使性變得更爽，另一方面卻同樣傳達訊息說性具有高度的危險，需要特別費心防範。

當然，我們也禁不住的注意到，不管是情趣商店賣防身用品，或者專家談性與愛滋，他們的警告對象主要都是女人。（醫學研究顯示，在做愛時，女人把愛滋病毒傳給男人的機率少之又少，但是，男人把愛滋病毒傳給女人的機率是百分之二十，因此專家的警語在大多數是異性戀的條件下乃是針對女人的。當然，這種研究結果未必可靠。）

如果把以上所說的事情連起來看，我們會發現，把性描繪成危險的、可怕的事是針對女人的；它不但宣示女人的處境是危險的，也就暗示這些危險應該是由女人來主動防範的，也就是說，保護自己是女人的責任。

正是因為這種邏輯，女人才成為我們社會上性壓抑最嚴重的一群人。她的時刻提防警覺使得她視性為畏途，她的過度自我保護發展成無知無邪的小女孩純真，也更加深了她的柔弱與依賴，也使得她在性的愉悅上開花很慢，享受很少。

同時，女人的性壓抑更發展為其他人的性壓抑來源之一。伴隨著女人的社會位置而來的依賴與無助，使得女人在性活動之前必須要求男人展現某種社會條件（如身高、學歷、職業），或者承諾真情，甚至婚約。她們相信這些條件或承諾可以保障至少某些性活動中沒有前面所說的各種危險。

可惜的是，把性和危險等同一的女人即使在滿意的社會條件和真情承諾中也很難享受到性的愉悅。人類文明發展到今日，性早已脫離了純粹肉體的活動和感受，愉悅不再來自肉體的接觸；相反的，因肉體接觸而來的微妙感受必須在腦部的性幻想、在心中的慾念澎湃中找到意識才能產生愉悅。換句話說，愉悅來自性幻想與肉體感覺在流程中的巧妙搭配，而這種搭配相連，就像小孩子學走路時的四肢和平衡器官搭配一般，需要長期的、經常的實驗和練習才能達成。以我們社會為女性所建立的純淨無慾空間而言，她們既沒有幻想的材料，又沒有實地演練的機會，再加上無盡的恐懼和罪惡感，女人要如何開發她們的身體和慾望呢？這也難怪女人的慾望發動比較慢，滿足也比較難。

考量這些現象之後，我們不禁要對性學專家說：你們專注於向女人宣達性是危險可怕的，只不過是利用女人的性壓抑來達成社會的性壓抑，利用女人的拒絕來迫使男人壓抑。可悲的是，這種愈來愈強的壓抑會培育更多對女人的敵意和仇恨，反而為女人製造了更大的危險。

從性壓抑的角度來看女人與愛滋之間的關聯時，我們深深感到其中的錯綜情結。一方面我們感覺在臺灣保守的、男性主導的社會風氣中，女人學會在性活動中保護自己不但是必要的，同時也是肯定自主權的措施；可是另一方面，太過分強調性與愛滋的關聯，也會強化性壓抑，更何況臺灣的性活動生態和先進國家的大不相同，外國談性與愛滋的熱切的角度不一定適用在臺灣。

不過，或許我們可以用另外一種積極的態度來看愛滋病為性活動帶來的新視野。首先，我們可能得採用一個新的態度來看性。性不再只是兩人間進行的隱密活動，性是身體健康的一部分；這也就是說，性不但需要維持健康才能好好進行，同時，性活動本身也是促進健康的身心運動。既是健康的一

部分，我們當然應該採取一些措施來維持它的正常運作，因此使用保險套和洗淨生殖器官一樣，沒什麼大不了的，只不過是必要措施而已。

其次，愛滋的可能性為我們帶來的不但不是禁慾，不是不做愛，相反的，它提示我們的是性活動的多元發展。如果以前我們相信一定要生殖器相接觸摩擦才叫做愛，才能爽，那麼，現在我們或許可以開始嘗試開發身體的其他部位的可能快感，更可以嘗試以不同的活動方式來提升慾念及快感。說說情慾故事，試試角色扮演，人類的快感本來就不是集中於生殖器的。

還有，過去我們也許以為性只牽涉到兩個身體，可是，現在我們或許還可以把某些用品，也包含在快感活動之內。兩人合作把保險套戴上可以是一件極為性感刺激的遊戲，連塗抹殺精膏也可能發展成兩人都極度享受的前戲。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使用想像力，在於我們願不願意「玩」性。

愛滋是一個可怕的病，但是生理的疾病不應該被轉化成一種社會的性壓抑形式。我們對抗這種性壓抑的方式就是把一切預防措施都轉化成為新的性活動，新的快感來源。

對於女人而言，性就像開車一般。開車當然可能有危險，但是手握方向盤允諾的是女人的自主權和掌控權，我們只要檢查好了車況，扣上安全帶，做好了一切防衛措施，下面就讓我們盡情的享受速度的快感和自己掌握方向的愉悅吧，我們絕不容許恐嚇危險的說法剝奪我們追求自主的權利。同樣的，性可能有其風險，就好像吃飯也可能拉肚子一般，但是我們並不因此就再也不進食。只要我們做好了預防措施，當然就可以盡情的享受性歡愉所帶來的身心滿足、成熟世故，以及對男人的深刻認知。

任何以愛滋陰影來恐嚇女人禁慾的說法都只是繼續壓抑女人的新招式。畢竟，性……不是危險的，性只是愉悅而已。

打破處女情結

「處女情結」與是不是「處女」沒有什麼關係，很多早已不是處女的人仍被處女情結所困。我所謂的「處女情結」，指的是認定女性應該以纖弱、保守、沒有情慾……等等「低能量」的生活方式過日子才是「好女人」的心態。

有「處女情結」的女性，在外表上也是僵化壓抑的——她們梳著一絲不苟的髮式，穿著素淨拘謹的衣裙，舉手發言時手舉得比頭還低，笑時總要掩口，肢體相當不開放，而且對新的事物不敢嘗試，沒有好奇心，對自己的身體不敢看也不敢想，在性關係中十分被動，充滿罪惡羞恥的感覺，對男人退縮、害羞……，有這種「處女情結」的女性，生活是極低能量的，沒什麼推進力可言。（對這種有處女情結或「處男情結」的人而言，我們這個社會不但不不是過度性壓抑，恐怕還是性開放的呢！）我主張打破這樣的「處女情結」，因為任何前進發展的社會都不能坐視二分之一的人口以如此脆弱退縮的方式過活！而很不幸的，據我觀察，臺灣是個情慾很受壓抑的社會，主動、活潑、情慾解放的女性，不但被視為「壞女人」，連她們自己往往也不能認同自己的行為，而覺得羞愧、罪惡。

處女情結是阻礙女性成長的一大因素，打破它，將會讓女性的身體、心理更自在的呼吸。事實

上，「打破處女情結」的說法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別忘了，現在有很多女性已經暗地裏在嘗試各種情慾經驗，只是沒有說出來，自己覺得羞愧罷了！打破處女情結的說法正是要開闢出更大更自在的空間，讓已經在做的女人無愧的做，讓還沒有做的女人無懼的面對新的生活方式。

要打破處女情結，我覺得女性應該肢體解放、情慾解放、經驗解放。

所謂肢體解放，是女性要鍛鍊身體，同時要感受身體，讓自己有充分的力量掌握身體。

人的好奇心，第一步是來自對自己身體的探索，但傳統禮教讓女性對身體不敢有所探索，甚至覺得觸摸、感受、探視身體是羞恥的。要打破處女情結，首先要解放身體，練游泳、運動、舉重，讓肢體有活力而且大方、坦然的動起來，還要了解、感受身體的每個部位，開發各個部位的感覺，女性會發現快感事實上來自對自己身體的充分掌握和收放自如。

再說情慾解放——不要說自己沒有情慾，青少年時期，每個人都會自慰，腦子裏也有一大堆性幻想，只不過被罪惡感長期壓抑而已。

要解放情慾，必須鍛鍊自己主動投入，不要顧忌無意義的眼光問題，諸如，害怕騷浪模樣破壞形象、害怕呻吟喊叫被別人聽到等等。做愛的時候要主動把自己搞得很興奮很性感，腦子裏充滿情慾幻想，把你的性伴侶幻化成自慰時想像中的各種角色人物，甚至練習和對方一起講幻想中的故事，扮演其中的角色，才能更融入性幻想的情節當中，充分享受身心搭配完滿的快感。

解放情慾，女性一定要主動投入，唯有主動投入做愛，妳才能真正的去「爽」到。若情慾的產生只是為了維持婚姻或經營愛情這種「有條件的奉獻」，那女人無異就是躺在妓臺上等待男人發洩的機

器，不但自己沒爽到（因為有顧忌），而且無異是把情慾、身體給「物化」了。

至於經驗解放，女人千萬不要因為曾經和許多男人有過關係而自責自慚。經驗是自信和力量的基礎，妳不但不要自我設限，反而應該在每一次的情慾經驗中累積知識，開發感受，我鼓勵女性要讓情慾多樣化、多元化。

再者，女人與女人之間，應該要多做情慾經驗資訊的交流，讓女人對男人有更多的了解，男人在一起時的 *men's talk* 不都是在交談情慾資訊嗎？同時，藉著這種討論和分析反省，女人才會對自己身上的感覺形成具體的看法，並且研究改進實驗之方法。畢竟，只有經過言語的整理，經驗才可能轉化為知識和力量。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時時強調，情慾解放最首要的是一種言談解放，只有當我們能公開的、自在的、無愧的談論情慾時才算真正的情慾解放。如果只能在暗處偷偷說，偷偷做，明裏便羞愧難言，這算哪門子的「解放」？

能痛快的「說」情慾，這本身就是一個大突破，它意味著性壓抑已經鬆動。要是女人連這最深層最畏懼的心理都可以克服，可以拆解處女情結的束縛，可以無懼無愧的實現自我，那麼，兩性平權的社會是真的有望了。

（按：本文是《貴族雜誌》編輯鄭花束的採訪整理稿）

女身女性

「不」

即使在情慾中女人也喜歡說「不」。

「不」是一種堅壁清野戰。她可以用這個簡短有力的小字一舉將眼前的兩性關係單純化，讓他方發動之陌生行為所可能勾動的情慾無處生根。她想，若是不能確定眼前的行動下一步會產生什麼作用，帶來什麼後果，那麼，此刻最好還是不要去想它，就對它說「不」吧！

若是不得不面對他方的行動做出具體反應，那麼，「不」也可以用來轉移責任的歸屬，說「不」就把行動權丟給對方，下面的戲要怎麼唱可就是對方的事了。要是對方堅持繼續前進，她也已擺出不情願的架勢，站穩了道德立場，不必為罪惡感而自責，反而可能在以後發生的事情中好過些。

缺乏說「要」的練習或是不夠肯定自我意願的女人也許會把「不」掛在嘴上以保護自己，可是更世故一點的女人也許就會用「不」來討價還價了。只有說「不」才會迫使對方使盡渾身解數，開出各種價碼與保證，而這種女人要是出牌出得對，搞不好會換來大獎。

說明白一點。「不」標示的是弱勢者的被動位置——只有男人才能主動提建議，女人只能被動的回應。

正如許多女性主義者強調的，當然有些時候女人說「不」是真心堅定的不要；可是，有沒有什麼時候她也會說「我要」呢？若是一味「高」「不」，而不鼓勵也說「要」，恐怕反而強化了性壓抑，也強化了父權體制對女體的規範。

永遠不說「要」的女人即使說「不」也是軟弱無力的。

香浴乳之浴

依著電視廣告的說法，洗澡可真是自我撫慰的最佳浪漫時機。

妙的是，這種洗澡只能是女人的專利，但是男人卻有在廣告中偷窺的最好座位。

女人開了蓮蓬頭，水波輕擊在肌膚上。要是純為了潔淨所洗澡，此刻當然是開始打肥皂了，省水嘛，在熱水未用完之前趕快洗完。

可是，洗個香浴乳的澡可不能太趕。女人聽說正式的過程是，先讓水珠濕潤全身，此刻應閉上眼，細細品味水流過肌膚的細微癢麻感覺。然後再用香浴乳均勻的敷滿每一吋肌膚，電視廣告中的模特兒不都是在此刻流露出最享受最愉悅的表情嗎？手掌滑過肌膚，沒有硬硬的肥皂的阻隔，只有滑潤的柔嫩質感，鼻中聞著玉蘭茉莉的香味，剎那間，女人也是華清池中的一員了。

是啦！是費了不少水。但是，女人發現了身體，發現了情慾。

「美好」的第一次

處女是很難在性交中爽的。

這倒不一定是因為我們的文化一再強調，異物插入時有可能造成肉體上的疼痛；更重要的恐怕是我們這個文化「處」（清純、無知、無經驗）的執著已嚴重的影響到處女可能的感受。

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性老早就已不是單純肉體的事，而性的啟動器——慾——在各種情色影像文字的建構之下，也變得愈來愈不再依賴而超越了真實的身體。

在這種狀況下，一個被保護得好好的，眼不看耳不聞口不語情色的處女要如何發動情慾呢？換另一個角度來說，一個腦中沒有情色資源、心中缺乏性幻想材料、身上沒有性刺激經驗的處女，要從何爽起呢？

她唯一能憧憬的只有電影床戲中那種浪漫的、愛憐的、激情的美景。可是，此刻的經驗中卻只有滿面的唾液（希望對方沒有口臭）、扯拉的頭髮（長髮倒成了累贅）、和不知所措的身體（這是什麼感覺？我應該有什麼反應？）。對方完事之後，處女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做愛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如果走路需要學會協調多處骨骼和肌肉以維持平衡，那麼，做愛也需要練習協調身體的各部分與腦中的性幻想才可能爽。

那些把自己封閉在純淨空間中，希望以前半生之禁慾來換取後半生之快樂幸福的女人可有得失望了。

性感的女人

很多人認為性感的女人就是暴露身體的女人。

可是，我們在電視上看見愈來愈多的沐浴乳、褲襪、內衣廣告以及其中暴露的肩、腰、腿，它們展示的並非性感的「女人」，而只是片片斷斷支離破碎的女體。

廣告認為只要展示這些帶有性含意的肢體便足以勾動情慾；換句話說，廣告預設的觀眾是一群群有強烈偷窺狂的人。明白點說，廣告是由男性偷窺女體的角度來拍攝的。這些偷窺的人不想或者也不敢站在平等的主體位置上向對方表示愛戀和需求，他們只能在門縫、窗邊、鑰孔中窺看片斷的女體來滿足那可憐的慾望。

性感的女人是充分理解自己的情慾而且很自在的表達情慾的女人。她在身體的探索和慾望的開發上是有經驗的，唯有如此，她才能練習到把生理的悸動和心理的慾念配搭得收放自如，而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性感受。這種自足自發自信自得的女人才是真正性感的女人。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媒體上並沒有什麼性感的女人。我們有的，只是純純傻傻子孩似的「愛笑的女人」，只是身體暴露但眼中無慾的沐浴女神。即使在連續劇中勾引男人的「壞女人」也不過是

言詞肢體上的直接宣告，而沒有在眼角眉梢放出「我要」的性感訊息。

或許，我們社會上大部分的男人不敢要性感的女人。他們要的是可以偷窺的對象，可以罩得住的清純女孩，以便可以洩慾而不必擔心自己是否能滿足對方。他們汲汲於掩蓋一份脆弱的男性焦慮和那個行之經年的不平等權力關係，而錯失了被女人主動需要並充分配搭的愉悅關係。

新女「性」三則

母「性」

過去，洗衣服的目標是要洗乾淨，洗衣精廣告的訴求自然是去污力，廣告主題的促銷人物也以愛心操勞家務的母親為主。

現在，消費社會中符號掛帥的風氣之下，對許多女性來說，衣服洗不洗得乾淨只是個起碼的實用要求，更重要的是洗衣精所提供的象徵效果。比方說，是否號稱保護高級衣物的質感、是否能促進親子人際關係的協調等等，這和現代女性社會角色的多樣化所帶來的行為規範變化，也是互相配搭的。

一九九一年曾有個搶眼的廣告便以嬰兒在母親懷抱中好奇的伸手探入母親僅著之黑色絲質性感內衣（！）玩撫母親的乳房，來宣告該產品的柔軟功效。由於這個嬰孩只露出上半身，而且上身未著一絲衣物，不易判斷其性別，可是許多觀眾卻一口咬定他必定是男嬰。這個反應不但暴露我們社會中的異性主導常識，也揭開了母「性」的另一面。

這個廣告的挑逗力「很自然地」建立在男嬰的基礎上。因為，換了女嬰玩弄母親的乳房，便少了

那份曖昧，而母親帶笑說的「寶寶，不可以啲！」也就失去其內含的欲拒還迎感。

這樣一個精心設計的廣告在有意無意間指向母「性」性慾的存在。學者們早已指出餵乳過程中，母親和嬰兒雙方都得到吸吮而來的性快感，這個廣告卻更廣泛地指出，即使在日常生活的親密接觸中，母親也常有各式各樣性刺激和性滿足的機會，這是親子關係中必然的一部分，只不過在我們的語言和思考模式中，這些親密關係中的性成分被壓抑下去，而以昇華了的「母愛」、「親情」來總稱。

在一個母愛日日被歌頌、母「性」卻時時被壓抑的社會中，這種蘊含母子調情場面的廣告倒是道出了人生的真實，揭露了母「性」的真面目。

波「性」

女人的身材一向是個吸引大眾的話題。三十年前談張仲文的身材時說的是由觀眾感受出發的「性感惹火」，十年前則用美學形容詞來說「天使臉孔，魔鬼身材」，到了九〇年代初乾脆赤裸裸地集中焦點在身體的上半部，以尺寸來膜拜「波霸」。（「波」是「球」的意思，用來指乳房。）

當然波霸現象在某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女性的物化，鼓勵大家以波來評斷女人，可是它卻也可能促成另一些效果。

過去青少年在發育期間總是駝背弓肩，躲躲藏藏的，深怕別人發現自己身體上的明顯變化，因此坊間甚至還出售一種背心式的警示器，少女穿上以後，一旦駝背，立刻便會觸發警示，提醒矯正姿勢。

可是最近的觀察顯示，青少年逐漸不再彎腰駝背遮掩身材，不再以己身的性徵為恥，反而有愈來愈多的少女直背挺胸地走來走去，厚墊胸罩的銷路也大幅增加。這當然不是說波霸現象直接造成了這種效應，但是波霸旋風在這個媒體導向的大社會中，卻可能因其在媒體中的伏墊，而提供一個比較友善的環境，讓青少年有更多的自信來面對日漸凸顯的性徵。這可是塑造波霸旋風和批評波霸現象的人沒有意料到的效果。

髒「性」

以前女人以為她只有在月經來的時候是不淨不祥之物，可是，如果照最近一些新產品的廣告說法，女人恐怕每天都是不潔的。

月經棉廣告本來把女人的生命劃分成兩段，一段是無憂無慮的平常日子，一段則是突然沈靜柔弱、要求請例假的煩惱日子。廣告因此宣傳說只有月經棉可以神奇幫助女性回復自由和自信，度過這每月一次的麻煩事。

可是，每個月只用七天的產品要是能變成天天都用，那該有多大的利潤啊！於是偉大的廠商有了好點子，既然女人已經養成潔癖，要求每天有穿著剛洗過的衣服的感覺，那麼，何不鼓勵她們要求「天天乾爽」呢？

於是女人的生活統一了。每天都是有分泌物的，每天都有可能污濕衣物，所以天天都需要衛生護墊的保護。而在這種「新共識」中，不但和「性」密切相關的月經是骯髒的，這份羞恥感也擴張到同

一器官在日常的一切分泌物。於是愈來愈多的女性迫切地感覺到這些每天的分泌物是「必須處理」的東西，而不像過去一般不當一回事。

妙的是，許多女性在月經棉的廠牌、花色、香味上精挑細選，也購置厚度、寬度、長度不一的月經棉，像更換衣物般配合心情和感受，但是她們卻覺得自己身體的器官是噁心的、可恥的、不能碰觸、不能了解的，因此也從不曾仔細清洗身體，換了再多的護墊也不過提供了細菌滋生的濕熱溫床。

還有一些女性，清洗是清洗，但不是以個人衛生為出發點，反而是因為性焦慮或性罪惡感而不斷清洗。她們所堅持每日都用的衛生護墊只不過是這些性壓抑的客觀外現，而那些近乎強迫式行為的清洗則暗暗地提供了另一種無意識的性滿足。

性解放的政治

在以下這篇文章中，我主要想談性解放運動和（政治、社會及文化的）反對運動之間的關係。由於處理的話題特殊，對於一般的讀者而言，這篇文章可能不像本書其他何春蕤本人所寫的文章一樣易讀，這是我必須聲明在先の。

用何春蕤自己的話來說，這本書有一大部分的文章是：

思考與婦女相關的議題。我相信透過分析婦女的處境和造成這些處境的社會成規，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見塑造我們整個社會的壓抑力量。這些議題的影響力和重要性絕不亞於那些日日佔據報紙頭條位置的「大」新聞。（引自何春蕤〈邊地發聲〉一文，原刊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認為何春蕤在此暗示著：像父權制、性壓抑制度、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異性戀制度、一夫一妻制……這些力量常常是彼此依賴、互相支持、互相滲透的，故而在塑造我們社會的形態上都是同

等重要，難分難解的。

另一方面，這些塑造社會形態的力量不但有其各自的特殊性（specificities）及相對自主的運作邏輯，而且還是在論述中或甚至藉著論述來克服彼此的矛盾，以形成一個互相依賴與支持的整體。

在這個前提下，針對父權制的女性主義、針對性壓抑的性解放論述、以及針對異性戀制度的同性戀解放論述，均應彼此串連包含，並且和批判資本主義、國家及各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的論述串連起來。

當然，目前這本小書並未能做到串連起這些批判性論述的目的，它只是做了些很初步的建議。

在何春蕤的另一本書《豪爽女人》中，她曾企圖將婦女解放與性解放串連起來，顯示兩者的密切關聯。我認為何春蕤之所以選擇性解放（而非像社會主義、環保主義等等）來和婦女解放勾連起來，除了她個人對性這個話題的關注興趣外，還有她對性解放在目前臺灣社會形態（social formation）中的策略位置的評估。簡單地說，她認為「性解放」處於一個極為邊緣、被主流排斥的位置，並且和各種新的、舊的權力關係頑強地對立著。故而一個被性解放論述所滲透的婦女運動，或甚至被性解放論述所滲透的整個反對運動，將不易被資本主義或國家機器這些主流勢力所收編馴服。

舉例來說，如果婦女運動的議題完全是以好女人或受害者的權益為唯一訴求（像被遺棄的離婚女人、偉大的母親、犧牲自己的家庭主婦、乏人照顧的老年婦女、被強暴的國中女生、刻苦耐勞的女工、認真工作但受歧視的上班女性……等），那麼婦女運動所呼召的這些主體並不必然和父權社會主流道德相違背，因為父權社會正要求女人有「好女人」形象（而「受害女人」在父權社會中也一定要

是「好女人」才會被認定為真正受害，否則就是咎由自取）。這樣一來婦女運動就很容易淪為父權制下的救濟運動、補漏洞運動，或淪為只是少數婦女政客進入國家機器分享政權（統治權）的選舉動員。因此，婦女運動絕不應去符合父權制所要求或所能容忍的女人形象，而也要同時去呼召像豪放女、好色女、第三者、出牆女、同性戀女人、性變態女人等等這些明顯和父權制的女「性」生殖邏輯及女性角色矛盾對立的主體。這就意味著，婦女解放和性解放及同性戀解放應有某種交集。

在我看來，何春蕤在本書中對和「性」相關現象的文化批評，是從以下兩點基本認識出發的。第一點在於指出一些「性開放」的現象其實也是性壓抑。第二點則是指出某些主體的性開放實踐未必就是性解放。這兩點當然是相互呼應的。何春蕤首先指出：

在我們這個過度性壓抑的社會中，雖然生產並撩撥情慾的管道和速度愈來愈廣泛發達，但是，它們同時提供的滿足情慾的方式仍然是另一些改頭換面甚至變本加厲的性壓抑形式。（何春蕤，〈邊地發聲〉）

更具體的說，

目前市面上出現了很多和性有關的東西，像情趣商品、情愛小說、性學論著……，似乎性的各種資訊都在暴增，性的空間也在擴張。這代表了什麼？是「性」開始受到解放嗎？還是它只是個假相？

這些其實都只是商業銷售的手法或花招罷了，並沒有真正改變兩性間的遊戲規則。例如：多數人還是認為外遇的第三者是那個婚姻外面的人，卻沒有人想過原配可能才是真正的第三者，原配才是那個阻礙了愛情、阻礙了情慾的第三者。

顯然，婚姻的框架仍然主宰了我們對人際關係的看法。但是真正的性解放是拆解現有框架，而不是一些小小花招的改變。臺灣的社會到今天仍認為，基本的婚姻關係不容挑戰，而且，控制的力量往往是透過被壓抑最深的人來執行，如：女人。因此，原配的權利被當成現階段談外遇唯一的正當說法。以此來看，與性有關的商品暴增，並不是性解放，反而是更多的性管教，它建立了更多的框框以及模式，把大家放在它的範圍裏玩。

（何春蕤，〈女人當然要性解放〉，《婦女雜誌》，一九九四年三月號，頁六三、六四）

所以對何春蕤而言，許多教人如何享受性愛的說法，或者對情慾經驗的正面描述，由於還是預設了傳統愛情、婚姻、異性戀制度之類的架構，因此這類性開放的言論仍然是一種性壓抑、性管教或性馴訓。換言之，如果只談享受性，卻不談改變兩性的不平等、不談改變教養小孩的方式，也沒有正當化同性戀、豪放女、好色男、「性變態」、師生戀：等等「不倫」性愛，那麼父權體制依舊，傳統包袱仍在，性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何春蕤接著說：「既然『性』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目前這種道德性、壓抑性的言論還會繼續下去，那麼，邊緣的聲音就只有在次文化圈裏形成。」（何春蕤，〈女人當然要性解放〉）

在指出某些「性開放」說法或文化現象仍然可能是性壓抑後，何又在以下點出某些主體的性開放實踐也未必就是性解放。她首先指出：

建立在主體意願上的性經驗及相關思考，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建立自信與膽識、練達與鎮思的主要力量來源。但是我們這個性壓抑的社會只想用學業、愛情、婚姻來延後性生活和經驗的開始，同時用羞愧、罪惡、污穢來抹黑這股生命的基本動力。這些包袱的層層束縛，鞏固的是現存的兩性、親子、長幼之間的宰制關係，也間接穩定了社會其他層面上的壓迫關係，更以強大而隱匿的力量，使得我們的女人膽怯、退縮、幼稚，使得我們的男人躊躇、脆弱、扭曲，更創造了一個充滿性危險，而且金錢與性密切交換的社會環境。

好是在是，在此同時，我們社會仍有愈來愈多的人在自己個別的生活世界中營造出與主流道德意識無關，或者甚至相違背的性經驗與性模式，「例如，有些人」快樂的嘗試做愛、主動的搜換伴侶、盡情的享受短暫的交會。（何春蕤，〈邊地發聲〉）

對何春蕤所說的這些人而言，情慾的發展不以婚姻為目標、為限制。其性實踐的模式則是「只要雙方合意，兩情相悅，就可做愛，不要追求天長地久或曾經擁有，只要曾經享受就可以了。」（何春蕤，〈女人當然要性解放〉）

這些日漸普及的、性開放的、多樣的性活動或實踐，不論是異性戀或同性戀，也不論是性「變

態」或「正常」，並不能算作性解放。因為這些存在於社會邊緣的性活動或實踐仍被視為偏差行為，而被資本主義所利用及消費，或被媒體所窺視兼嘲弄，被國家機器所定位或收編，等等。更重要的是，從事這些邊緣性實踐的人——特別是女人——並沒有經驗到光榮、自信、能力、肯定及驕傲，他們沒有將這些邊緣的性活動公諸於世或告知諸親友，公共的論壇也沒有表揚或讚賞這些人。相反的，他們常隱藏這些性活動，因為他們感到羞恥、罪惡、自卑、不光采等等。像這樣的性實踐當然不是什麼性解放。

明顯的，何春蕤絕非在否定這些性開放的、「變態」的、邊緣的性實踐。相反的，她要指出：

這些日漸普及的性活動或許仍是在既有的兩性宰制關係中運作，目前所需要的是發展論述來使它們正當化，擴大其影響力，並使這些論述與另類的、反對的文化發生關聯，營造其中潛在的解放力量，以便做為下一波社會變革的主要推動力量。（何春蕤，〈邊地發聲〉）

以下就讓我詳細地解釋這段話，以及其中的可能蘊涵。

首先，我相信在何春蕤的想法裏，性解放首要的是一種語言活動或論述實踐，也就是那些被「性多數」或「性主流」所壓迫的主體，可以在公共場合或公共論壇、媒體上，自由地談論性或書寫表達性，並試圖發展出和主流對抗的性論述；這也就是說，被「性主流」壓迫的主體們可以自由地交流性經驗、交換性資訊、詮釋自己的性活動。透過這樣的性解放論述實踐，這些被壓抑的主體（也就是性

解放者），要正當化各種邊緣的性活動（同性戀、性變態、不倫性愛、反父權一夫一妻婚姻的性愛……），以形成多元「性道德」的共識。

性解放這樣的目標當然不可能靠國家、教育、市場、媒體這些主流力量來達成，而要靠和婦女解放運動、同性戀解放運動，以及其他社會運動所形成的反對運動聯盟來達成。所以真正的反對運動（也就是反對國家機器、資本主義、父權制、異性戀制度等主流力量的運動，而不是以奪取政權為目的之運動）應當積極地去詮釋或看待上述那些日漸普及的、邊緣的性實踐。

另一方面，如果邊緣的性實踐能透過和反對性質的社會運動掛勾的性解放論述而被賦予新的、正當的意義，就能產生和主流力量對立的效果，否則就是一些白白浪費掉的人群實踐，被主流力量所利用、收編或定位。讓我用更簡單的話來說明：

在目前這個過度壓抑的社會，有許多不滿的、被壓抑的「性少數」存在著，這些「性少數」像是豪放女、同性戀、好色男、虐待狂、戀物狂、戀童症者、第三者或通姦者、展示狂等等。但是這股強大的不滿能量，或者說，這麼多樣的性少數，也應該可以成為改革社會的動力，像女性主義性解放運動便是重新疏導不滿情慾於女性主義性解放的論述中、（亦即，召喚被壓迫的性少數和女性主義者平等互動），使之能促進兩性平等；而且，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地將性解放和環保、勞工、同性戀、老人、兒童、學生等主體的解放勾連起來。

不過，一旦這種性解放運動開發出不小的能量時（也就是召喚出愈來愈多的抗爭主體時），國家機器和資本主義體制這些主流力量是不會坐視的，它們也會改變過去壓抑禁制的策略，而以局部的懷

柔、有限度的開放來加以收編。例如，主流會對一些出櫃的情慾表現出「寬容」、「同情」、「諒解」的姿態，像現在部分主流對同性戀的態度一樣。（但是主流絕不會容許同性戀完全合法化、道德正常化，以及分享媒體與教育上的權力。）主流也可能搞一些溫馴的、「正常」性的情慾論述，大談性的享受與經驗，或者較開明的性教育，但是仍然局限在一夫一妻家庭的框架中，也不挑戰父權制及現存的兩性關係。或者主流可以正面描繪出廬情慾——如，外遇，召喚出快樂、青春活力、無牽掛又灑脫的「第三者」，但是卻在召喚中勾連到商品的消費，以轉移第三者的不滿或其被壓抑的情慾於商品消費中。主流也可能大張旗鼓的談性論性，好像「性」不再是禁忌話題，但是卻用醫學的、性學專家的報告來談，將性的發言權放到專業權力手中。

面對主流力量的收編，我們站在邊緣立場的性解放運動因此必須不斷逃逸，不斷地移向邊緣性實踐，以探測主流收編的底線，而且同時勾連著其他社會運動，使主流不易收編或定位我們。在策略上，我們性解放運動或許不必也不太可能在運動初始就極端邊緣化（例如，將焦點放在成人與兒童的性愛、人與獸的性交等邊緣性實踐），而變成一種與常識完全斷裂的大拒絕；相反的，我們在初始時至少應能連接起現階段的一些常識，以正當化性解放的論述。然後隨著運動的進展、新常識的建立、因應主流的收編策略，我們不斷逃逸到更邊緣的位置上，以更邊緣的性實踐做為正當化論述的焦點。

真正的性解放並不必然和「保守」的性模式衝突，真正的性解放事實上歡迎多元的、平等的各種性模式，各種性生活方式或性文化。性解放反對的是統一標準的性模式，因為單一性模式不但假借「正常」或「規範」之名抹煞性差異，也施行父權制、異性戀霸權、資本、國家等主流的權力原則。

後面這些主流力量可以藉著「性」，施行壓抑、禁制、檢查、規訓、馴化、鼓勵、生殖等等。總之，從歷史上來看，主流力量是可以因利害及局勢而更換盟友的。換句話說，主流權力既可能和保守的性模式相結合，也可以和某種開放形式的性模式相結合。

以上的討論已經暗示了「性解放」(sexual emancipation)未必就是某種性能量的釋放(liberation)，而「性壓抑」也不單單就是一種對性能量或性滿足的禁制，而可能是有某種積極或生產性的效應。下面就讓我由理論的角度來談一談我對「性壓抑」、「性解放」這些名詞的看法，我相信何春蕤在本書中以及她的《豪爽女人》中使用這些名詞時，也是採同一看法的。

「性壓抑」、「性解放」與之密切相關的一些名詞(像能量、昇華、置換)源自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以及馬庫色(Marcuse)、賴希(Reich)，這些馬克思—弗洛伊德主義者，他們將弗洛伊德學說發展成政治性質的性解放學說。我的許多想法基本上受到上述這個弗洛伊德傳統的很大影響。但是我也像某些政治性的弗洛伊德主義者一樣，不滿意弗洛伊德的生物主義，希望能將弗洛伊主義「社會建構」化，將「性」看作是一種社會的建構，而不是某種生物的本能，或某種「量」的及「善」的人之本質。(不過，弗洛伊德的性本能也不是單一的源起，而是來自多樣的來源)。近年來很多政治性的弗洛伊德主義(包括一些女性主義的心理分析學說)都已經採取了社會建構派的角度。這樣的角度的，使得弗洛伊德和像傅柯(Foucault)這樣的學說傳統之間的距離靠近了，或者也可能走出第三種方向來。

在何春蕤寫作本土情慾的社會文化評論時，她似乎都是貼緊著具體實例，而將弗洛伊德這類理論

當作探索、研究及發展本土情慾論述的工具。這樣一來，她所使用的名詞、概念、範疇、架構，和企圖建立的因果關係與建構的現象事實，都有可能突破或修正原來理論工具的範圍。不過不論如何，我還是要強調弗洛伊德傳統對我們本土情慾論述的重要性與價值，因為弗洛伊德學說在西方某些社會的性論述中雖然占據中心位置，但是弗洛伊德在我們社會的性論述中之位置卻絕非如此，而且我認為本地的女性主義者、性解放者和其他的性激進派，如果能適當的運用論述策略，可以將這一傳統的龐大資源挪用為反對及抵抗主流性論述的重要成分。臺灣的性論述主流到現在為止並沒有成功地挪用或收編弗洛伊德，如果女性主義及性解放者也棄弗洛伊德而不顧，將是愚不可及的做法。

在這裏讓我岔個道，來處理對弗洛伊德學說可能有的某種疑慮，這個疑慮乃來自一種流行的誤解。

這種誤解認為弗洛伊德學說是一種全面的(global)理論，而任何全面性學說都有其可疑或「危險」之處，或許像傅柯這類學說才是局部的(local)，而局部學說比較「不危險」。可是從知識移殖的角度來看，任何學說都是局部的，都有它起初應用的範圍脈絡。換句話說，任何移殖至本地的學說都可能是危險的，端視它所接合的權力論述原則而定。我曾在另一個地方談過知識移殖這個問題（〈作為應用哲學的本土科學哲學〉，《當代》，一九九三年七月，八十七期，第三節至第五節），這裏不再多說。

在《豪爽女人》中，我們看到何春蕤用「性壓抑」這個名詞涵蓋了相當廣泛的權力現象，這之中包括了禁忌、嚴禁、檢查、延遲（性滿足）等，也有規訓、馴化、管教、單一情慾軌跡、性模式的標準

化或正常化、性騷擾、冷感、歧視、某些固定的疏導或昇華方向、性知識與專業權力的勾連等等。這之中大致可以歸納出兩點（這兩點和本文前面提及何春蕤對性現象的文化批評之兩個基本認識是互相符合的）：第一，性壓抑就是對性的差異或多元多樣性的抹煞，而這種抹煞造成情慾文化的貧瘠，情慾軌道的窄化。而這些又是由於「性壓抑」已成為各種主流權力（異性戀霸權、資本、國家、父權制等）的具體施為。

第二，性壓抑就是對性少數的壓迫，對性少數的情慾人權、性模式、性文化或生活方式的壓迫。

性解放因此必然包含了這些性少數對性壓迫或性壓抑的反抗。換言之，在現階段，性解放就是性少數的政治。性解放的論述故而必須召喚出性少數的認同，讓越來越多的人（性「多數」）認同性少數，反抗性壓抑：亦即，讓越來越多的人體驗及認識到性壓抑對我們身體的馴訓，性壓抑對更多樣可能愉悅的禁止，以及權力如何運用單一的或「正常的」情慾模式來維持不平等權力關係，等等。

由於這篇文章不宜寫得太長，所以很多地方寫得有些簡化粗糙。在未來，我希望人們能更嚴謹地探討性解放的理論，以對抗主流的性論述。

女性解放是反對勢力的重要環節

何春蕤按：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女性學學會在臺大學生活動中心舉辦一系列的演講，其中我也講了一場女「性」解放，內容則是我近年來在各地演講情慾解放的一個簡單綜述。事後，媒體以「打破處女情結」來描述演講，之後在許多媒體上竟然還引發了一連串的後續反應及討論。以下這篇報導記載的是《自立晚報》記者王幼玲在三月九日對我的採訪。

【記者王幼玲臺北報導】中央大學英語系副教授何春蕤今早表示，她昨天的演講內容並沒有什麼駭人之處，因為如今校園的處女已經非常稀少，校園的性活動也很頻繁。而她演講的主要目的是挑戰現有的反對勢力，除了致力打破政治、法律公共領域上的不公平，尋求執政的可能外，也要發掘生活、文化、情慾各種邊緣被壓抑的力量，才能維持反對力量的活力。

何春蕤說，現在大學學生對性已有較多的探索，性活動也很頻繁，她昨天的一番演講對大學生而言其實並沒有什麼「稀奇」。

何春蕤說她希望透過昨天的講題為被壓抑的情慾活動在反對政治的活動中找到解放的出口。現有

的反對運動一直停留在公共領域，主要是針對政治體制中不民主的法律和政治做訴求，尋求如何合理的統治國家，基本上是站在準統治者的立場，一旦得權之後也將成為另一個統治中心，仍然是父權體制。但是真正的反對力量不能只是在政治議題上的激進，它也要在生活、文化、情慾上發掘各種被壓抑的力量。過去政治、民主、開放受到壓抑，而有反對的勢力產生；同樣地，情慾的需求也遭到壓抑，而且更為嚴重，非但它們的立場、需要、理由不能言明，情慾的經驗不能傳達，意見也不能溝通。反對政治如果要有活力，就要發掘這些邊緣被壓抑的力量，讓這個議題進入公共論壇的領域，因為這才是市井小民日常生活中最切身的問題。

而女「性」解放是挑戰父權制及反對政治力量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何春蕤指出，一個女人如果在情慾主張上沒有自信，不能自主，不能掌握權力也無法展現力量，那麼在更大的議題上當然更沒有力量去展現自我主張。

第二章

情慾自主

前言

在一九九四年的三月份，首先傳出臺大女學生在宿舍被強暴的傳聞，接著便爆發師大黎姓教授強暴女學生案，以及所謂「七匹狼」的老師名單。四月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也爆發老師性騷擾學生案。五月份遂有「女人連線反性騷擾校園巡迴座談會」系列，以及五月二十二日的「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以抗議學校當局和教育部對這些案件的處理不當。（與此同時，還有文化大學美術系的學生及家長對抗系方獨裁壓迫的罷課抗議，文大學生並且參加了五二二的遊行。）

在這次五二二遊行中曾出現「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的口號，事後竟然又引發另一波媒體及大眾的劇烈反應和討論。有的報紙甚至在頭版頭條的地位刊出「性高潮」字眼，這是公共論壇（public sphere）內從未有過的現象。（註：這個口號常被誤為「只」要性高潮，這是完全錯誤的。女人怎會「只」要性高潮呢？我們要的是各種愉悅和各方面的權力多著呢！）

在過去，「性」、「身體情慾」常被認為是「私領域」的事，不宜在公共領域中討論。另一方面，男性知識分子最喜歡夸夸而談地吹噓公共論壇中每個「人」的地位平等，言論自由等等，卻完全看不到他們的「公共論壇」仍是被父權制的性壓抑所滲透的權力機器。這種公共論壇不但經常是「製造共

識」的機器，更必然是主流排斥邊緣的機器；所以像報紙的頭版頭條這種公共論壇，根本不太可能出現「陰核高潮」、「肛交」等等議題。（有關「公共論壇」的討論，可參考《臺灣的新反對運動》一書，〈公共論域〉一文，頁一二九—一三五，唐山出版社）。這麼看來，五二二遊行的突破效果就更值得我們注意了。

此外，這次「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事件，也暴露出「男性」醫師在知識／權力的網絡中如何「再現」、「管理」、「安排」及「規範」女性身體和相關的性活動。我在《豪爽女人》一書中對這個問題有嚴厲的批判。

對我而言，性解放、性自主或者情慾自主、情慾解放都沒有太大的差別（除了在運動策略上），所以上一章和這一章也沒有什麼基本的分野。

不過這一章有一部分文章的寫作背景和一九九四年的校園性騷擾案有關，所以我把它們和有關性騷擾或性侵害等話題的文章放在本章中。

另外，與校園性騷擾案相關但集中於師生倫理和師生戀的話題之文章則放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

情慾人權

——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

「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的口號，在五二二女人連線反性騷擾遊行中由我們首度從女性的主體位置出發，超越被動的、弱勢的受害者形象，喊出堅定的、自主的女性要求，更扣連了女性長久以來被否定的情慾人權。

性騷擾其實就是一種性壓抑。它使得男人止於偷襲、突襲等等不考慮女人主體性的可憐滿足形式，而不能正面的和女人站在平等地位上交往，追求更大的更完備的情慾滿足。同時，性騷擾也在女人心理上造成威脅和恐嚇的效果，使得女人的情慾生活無法開闊的發展，反而造成無助的、依賴社會保護的柔弱心態。

因此，反性騷擾運動喊出這兩句口號，不但呼招新的自主女性主體出線，也尚在性壓抑之下扭曲存活的男性挑戰。唯有針對性騷擾所提出的性壓抑，來進行兩性情慾的改造與開發，我們才可能根本解決性騷擾的問題。在情慾的自然、平等、自主流動中，誰還需要可憐的、侷限的、不把對方當人看的無聊騷擾呢？

從女人的主體位置出發要求性高潮，也凸顯女人在情慾活動中很少享受滿足，無數的女人在和她

們的男友或丈夫的親密活動中扮演被動的承受者，雖不願意，雖不愉悅，但是在對方的要求下，她們還是屈從了。這些情慾經驗對他們而言是壓抑的、屈辱的，沒有促進自信的歡愉，更沒有鞏固自我的滿足。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要性高潮」喊出了無數家庭主婦在臥室中遭到壓抑的情慾人權，這和現在正在討論的婚姻強暴是直接相關的。

女性身體自主權如果不要淪為一句空話，就不能止於「我們不要」什麼，而要更具體的說出「我們要」什麼。「我要性高潮」是一句特屬女人的說法，因為男人不需要做此要求；所以，這個女性的口號不但凸顯女性主體，也防止這個社會藉著反性騷擾的名目來更進一步規範女人為清純無慾的弱勢者。

性解放教育從小開始

一九九四年五月的女人連線反性騷擾遊行中出現的「我要性高潮」口號，有些人認為對青少年或兒童有不利影響。這個說法其實和他們一貫壓抑青少年的態度是一致的。

我們的父母教育孩子，往往會訓誡：「先把書讀好再談戀愛。」我卻認為，這樣的論調不但壓抑子女的情慾，也壓抑了他們的思考和創造力。要孩子先去成長讀書、待人處事，最後才讓他們去探索身體，發展情慾經驗，等於是醜化了他們對身體的好奇——他們以為對身體有探索的衝動和慾望是不對的，同時也在他們心中植下了陰暗的羞恥和恐懼，這些深刻的陰影會構成孩子的人格結構，即使在成年後也很難消除。

因此，我覺得，父母對孩子的性探索，應該讓他們自然的發展，也不要太強烈的反應，才不致讓孩子的思想過早僵化，以後只會學習別人給予他的知識，而不會自己去開發、創造。

另外，我實在看不出，學習處理性與學習處理其他事情有什麼差別？為什麼要談性色變？或許是父母本身對性就充滿污穢的罪惡感吧！其實，性只是人生活動的一種，就像打球、游泳、吃飯一樣，愈開朗、愈健康愈好。大人如果仍保有過去對性污穢、黑暗的想法，無疑將培養更多性壓抑的下一

代，讓孩子對性充滿恐懼，也使女人心理發展非常不健康，以至於遭到騷擾時都不敢說。我們現在看到的事實是，一代一代壓抑的父母正在複製他們一代一代壓抑的子女。

為了切斷這個複製壓抑的惡性循環，我們需要新一代的自信自主女人。女人的自信，往往是建立在她們對自己的身體的感覺上。能充分掌握身體，大聲說「我要」或「不要」地經營自己身體的女人才最有自信，她們才是我們社會的未來希望。

總之，正像我在《豪爽女人》一書中所論辯的，青少年的性活動可以是有利於她（他）們「身心健康」的，亦即，使她（他）們在自信中成長，培養兩性平權意識，以及形成對於權威和壓迫的主體性。要使青少年的性活動有利於其「身心健康」，條件之一便是揚棄現行為了權力目的而進行的壓抑性的性教育，而代之以解放性的性教育。在後者這種性解放教育中，性教育不再是施行在青少年及兒童身體上的國家權力、父母權力、師長權力、專家權力、社會道德主流權力等的具體作為。而這種非壓抑性質的性解放教育要從小就開始，使兒童自幼年開始便能自主地掌控身體，追求愉悅。

臺灣情慾文化的貧瘠

一向主張女人「性解放」的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何春蕤，直到在最近一項女人遊行的活動中，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口號，才似乎在一夕之間成為全國受矚目人物。一次遊行的神來之喊，倒勝過幾年的奔走呼籲。

這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口號，是怎麼上口的？

帶頭呼喊的何春蕤澄清說，這口號是有個形成過程的。她說，早在女人連線反性騷擾遊行前，她曾在校園巡迴演講中提出「反性騷擾不是反『性』，而是反『騷擾』」的口號。到了遊行當天，支持者中男性最多的隊伍《島嶼邊緣》雜誌在白布條上喊出「要性，不要騷擾」，女工團結生產線的賴香伶又修正為「我要性經驗，不要性騷擾」。

然後，那天，就在宣傳車上，何春蕤想出了這句足以凝聚眾人創意，好唸、有力的口號來，果然一鳴驚人。

何春蕤認為，這句話在遊行當天讓男男女女喊過一回後，還主動要求「再來一次」了好幾回，是因為它鬆脫了女人壓抑已久的情慾防線，讓女人從「不是不要……，而是要……」的可憐兮兮、隱晦

角色中，褪脫為「我要……」的主體地位，而且「要」得理直氣壯，所以大家都「喊得很爽」。

她說，「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是女人對男人下的「戰書」，但這場情慾大戰，要的不是誰輸誰贏，是要求男人正視「情慾是要兩個人共同經營」的事實；說白一點，就是「你有本事，就讓我們一起爽。」「請你把我當完整的人，而不是某個器官或某個部位。」

「臺灣的情慾文化是非常貧瘠的！」何春蕤說，在女人一向被教育成不能主動要求的社會價值下，女人從性經驗中得到的不是愉悅、高潮，只是工具性的價值；就是在這種不平等的情慾關係中，才會參養出男人「偷偷摸兩下」、「突襲一下」就算了的「性騷擾」行徑。

「多麼可憐的愉悅啊！」她說。

「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引發的爆炸力，不止於這些日子來在成年男女間的私下評議。這口號也已成了部分中學生的口頭禪。

聽到這個「後遺症」，何春蕤不緊張，反而說：「哎呀，太可惜了，為什麼朗朗上口的不是小學生呢？」

她說，中小學根本沒有性教育，如果孩子沒聽到那兩句口號，聽到的將是另一套貶抑女人，在報章雜誌上氾濫的錯誤性觀念。她說，這麼自然、健康、積極的性觀念，要「愈早聽到愈好，中學才聽到就太晚了。」

何春蕤強調，「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是發自於人最基本、最自然的需求，「沒想到大家還把這當一回事，可見大家真的很欠缺。」（本文是《聯合晚報》記者邱佩玲的採訪稿）

大聲說我要

我只有一直對老師說：「老師，你不要這樣子！」「老師，我真的不要！」——為什麼我沒有大叫或尖叫？——我平常就不是一個會隨便尖叫的女生。

——師大受害女學生自述

沒有大聲尖叫當然並不表示一個女人沒有被強暴。但是，我們也需要跳脫這個單一的案例來思考：女人的這些反應及其效果是在什麼樣的文化脈絡中形成的。

大聲

女人的壓抑由失「聲」開始。

這不僅僅是不公開發言，不僅僅是沒有意見可提，也不僅僅是在對話中做最好的聽眾。

女人的失聲乃是她聲帶的全面退化。

想做淑女？不想被罵三八？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降低聲音的能量，放棄在聲帶上施力。笑是抿嘴

輕笑，哭是默默飲泣，開口是蚊鳴。

沒有探索自己身體肌肉的運作，沒有嘗試全身能量的瞬間收放，沒有經歷情慾波動的大起風浪，女人的聲帶遂隨著肢體能力的萎縮與自主意志的薄弱而閒置退化。

女人想，大叫有什麼難的呢？萬一危急的時候，我也一定能像電影中的女人那樣放聲大叫的。大叫一向都是女人的專利嘛！

不！妳錯了！不信的話，妳現在試試看叫聲能有多大。

大聲說話是自信，也是氣勢。大聲叫喊是義無反顧，更是全力投入。這種開闊忘我只有歌友會上的小女生還保留了一些能耐，但是那也只有是集體的情緒宣洩上才出得來，好在這些宣洩至少阻止了聲帶的繼續退化。

可是，對於一向小聲說話的妳而言，連情緒的宣洩也是壓抑的。

因此，讓我們開始鍛鍊我們的聲帶，操作我們的能量吧！如果男人有很多機會傾全力運用聲帶（如軍中的答數報數），女人為什麼不嘗試集體找回聲音的主控權呢？

我要

男人從不嚴肅對待女人說的「不要」。他們不確定女人是真心還是假意，因為，我們的社會從不容許女人痛快的說「我要」。

「我要」意味著女人肯定自身的情慾，肯定追求自身愉悅的權利。能說「我要」的女人不再是個

被動從屬的弱勢者，等候他人的情慾推動自己。相反的，當她說「我要」的時候，她的情慾是親密關係中平等並列的玩家。

「我要」意味著女人不再玩討價還價的遊戲，她不再用「不要」來脅迫對方提出更確切的承諾條件，她不再用「不要」來增加清純形象的籌碼。相反的，她痛快的、自主的、有力的說「我要」，不為婚姻愛情進行交易，只問身體的主權是否得到伸張。

因為，女性的身體自主權並不意味著有能力說「不要」而已，自主必然也包含著說「我要」的權力。

只有當女人能夠自主的說「我要」的時候，她們才能夠強而有力的說「我不要就是不要，因為我要的時候，你一定會知道」，既不含混也不模稜兩可。

當女人打出一片能說「我要」的天空時，違反而且侵犯女人身體自主權的男人就再也沒有藉口怨怪女人口非心是，再也沒有藉口漠視女人的抗拒，再也沒有理由脫罪了。

我們女童

當統計數字顯示，大學女生有百分之五十曾遭受不同等級的性騷擾或侵犯時，許多人大吃一驚。可是，這個研究報告絕對大大的低估了女性遭受性騷擾或性侵犯的實際數字。極有可能所有的女性都曾在生命過程中遭受或多或少性的騷擾與性侵犯，而且絕不止於言詞或窺視。

百分之五十這個數字建立在受訪者有意識的記憶回溯上，可是，根據我多年累積的精神分析案例來看，絕大部分（特別是童年的）性騷擾及性侵犯經驗是潛藏在無意識中的，只有在夢境或某些心理情結甚至強迫性行為中才顯露端倪，透過分析才能抽絲剝繭，稍窺全貌。

女性之所以記不得這些經驗當然有其原因。童年時對性事的懵懂無知，使她們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無法提出明確的理解和描述。再加上侵犯者多半是自己周圍的熟人，如父親、叔伯、舅甥、兄弟、鄰居、老師、堂表兄弟，這些性侵犯也往往是在最家常、最普遍的空間或活動中進行的，在血緣和親情友情的外衣遮掩之下，這些性探索、性侵犯的行為並未被理解為有害的。只有在年事漸長時逐漸由社會的規範與常規中，間接地體會到這些事情有欠妥當，是應該羞愧的，也因而同時將這些回憶潛抑到無意識中，只模模糊糊的對身邊的某些人產生莫名的厭惡與迴避，更對性事抱持莫名的恐懼與

羞恥及其他矛盾情感。

這裏所說的「莫名」正點出了童年性侵犯的隱匿。而這些無意識中的情結也構成了女性的性心理結構原型。

我相信幾乎每一個經歷女童階段的女人都曾暴露於這些侵犯之下，而我們這個過分性壓抑的社會所做的，不但是把性當成禁忌因而將這些經驗轉化為女人心靈中的重大創傷；更可怕的是，它也過分的性壓抑，誘使男性以最弱勢的性對象人口——我們每一代的女童們——作為性探索和性發洩的最方便目標。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最簡單的原因當然是：脫離女童階段的女人不會輕易的提供發洩與滿足，因為她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已日漸看清，這些發洩和滿足不能白白提供，而必須在愛情或婚姻的承諾下才有足夠的正當理由進行交換。社會便是透過女人的拒絕，女人的自我壓抑來達成整個社會的性壓抑。

既然脫離女童階段的女體需要以不少代價或風險才可一親芳澤，那麼，還在女童階段的柔弱無邪身軀便成了男人累積性知識和性經驗的最有利管道，不但易騙易犯，而且即使是小男孩或青少年男性也可以輕易在女童身上找到發洩，這正是男性成長過程中必然從事的性探索活動。男人的性發洩與性知識，以及由之而產生的力量及權力則是建立在我們女童做為性白老鼠的基礎上。

做為一個過分性壓抑的社會中的犧牲品，女童肩負著性壓抑的安全氣閥與性白老鼠的雙重重擔，而帶著這些幽暗罪惡的感覺，她們一個個成長為我們身邊默默活著的女人。

陳淑樺・陶晶瑩・性

許多女人每次聽見陳淑樺的〈一生守候〉都深有所感。在娓娓細訴的幽幽歌聲中，一個寂寞的女性道出她的等待：

等待你慢慢地靠近我，陪著我長長的夜到盡頭……
等待你默默凝望著我，告訴我你的未來屬於我……
等待你輕輕拉我的手，陪著我長長的路慢慢走……
等待你緊緊擁抱著我，告訴我你的心裏只有我……

令人難過的是，這個（假定已經成年的）女性在感情的事上無力採取任何主動，她只能等候：等候那個男人到來，等候他表態，等候他留下。而且，她也無法直接告訴這個男人這些話，只得以輕柔的低姿態，間接以歌聲向世界傾訴她的期望。

或許歌中虛構的女主角正陷在與有婦之夫的愛戀中（歌詞中也說「管別人心怎麼想，眼怎麼看，

話怎麼說」)，因此不能採取太主動的做法，而只能在小小的愛巢中自我安慰式的進行「一生的執著」。可是，一般來說，女性在感情和婚姻的事情上本來就是被視為被動的一方，只能等候白馬王子的降臨，卻不能主動去大街小巷中找他，追他。

年少之時，女性的被動位置還有法子改善。她們有學校生活、社團活動、宗教聚會等等「正當場合及理由」，可以用集體或小團體的方式為自己與對象製造一些可能產生接觸或滋生情感的機會，在所謂自然的、偶然的、正常的掩護下，迂迴地達成主動的效果。

可是一旦成年就業，女性發現自己的路突然變得十分窄小，由於教育程度、職業取向、生活形態等等因素的區隔，她們愈來愈缺少廣泛的機會與場合，再加上我們社會「女有歸」的傳統作祟，成年女性的額頭似乎被烙上了「擇偶中」的印記，只要她們參與任何戶內戶外的感性知性之旅，就會引人聯想她在主動找對象，這種壓力當然更使得成年女性縛手縛腳，不敢妄動，只能默默等待所謂「緣分」的到來。

成年女性對美好愛情與婚姻的憧憬在〈一生守候〉的深情期許中找到了表達，而年紀漸長卻仍小姑獨處的陳淑樺正好吻合了她們的自我形象，提供了幻想的抒發化身。

但是，這種被動的退縮態度已不能滿足新一代充滿自信的年輕女孩。因而新秀陶晶瑩的〈天空不要為我掉眼淚〉才唱出了「看見好的男孩，我一定去追」的主動戰略，以開朗而理直氣壯的心情（「像我這也沒有什麼不對」）來面對兩性互動關係。

可惜，即使這個看來主動的求偶策略也必須加以包裝淡化，才能出現在市場和媒體中。首先，女

孩的主動態度必須有先決條件：「看見」「好的」男孩才能主動追；這個假設留下了兩個藉口，讓許多女孩可以用「我還沒有看見好的男孩」來解釋自己為何只坐著「看」而不起身去「找」，也讓許多女孩在等候抽象虛幻的「好的男孩」中蹉跎歲月，在口頭的主動和崇高的理想中掩飾實際的被動。

其次，這個表面主動的策略必須以一個沒有威脅性的低姿態出現。所以音樂帶中呈現的是可愛童稚圓臉的陶晶瑩（而非叛逆形象的李明依），以清越的童音唱出撒嬌般的詞句，淡化本來可能有點不易被男人接受的女性主動策略，而代以天真無邪小妹妹的少年勇氣（「我的心永遠不會碎」）。結果，歌者雖然宣告主動，但是她的涉世未深（「我還沒有機會替任何人傷悲」）和討人憐愛的天真形象根本不會威脅到男性在求偶過程中的主控權，男人覺得他還是罩得住的。

成年女性在婚姻上的主動或少年女性在愛情上的主動為什麼對男性來說有那麼大的威脅呢？這主要要是因為這兩種主動都暗暗隱涵第三種主動，那便是女人在性方面的主動。這種主動直接挑起男人在無意識中對本身性能力的焦慮，對那些在這方面缺乏信心的男人來說是非常恐怖的。因此，〈一生守候〉以默默深情替代成年女性對性的需求，〈天空不要為我掉眼淚〉以童稚天真的「無性」狀態，模糊少年女性的性衝動（諷刺的是，國中生模樣的陶晶瑩事實上當時已經大學四年級了）。畢竟，女性唯有以這種性壓抑的形式呈現自己才能被那些缺乏信心的男人接受。

這樣說來，父權制度規範女性被動是因為男人在無意識中恐懼她們主動，而這種恐懼則源自男人對本身性能力的焦慮。

男男女女
篇

第三章

家庭主婦／母親

不「偉大」的母親，萬歲！

母親節的時候總要玩一個單向的身分認同遊戲。由每一個人，做為兒女的情感需要出發，召喚天下的母親就位，以便接受感恩。

這種單向的情感謳歌營造出一股強大的壓力，讓那些沒有活出偉大母親形象，甚至沒有盡到母親義務，因而愧對接受感恩的母親們，飽受罪惡感和羞愧的煎熬。

她們可能是生而不養，熱中於追求自己喜歡的自在生活的享樂母親；她們可能是拋夫棄兒，追尋新的愛情與性慾經驗的不貞母親；她們可能是與丈夫不和，不願忍受欺凌而丟下兒女的逃家母親；她們可能是不喜打理家務，也想不到別的人生出路的自棄母親；她們可能是太過壓抑，無法紓解鬱悶的虐兒母親；她們甚至可能是不肯「體驗生養的喜悅和痛苦」，拒絕生兒育女的母親。

不管是哪一種「不盡職」的母親，在母親節的光環照耀之下，她們感受到的是來自單一身分角色的壓抑。

其實，她們同時還是期望掌握自己生命的獨立個人，是有理想的畫家、小說家，是憧憬驚心動魄愛情的女人，是愛打扮愛幻想的做夢人，是想有專業有經濟能力的自立者，是嚮往環遊世界的探險

者，是愛吃夜市不想燒飯的遊盪者，是被迫接受條件還可以但是情感不怎麼樣的婚姻無趣者。

可是，這些各種各樣的衝動和需要，這些情慾波動的模式和身分認同，是不會被「母親」的單一自我犧牲自我壓抑之形象包容的，即使是打破成規的單親母親或未婚媽媽，或是逐漸浮現的同性戀媽媽，也必在「母親」的角色上盡忠職守才會被社會接受。

於是，我們訝異的發現，愈是歌頌某個社會身分的偉大，愈是肯定感恩某個社會身分的「特殊貢獻」，我們就愈是使用單一的形象和尺度來期望這個原本複雜矛盾的個人。

正是因為母親的理想形象暗暗扣合父權邏輯，那些不為子女犧牲奉獻的母親才遭人批評，那些不好好料理家務烹調飯菜的母親才被人不齒，那些追求自身快樂和滿足的母親才受人唾棄。在「母親」這個單一身分的尺度上，凡是不合格（不合父權邏輯）的母親都要被懲處被放逐。

出於兒女位置考量的母親形象因此是對做母親的壓抑。它否定了做母親的個人還有其他身分及他需要。

所以，讓我們想一想我們的懶母親是在什麼樣的壓抑生活中退縮為自保的低能量過活，我們的壞母親是在什麼樣的鬱悶環境中變得易怒煩躁，我們不安於室的母親享受過什麼樣單調無趣的性愛情慾生活。

讓我們想想這些母親是如何辛苦的、掙扎的活在身分認同的複雜矛盾中，也讓我們歌頌那些敢於實現自我，敢於不為子女抹煞自我的母親吧！

在慶祝母親節的今天，讓我們也高呼：懶母親萬歲！壞母親萬歲！不貞的母親萬歲！離家出走的母親萬歲！因為，這些不倫的母親正是由父權體制為母親規畫的軌道中逃逸的偉大母親！

懶女人

比起懶惰的男人來，懶惰的女人好像少了那份理所當然的天經地義，因此她們在旁人眼中遭遇的也只有高度的不屑而沒有體諒的包容。

撇開「我的勤勞在你眼中是懶惰」這種相對主義的差異不談，我們可以由懶女人所處的社會情境來認識她們低能量生活。

好幾位計程車司機向我抱怨他們的妻子每天只在家中睡覺，什麼也不做，再問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相處時，他們的回答是：我賺錢給她花，休假時帶她出去走走，她還要什麼？而男人不明白的是：我們這種高度性別分工的社會給了男人追求成就感和獨立自尊的機會和訓練，給女人的卻是除了婚姻之外沒多少出路的依賴關係，再用八點檔的瓊瑤和九點半的激情來安撫。面對著沒有自我實現的能力，必須在有限的選擇中匆匆結婚，婚後又顯得更加孤立，女人哪提得起勁來為毫無指望、了無情趣的生活用心營造呢？

有許多女人勤快的收拾並布置房子，那是因為家是她的堡壘，是她可以自傲的展示主權的地方；可是，並不是所有的女人都這種提供成就動機的位置上。一個陷身於婆婆威權、丈夫宰制或妯娌壓

力中的女人極有可能用消極的方式度日：反正主權不在我，何必多做多錯多找麻煩呢？

懶並不是人格上的缺憾，或是未養成良好習慣。懶是沒有指望、沒有快樂、沒有自尊時的消極自保策略，而這種低能量的生活，在不考慮個別社會條件而只要求大家都符合規範的環境中，自然會被冠以「懶」的惡名。

而且，在懶女人的例子中，懶是特指這個女人沒有執行父權社會強加於她的、那些以他人的舒適與快樂為目標的職能。由這個角度來看，懶女人事實上是一種消極抵抗，是一種對性別分工和社會制約的無言「行」抗議。

脫軌的女人

學過木工的鄰居決心自己動手將二樓後面的一間小屋釘成和式地板，以便把住在一樓前院的一雙小兒女遷到安靜的後院，砰砰地釘了一個星期之後終於完工。我問小兒女感覺如何，他們都說很喜歡，我接著問，有沒有感謝爸媽的辛苦，小男孩卻斬釘截鐵地說：「只有爸爸出力。」媽媽在一旁很委屈的說：「難道我沒有幫忙嗎？」小兒子說：「只有最後一天才有幫一點點。」

做為緊鄰的我當然聽得見他爸爸每天下班後在二樓不停的砰砰聲，有時甚至到晚上十點才休兵，對他的辛苦我一點也不懷疑，但是，聽見他兒子這樣分配成就及功勞，我卻無法忘記鄰居太太在過去那段日子中尖銳的喊叫：「基亭，吃飯了！」「基亭，洗澡吧！」「基亭，電話！」我甚至懷疑，如果鄰居太太沒有做飯、沒有照顧在學的兒女做功課、沒有收拾換洗的衣物、沒有鬧鐘般地替家中維持起居的程序，那麼，鄰居先生哪來那種無後顧之憂的衝勁與執著去釘地板呢？可是，就連在日日共處的兒女眼中，爸爸的「成就與功勞」才是手摸得到的、證據確鑿的，而媽媽所做的一切都是透明的，只有那最後一天替爸爸搬幾塊木板才算得上有功勞。

家庭分工的評估往往都是這樣的。那些日常的、維持性的工作總得不到重視或感恩，因為它們就

像每刻呼吸的空氣一樣，重要到一個地步，它們就等於生存本身，是一般人不會去思考或看重的——直到它們不再存在之時才驚覺到它的必要性。

這種自然的，引以為當然的態度使得一般人在例行公事遭到中斷或改變時產生極大的不適應。如果有一天媽媽不做她的維持性工作而坐下來唸空中補校的功課，家人立刻加以譴責，認為她本末倒置，要求她把優先次序排回原來的樣子。家人的要求或許不是出於自私，畢竟，對他們來說，他們的生活安排是天經地義的，是社會的自然法規。可是，這位女性的「脫軌」行為正凸顯了原來的軌道設置是人為的安排，是可以經由人的作為來更改或取消的。

事實上，正是因為過去已經有無數女性脫軌才改造了我們的生活世界。她們拒絕纏足，她們上學堂唸書，她們習武練劍，她們掙脫不幸福的婚姻，她們獨立自主的工作。當時視為脫軌的事開闢出如今女性生活的空間。

要是不脫軌、不抗爭、不挑戰自身在家庭中的透明地位，鄰居太太就不會明白為什麼她的苦勞沒有人承認。要是她不去創造一個環境讓她的子女明白這種論功行賞的不公平性，這個惡性循環還會再繼續下去。

在我們這個不平衡發展的社會裏，不同的女人被她們個別環境中的不同軌道限制著。她們所做的一切在這些軌道上透明的，是被視為當然的。脫開自己慣常的軌道雖然帶來某些困擾，但是同時它也亮起改變生活世界的可能。

一餐一菜

根據調查，相對於西方國家的婦女來說，臺灣地區的婦女花在準備三餐上的時間特別多，這當然和中國人的飲食習慣有關。

中國菜好吃是沒話說，但是準備起來可費事得很；不但如此，一貫不把婦女的時間當時間的中式飲食方式，還要求每餐至少得三菜一湯才算烹調者是盡職的主婦。「從小學教科書到電視上的廣告，哪張餐桌上不是整齊齊的擺滿了各式菜餚，旁邊還站個清爽乾淨、驕傲滿意的主婦？」

正是這個我們引以為當然的期望，使得全家上下（包括主婦自己在內）都無法接受更簡單的吃食方式：缺乏反省的老公會抱怨老婆怎麼不像自己的母親那麼能幹，慣壞了嘴的小孩更是嘟囔著菜不好，主婦則焦頭爛額的買食譜，學做菜，生怕自己有虧職守。

其實，要吃得均衡和營養，並不在於同一餐要吃各種菜式。一道青菜炒肉絲就可以兼併西式飲食中的沙拉和葷主菜，只要配合得當，每餐一道菜絕對吃得健康，而且很有味，烹調工作的簡化也會鼓勵家中成員加入分擔。本地的大廚和巧手們應該發展的正是這種一餐一菜的省事健康食譜。

有人也許懷疑一餐一菜會不會太單調，這是個習慣的問題。中國人的飲食文化一向建立在平等

的性別分工基礎上，是婦女的時間和勞動換來三菜一湯的口味享受。現在，當性別分工的形態逐漸轉變，女性不必再用家事及烹調能力來證明自身存在價值，而可以發展專業的技能與志業時，日常的家庭飲食也會向著全家合作分擔的、營養均衡的一餐一菜邁進。

那些被「賢慧」的女人慣壞了的腸胃們（包括男與女），遲早要學會適應新的、尊重烹調者生命的家居飲食文化。

私房錢

——太太家務勞動的薪水

想到「私房錢」總令人聯想到一個自私的、剋扣伙食費的、藏著小秘密的太太，於是談到這件事的時候也給人「私自挪用」、「來路可疑」的印象。

可是，私房錢真的是「黑錢」嗎？如果家庭預算中有子女零用錢及丈夫應酬費，而且這兩筆錢的使用是理直氣壯，有正當理由的，那麼，為什麼獨獨只有太太無權在正式預算中擁有自己可以運用的款項？而被迫在預算之外創出新的名目和資源而且存得心虛，用得理虧呢？

這裏牽涉到的是一個權力的問題。也就是說，太太的「家」民（相對於國民、公民）資格沒有得到應有認定，她的人權也沒有得到與其他成員同等的伸張，她的家務勞動因此被視為理所當然，沒有經濟價值。

當然我們常聽許多人說太太的貢獻有多大，太太的苦心多麼深等等褒獎的話。可是，好話說得輕鬆，一旦丈夫下班回家，嚷著好累好餓的時候，太太的「家」民資格便暫時擱置，而改做下女或廚子。一旦需要在太太的進修和子女的家庭教育中間做一權衡時，太太的人權總是落在母職之後。一旦論貢獻以決定權力歸屬時，太太總是在一句「妳賺了多少錢」之後語塞而屈服。

對那些自己做事、有固定收入的中產婦女來說，這些問題不是問題，她們只要祭出自己的薪水袋來便可解決大部分困難。但是我們之中還有很多婦女沒有外出工作，或者即使有收入也沒有權力支配薪水，她們便只能在私房錢的範圍之內為自己尋求一點運作的空間。

其實，早就有人做過評估，顯示一個太太的家務勞動貢獻在今日的社會中如果換算成雇傭勞動可以抵過很大一個數字。如果太太的家務勞動可以抵算成那麼高的薪水，那麼，太太當然和先生一般有同等權利決定家中預算，而且更有資格和家中其他成員一般，名正言順地在正式預算中占有一份自己可以全權運用的花費。如果先生花錢去理髮、洗三溫暖或者和客戶或同事應酬唱卡拉OK是有助於他的工作發展，那麼太太做頭髮、聽演講會、逛街、甚至讀空中大學，也是有助於她愉快地進行家務勞動的。

一個家庭的財務運用中有絕大部分是全家共享的，在非共享的部分中，家中成員應該有同樣的權利分配。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私房錢只不過凸顯了太太長期被剝削權利的事實：正是因為太太沒有享受到她應有的自主權利，連她營造出來的微小自主空間也被描繪為「自私的」，而其他成員的自主開銷卻是有理的、必須的。

認識了這一點以後，太太應該拒斥私房錢的說法。她們和家中任何成員相同，都應該在家庭預算中占同等的運用比例。

袋鼠媽媽喊救命

——何春蕤&朱天心

你在路上觀察過

帶著孩子的女人嗎？

留在你腦海的印象是什麼？

——滿頭大汗找廁所把尿。

——給哭鬧的孩子一個巴掌。

——給不耐煩的公車司機轟下車。

她們的苦悶，你了解嗎？

何春蕤：很多人一提到「不上班的女人」都會直接反應，「哇！好輕鬆！」果真如此嗎？問問袋鼠族，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

朱天心：問我最好。自願扮演了兩三年袋鼠族的角色，像隻母獸，終日盯著那隻毫無理智的小獸，每天只能說些簡單的兒語，我常懷疑自己連正常的語言能力都喪失了。

何春蕤：每個女人全心投入照顧幼子的階段，生命猶如被吸血過多似的消耗殆盡。可悲的是，當母袋鼠盡其生命來照顧孩子時，卻被視為是沒有生產力的一群，這實在很不公平。

朱天心：就拿寫作來說吧，男性在家專心寫作，大家肯定他們是「專業作家」，不為五斗米折腰；我在家帶孩子兼寫作，卻被譏為「閨秀作家」，不食人間煙火。一切的評價，完全把袋鼠族摒棄於社會主流價值之外。

何春蕤：我們的社會常以做什麼工作來界定一個人的價值，而家庭主婦沒有領薪水，就表示沒有工作、沒有生產力，其實家庭主婦在家做家事，帶孩子，也是在工作。

朱天心：不但沒人支付薪水，我們一旦選擇當家庭主婦，似乎就會被界定為沒有知識、不求長進、幼稚保守的角色。不少職業婦女時常在我們面前抱怨她們有事業和家庭的雙重壓力；言下之意，家庭主婦是多麼輕鬆似的，其實家庭主婦的壓力，由於非我族類，是很難真正體會的。

何春蕤：職業婦女壓力固然大，但是她們的呼聲也大，不像家庭主婦，一直扮演「沒有聲音的女人」，可以說是社會上的弱勢族群。

朱天心：豈止是弱勢，甚至還是被孤立的族群。想想看飯店、咖啡廳、電影院等一些工作族下班後去的場所，絕不容一個媽媽帶著孩子出沒；朋友間的問題，也很難插上嘴，久而久之，袋鼠媽媽就只能出沒於一些畸零角落，與社會脈動脫節，成了「畸零族群」。

何春蕤：的確，我們社會很多休閒場所的設計，幾乎都不適合帶孩子出入的。我們留給袋鼠族的空間既是如此狹窄，又如何要求他們拓展生活空間呢？

朱天心：其實當一個袋鼠族，最大的干擾，有時還是來自周遭朋友價值觀的比較。我有一個朋友，十分嚮往做家事、帶孩子的樂趣，於是辭去工作，專心當袋鼠族。但是她的朋友，總會有意無意地告訴她「沒工作的人，是沒有價值的人」如此的訊息。我常懷疑，一個不被聘雇的人，難道在社會上就真的沒有價值了嗎？

何春蕤：說主婦是沒工作、不事生產是很偏頗的論調，女人在家扮演廚子、管家、女傭、保母、家庭教師，為家庭省下的每一筆錢，就是她所賺到的。每次聽人說，女人從先生那兒揩油存私房錢，我就很生氣。主婦自己存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先生是必須付予太太薪水的。先生賺的錢，在扣除家庭開銷後應均分二等份，一半是太太的薪水，才是公平。

朱天心：如果大家都有這種夫妻平權觀念，就太好了！肯定了主婦在家的價值，主婦能理直氣壯的干活。

何春蕤：報紙常報導有些媽媽帶著孩子投河自殺，很多人大概很難以理解，何以家庭主婦不用負擔家計，不須拋頭露面，每天單純的過日子，情緒還會走上死胡同。

朱天心：沒錯，我們的社會是不太允許家庭主婦有太多情緒上的波動，甚至很多文章還會用「帶孩子是多麼快樂、偉大、有成就感」這種話語，來麻醉家庭主婦的情緒。一旦主婦發現自己表現得不如書本上所說的那般快樂、偉大時，心理難免就會有所衝突，其實這又是袋鼠族另一種難以突破的困境。

何春蕤：談了那麼多，我想做一個結論，有孩子的已婚婦女之所以變成袋鼠，是這個社會壓抑女人、

犧牲女人、扼殺女人的結果。我們應該要求社會的組織和分工方式徹底改變，好讓女人不必再做袋鼠而可以做自我實現的女人。（本文是朱天心與何春蕤的一次對談，由《聯合報》記者朱鈴珠所記錄整理。）

第四章

同性戀

同性戀拒服役

——沒有享受國民的權利，當然不必盡

報端披露同性戀出具公立醫院精神科醫師證明，並經複檢證實後得免服兵役，這一消息引起許多人的關切。

不管是以「性別認同困難」或「性心理變態」的醫師證明申請免疫，同性戀者面對的是一個冗長繁複而且可能遭受嘲弄羞辱的檢驗過程（竟然有醫師建議用檢查肛門！對付毒販和走私者的手段！做為指標之一），有時同性戀者還被迫在此過程中誇大醜化自我的心理及行為，以符合精神科醫師可能先入為主的刻板期待。即使通過公立醫院精神科的嚴格鑑定過程，同性戀者還得迎接軍方醫師的再度而且更嚴厲（也就是更羞辱）的檢定。

如果有役男還願意付出這種毫無尊嚴的代價，願意此後背負我們這個社會加在同性戀者身上的羞辱與歧視，那麼，我們真的需要重新思考，是什麼樣非人的兵役制度，竟能迫使人們情願付上這種社會代價也不願入伍！

維護兵役制度的公平性的人或許會說，同性戀以其性偏好而免服兵役是一種要不得的特權。可是，如果服兵役是國民應盡的義務，那麼，同性戀者抗拒服役並非特權問題，而是民權問題，也是人

權問題。

同性戀者：因其性偏好及性別認同；在我們這個異性戀主導的社會中從未實現其民權與人權。他們如果忠於自我，呈現他們的好惡，便要冒著失去工作、失去教育、失去尊嚴、失去親情等等後果。他們躊躇不前，徘徊暗夜，正是因為他們唯恐失去這些被異性戀者視為民權人權的當然內容。

如果同性戀者（以及其他邊緣人）以其真正的自我無法享受國民的權利，那麼，同性戀者以其真正的自我當然也不必盡什麼國民的義務。

異性戀霸權退出校園、媒體

在一連串有關同性戀議題的中外電影先後得獎而且票房告捷的旋風之下，媒體似乎也開闢出比較多的空間來對同性戀人權做比較同情的報導，再加上某些學者及專業人士的說理分析，一時間我們的社會看來似乎突然改變一向歧視同性戀的態度，而對異己者顯出無比的包容與尊重。

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六個同性戀團體及愛滋病防治團體聯合爭取同性戀人權的公聽會上，這股正義的暖流卻觸動了我們社會中更深沈的一些恐懼與成見。

公聽會上論者的說理或許是理性的、是具有說服力的，但是對於那些一貫熟悉某種社會秩序，某種權力分配模式，某種階層管理制度的人而言，歧視才是合乎「人性」、合乎「傳統」的。因此在場的某位官員才會以管理者的立場「悲痛的」說，他覺得異性戀還比較「正常的」，如果我們容許開明的言論擴大，將會造成嚴重的教育及社會問題。這種恐懼的浮現大概不是電影《囍宴》的正面呈現同性戀或者專家學者的理性分析能消除的。

根深蒂固的歧視不但是非理性的，也是無意識的。讓我舉個例子說明，公聽會上有不少媒體攝影，有趣的是，在電視螢幕上或報紙圖片上的焦點不約而同的集中在僅代表六個團體之一，但披著一

頭亂髮的名影評人李幼新。這種選擇性的呈現其實正出自我們社會一貫對同性戀的成見。一般人的看法，總覺得同性戀必定是穿著怪異，打扮突兀的異類，不是長髮戴耳環的男性，便是短髮打領帶的女性，卻沒有想過，同性戀或許正和你我一般，而且之中尚有許多聖賢之士。

這些恐懼和歧視，再度的凸顯異性戀霸權對我們社會文化的塑造有多麼徹底，多麼強勢。在這巨大的壓力之下，同性戀人權的要求也因此顯得特別明確，它要求的不只是消極的免於歧視、免於騷擾、免於壓迫；它更要求分享媒體、分享教育、分享資源。它要求正面的、正常的呈現同性戀（包含雙性戀）為正當的生活方式選擇之一。

如果在一個後解嚴、追求社會正義的時代，我們要求一切政治退出教育、退出媒體，那麼，我們也同樣要求異性戀的政治霸權退出教育、退出媒體。

假開明與同性戀

愈來愈多看似開明的人士在媒體上表達對同性戀的接受態度，但是同性戀不只性愛的對象是同性，同性戀還包括了它的性愛文化。所謂「接受同性戀」但不能接受其性愛文化，那就根本是虛偽的接受。

我們用一個明顯的例子來看：

這些開明人士面對尚未有固定伴侶的同性戀者，總是半試探半期待地想知道他（她）們的生活中，到底有多少伴侶，有多朝秦暮楚。遇到了有固定伴侶的同性戀者，則追問是否還會和他人交往。若是同性戀者的伴侶即將前往遠方，這些開明人士就會很嚴肅的問同性戀者是否會為伴侶——請注意這個古老的用詞——「守貞」。

這些問題和問話的方式顯示，號稱接受同性戀的許多開明人士仍然懷抱著一種焦慮，他們急切的想要為自己的「開明」找一個「正當」的理由。

這些異性戀的開明人士或許已經可以接受同性戀愛侶的觀念，但是這種接受有一個隱藏的前提：如果同性戀者的道德水準和「我們」異性戀者相似，那麼「我們」才可以接受他們對伴侶性別的執

著。換句話說，開明人士認為同性戀者可以愛同性，但是他們之間的「愛」必定要合於甚至超過異性戀愛情的「水準」：忠於伴侶，忠於愛情，忠於一夫一妻式的排外關係。只有當同性戀者用道德上讓異性戀者覺得可敬的表現來證明自己的價值時，同性戀者在性愛對象性別上的「不正常」選擇才可以被「諒解」、被「接受」。

異性戀者的這種要求和期待，對許多同性戀者來說是一種換揚不換藥的枷鎖。因為，同性戀者仍然不能以其真正的生活方式存在我們的社會中，他們仍需要在某些方面表現出「正常」（而且比正常更正常）的樣子，他們仍需要照著異性戀的尺度來呈現自己。他們仍不能全身出「櫃」。

異性戀者的這種要求和期待也凸顯他事實上只是假開明而已。他們能接受的同性戀只是異性變化了的同性戀，而且是最合乎父權制異性戀理想標準的同性戀。

後記：

有些同性戀者認為他（她）們的性愛文化並非多元多伴式的，因為他（她）們之中有很多人是忠於一對一的伴侶模式。可是，我想強調，這並不是同性戀文化中的霸權或唯一模式，事實上，同性戀文化中的性愛模式是多樣並存的，而其中多元多伴的性愛模式是一個顯著的特色，一個很好很先進的特色。我們不但不應該壓抑它，反而應該發揚光大它，讓它和其他性愛文化並存。

阿比阿弟的秘密

——為什麼他們不告——訴你

廣告：

工廠裏阿比與阿弟偷閒共飲咖啡飲料，上司巡視至此，見二人相談甚歡，判繼是飲料的功效，不禁追

問：「阿比阿弟，你們兄弟在喝什麼？」兩個年輕人相視會心，狡黠地同聲回答：「不告——訴你。」

可是，為什麼阿比阿弟不能爽快地回答這個問題呢？

明確的說，阿比阿弟眉目之間的秘密就在於：他們的歡愉其實不在咖啡飲料裏，而在他們的同性戀情感。共飲咖啡飲料是他們分享同性戀情感的場合。就這份無法以原相呈現的潛藏情感而言，咖啡飲料只是最表面的替代象徵。

當然這個解讀不是說廣告的構思者在創作時便有意呈現同性戀感情；相反的，廣告中的同性戀暗流是在無意識的層面上運作的，廣告「不告——訴你」的秘密之所以能觸動觀眾心理，也正是因為它

既滿足而又置換（displace）了觀眾自身無意識中的同性戀情感傾向。

如果我們把阿比阿弟的秘密和同一類型的其他飲料廣告放在一起就會發現一些有趣的觀察，在短小的廣告中壓縮了階級、年齡（generation）、性偏好、和文化變遷等複雜相連的因素。

首先提神飲料廣告訴求的是中下層成年勞動男性，正是因為工作上勞累才需要提神養力的維士比或保力達B，因此廣告中強調英雄、豪邁、陽剛等等過人的能力。而且，不管是周潤發的小馬哥或鄭少秋의 楚香帥，都以單打獨鬥的形象在各自的領域中出人頭地，似乎除了提神飲料之外，再不需要其他人的合作。

可是在後來同類產品的另一篇廣告中，提神飲料的場域由工作崗位移到了休閒空間，由顯然是成年男性代表的楊烈與一美少年同乘吉普車出遊，途遇落石而合力推開，以達最後的目的地。在這個呈現中，提神飲料仍是活力的來源，但是男主角已不再孤身打拚，而是與同性伴侶一起享受快樂時光，至於兩人外型上的對比與關係上的親密，廣告是只現（show）而不語（tell）的。

這種強調陽剛、英雄氣魄的訴求在新咖啡休閒飲料維士弟的廣告中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配合目標消費群的新訴求。由廣告的內容安排來看，維士「弟」的目標是年輕的中下層勞動男性，由於年輕，他們還沒有經歷那種需要英雄形象來補償及鼓舞的挫折感，也還沒有內化工作倫理所要求的競爭與力拚精神，因此廣告中選擇了兩個面貌平庸的主角，在基層的但也不太勞累的工作崗位上休閒，以訴求這一代不但以偉大理想幻夢為目標，反而以「腦筋急轉彎」、「毒舌派」等等平凡的小聰明而自傲的年輕少年。

此外，由於年輕，這些少年人還沒有感受到成年男人在性別認同上所承受的強大壓力，還不完全明白不按規則運作的可能後果，因此也不覺得純然陽剛的角色有什麼可取的，反而不自覺地傾向性別角色不十分明顯化的歌手偶像，也不在乎可疑的同性結黨關係。此外，即使被上司探詢時，阿比阿弟甚至還能以初生之犢的勇氣，輕鬆地排解。他們的回答一方面肯定並表達兩人間特殊的、不願讓他人分享的特殊共識，另一方面也向滿臉困惑、無法理解這份感情的成年權威上司提出叛逆的、排戰性的回答：「不告——訴你」。

比起周潤發和鄭少秋之間被成年生活壓力硬生生隔開的分割畫面，比起楊烈和美少男之間合作但默然的關係，年輕的阿比與阿弟之間那個呼之欲出的秘密可理直氣壯多了。

後記：

一九九一年七月份起，維士弟休閒咖啡飲料又推出新產品小虎咖啡，其品牌形象與配搭的電視廣告都有一些意義深遠的轉變。在包裝上，小虎咖啡以日本漫畫男主角的動畫俊男面貌為主導，訴求飽受「城市獵人」等等影響的異性戀年輕男性。在促銷的電視廣告片中則一反維士比、維士弟系列一貫的本土中下層訴求，改用大批金髮碧眼的洋紐，以輕快撩人的動感舞蹈及音樂為主，極力比美進口飲料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型的洋味廣告作風。這種同時援引日本及美國等強勢文化在本地的意識形態資源來促銷本地產品的新策略，正是三洋公司嚐試改變其產品的階級和文化屬性的徵兆；而其廣告的浮面模仿及整體上十分突兀的

文化「大拼湊」則充分暴露出土味向洋味過渡時的文化貧瘠與真空，原本進步的同性戀暗示也在這個過程中被拋棄了。

婚姻

第五章

一面倒的專家

「我的那一半對我十分不好，他不但對過去的女友念念不忘，常怨我比不上她，而且心情鬱卒時還會對我惡言相向，平常也不懂生活情趣。請問諮商專家，我應該怎麼辦？……」

常常在各種媒體上專欄信箱中看到這一類的來信，寫信女子的淒楚之情躍然紙上。

看多了這種專欄的人都知道，專家的答案是依女子的伴侶而定的。即以眼前這封信為例，如果信中女子的「另一半」是她丈夫，那麼專家的意見必然是婉勸女子的耐心，學習容忍，對另一半循循善誘……這類標準廢話。

有一次我搭計程車時也聽見某位諮商溝通專家在廣播節目中回答聽眾打電話來問的問題。其中一位主婦描述她的丈夫如何對她冷淡，多年不和她說話，也沒有好臉色相對，她想知道應該怎麼辦。

專家於是很權威很流暢的開始大談要如何察言觀色，找合適的時機和丈夫溝通，如何設法和丈夫安排一齊出間旅遊，在輕鬆的玩樂中改善關係，如何安排家中布置及飲食來討丈夫歡心等等。

其實，任何有點腦筋的普通人都聽得出來，女子的丈夫根本不愛她，不願意和她和顏相處，可是專家的專業建議竟然還是這些聽來好像有技巧，事實上完全不可能有用的方式，真讓我們深切懷疑他

們是哪門子的專家。

要了解專家的真正解色，我們得換個角度來看這些女子的求助呼喊。假如這封信和那個打電話的女子口中的那一半是她的男友，而且是有婦之夫，那麼，不論雙方是否已有多年的情分，專家會立刻斬釘截鐵的力勸女子與這男子分手，說這份關係不值得女子再付出心血。

有意思的是，對當事人的這個女子來說，這兩種關係（無論是在婚姻中還是在婚姻之中）都是一樣的無趣，一樣的絕望，一樣的痛苦，但是專家的處方卻是天壤之別。

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什麼在這種很常見的半死的關係中，急迫求助的、費心想改善關係的總是女子？而專家不但不考慮如何提高男性的危機意識，吸引後者來共同營造好的關係，專家也不勸這個女子看清這份關係的無望而另謀春天；相反的，專家只提出一大套技巧、方法來把責任推到女子身上，要她們繼續在這無望的婚姻關係中投注心力。

這類的例子顯示了這些所謂的「專家」其實只是社會主流保守力量的維護者，也就是既得到利益者意識形態的吹鼓手。對這些專家而言，在具體的婚姻關係中掙扎浮沉的人如何的痛苦，如何的絕望，都是次要的；捍衛既成的婚姻或家庭制度，才是真正的重點。因此不論個別當事人的處境，專家的處方其實千篇一律的都是：舊有的婚姻規範不容違背或破壞。

專家的預設立場往往忽視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實：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和既有制度規範違背的行為，有可能是個人自我實現或達到幸福的動力或助力，而且同時也可能是社會建立新制度、新規範的觸媒或契機。

像現在婚外情或外遇相當普遍，可是充斥在媒體上的卻是一面倒的討伐，甚至義憤地說「外遇都沒有好下場」。這種近乎恐嚇式的宣傳，對成千上萬外遇的當事人或新的家庭制度的建立，並沒有好處，只是成為個人幸福及社會進步的障礙而已。

試婚

曾幾何時，輿論對「同居」的嚴正道德譴責換成了對「試婚」女性的某種關愛。於是我們聽見許多人說他們反對試婚主要是出於理性的考量：「因為試婚對女性太不公平了，試婚若不成功，男性還沒關係，女性可就損失重大，會影響到她未來的婚姻幸福。」

這個由道德譴責到利害權衡的轉變反映了一些有趣的現實：第一，同居者選擇說試婚而不說同居，是想強調其值得諒解的動機，希冀以終極目標（婚姻）的神聖性來正當化婚約前的作為；第二，反對試婚者意識到高壓的禁制已喪失了約束力，只得嘗試用同情的義憤來建立說服力。

可是，這個「女性試婚損失大」的說法看似由女性立場出發為女性福祉著想，但是實際上對女性的解放毫無助益。它不但沒有挑戰男女在這件事上的雙重標準（許多人贊成兒子試婚但堅決反對女兒試婚），反而更進一步認定婚姻幸福是女子一生的唯一目標（而且是一個憑緣分、靠運氣，不可測試或檢驗的偉大目標）。說穿了，反對試婚的義憤說詞只是恐嚇女性的托詞而已。

由大家對同居（及試婚）的高度關切和強烈反應來看，大家注目的只是同居關係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性的那部分所可能造成的後果。

不過，性的真正關鍵地位倒不在於它可能造成什麼「失足恨」，而是因為一個人在性活動中如何對待對方，最直接的呈現了那個人的心理及人格狀態，這可不是花前月下投射最佳表面形象的約會經驗可以提供的。所以，一般勸女人要花長時間去觀察對方以了解對方人格的說法，倒不如和對方上床或同居來得更實際可靠。

即便如此，性也絕對不是同居關係中最主要的內容。事實上，就目前賓館大廳中大排長龍的高度使用率來觀察，大部分人已不需要為了想試驗性生活配合與否而投入同居關係了。

這樣說來，現階段同居的真正意義在於：同居不必是為了什麼其他終極目的（如婚姻）而採行的準備措施，同居也不再是手段。兩人同居就只是為了想住在一起而已，不需要再找什麼「正當」理由或目標。換句話說，不必試婚，只要同居。

單身、結婚、同居，它們只不過是多元社會中多種生活形態的不同選擇而已。而且，各取所需，各取所愛。

不婚

由於媒體的炒作，一些「不婚族」女性也逐漸引起人們的注意。

其實，一般所謂的「不婚」指的不是拒絕結婚或不想結婚，而只是「不著急結婚」、「等緣分到了自然會結婚」之類消極等待婚姻的做法，畢竟，抱堅決獨身主義的女性並不多見。不過，這種不著急結婚的態度被大家當成「問題」來討論，倒是凸顯出兩個很重要的歷史因素：

首先，我們社會所注意的「不婚現象」建立在我們認為什麼是適婚年齡這個觀念上。

以前在農業時代，人的壽命短，因此很早便結婚以便趕快生育，增加人手，增加勞動力。可是工業革命開始，男工人的工資由維持工人一家人的生活所需來決定（女子當時尚未普遍就業），如果家中人口眾多，這意味著工人需要更高的薪水，如此一來，勞動的成本太高，雇主當然不樂見。特別是當童工被立法禁止後，小孩眾多並沒有什麼太大經濟效用，反而成為負擔。在這種社會條件之下，晚婚和節育逐漸形成風氣和社會共識。後來女子加入勞動市場，晚婚和節育的歷史趨勢就更明確了。

以此來看，適婚年齡其實隨著歷史條件不同而改變。過去二八佳人（十六歲）被當成女大當婚，還嫌有點晚，可見以前女子在少女時期便嫁人了。在臺灣，我們過去常常看到女孩高中畢業便嫁人，

大學的女孩則比較晚婚，但是即便是晚一點，當時也常常是大學一畢業就結婚，或是再等兩年（男友當兵退伍後）也就嫁了。近年來我們觀察到的趨勢則是女孩大學畢業後做好幾年事才結婚。

其實，相對於近年來女性生涯的時間表，三十歲不婚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可是，關鍵在於我們這個相信結婚必然要生育的社會裏，這類晚婚的女子會遭遇到高齡產婦的壓力，因此，這個年齡層的不婚女性特別引人注目。

不過我們可以推想，未來當生育的問題因為科技的發展而消除所謂高齡產婦的壓力時，或者有多人覺悟到人生根本沒有養兒育女的義務，或者認識到沒有子女的生活也可能非常快樂的時候（懷疑這個可能性的人應當想想，我們社會的養兒育女重擔通常是落在女人身上，不必養兒育女而可以自我實現與發展志業的女人當然會快樂）——當這些歷史條件的演進改變我們對婚姻和生育的看法時，適婚年齡會再向後延展，以便讓女人也可以實現她們的人生，到那時，恐怕四十、五十歲不婚的人才會被大家討論了。

其次，除了「適婚年齡」的社會成見會影響人們對「不婚」的看法之外，婚姻制度的實質意義也會影響到「不婚」的現象。

過去的女人必須在屬於男人的時候才有社會位置，因此我們說女人多半說她是誰的女兒、誰的太太、誰的母親，而這些關係都牽涉到婚姻和男人。可見女人當時是在父系制度之內寄生於男人身上的。可是時至今日，我們所觀察到的是，婚姻和男人再也不能為女人提供什麼保障，相反的，女人可以憑自己的獨立和本事開拓自己的專業和社會位置。在這種條件之下，除了法律上有限的效用之外，

婚姻根本沒有什麼實質的意義。既然婚姻不再有什麼意義或保障，人們對婚姻的看法也逐漸傾向可有可無，不婚族的現象當然也更形擴散。

如果我們把女人和男人對比，我們會發現有很多男人（按目前的定義來說）也是「不婚」的，也就是說，他們也過了所謂的適婚年齡而不著急結婚。可是，男人的不婚卻不大引人注意，我們也不會把他們的不婚當成社會問題來討論，這是因為我們社會認為男人的不婚是有「正當理由」的，例如，為事業打拚，大丈夫何患無妻，天涯何處無芳草等等聽來崇高或浪漫的說法。反正我們的婚姻常態是男大女小，不愁找不到老婆，更何況只要有了事業，一定會找到女人。而這些理由卻不能應用在女人身上，女人要是說為事業打拚而不婚，就會有人猜測她一定是「有問題」。

換句話說，女人如果不婚，便是挑戰了社會為女人安排的命定之路，是不會被「諒解」的。由此可見，對女性不婚族的注目和討論把這種現象當成一個「社會問題」，這本身便帶有性別歧視的涵意。

既然主流社會有關女性不婚族的論述暗含著控制、規範這些女性早日脫離不婚狀態的涵意，我們應該反擊這些說法，而且發展另一套論述來指出：進入婚姻就是放棄自我實現和成長的契機，是開歷史的倒車，是對長久壓迫女人的父權體制輸誠。以不婚女人的自由和自主，她們根本不必利用婚姻來逃脫父母的管教壓力，更不必用婚姻來寄託無聊的人生，因為，她們的人生有的是事情做呢！

解「毒」婚姻

如果未婚的妳每次經過新娘世界、禮服廣場等等掛滿結婚夢幻的櫥窗時忍不住要駐足欣賞，如果未婚的妳仔細追蹤媒體中所報導愛情終成婚姻的明星浪漫故事，並感同身受的細讀他們婚禮細節，如果未婚的妳憧憬一個忘我的愛人，而且在腦子裏一遍又一遍的策劃自己那神聖完美的結婚日——讓我建議妳順便也讀讀民法親屬篇，因為它才為妳忠實的描繪這些婚姻幻象之外的真實世界。

在妳的主觀看法之內，結婚或許是愛到最高點的偉大時刻，但是就民法而言，妳卻在這一時刻開始，由一個自主自立的法人，降格成為一個無權掌握財產，甚至無力決定這個婚姻要不要繼續的依賴者。

沈緬在愛情婚姻歸屬感之中的妳大概不會感覺到民法的設定有什麼對女人不利的限制，妳相信自己的這個男人好像人還不錯，應該不會到那種惡劣的地步吧！不錯！有可能你們永遠不會對簿公堂，不過，如果妳的保障要仰仗他的善心和道義，不也太脆弱了嗎？更何況，根據趨勢分析，婚姻制度愈來愈不牢靠，妳不會癡心到妄想自己的愛情可以扭轉乾坤吧！

如果妳還想維持一點自主的權力，如果妳不想降格做二等公民，當然聰明的妳就不會沖昏了頭的

裁進婚姻。想要個伴，誰說一定得結婚？喜歡小孩，誰說一定得連小孩的精子來源也一齊接受？

或許妳有點固執，妳覺得還是按照常規結個婚吧！不然，所有的童话故事不都落了空？

如果妳還想結婚，如果妳不幸已經結了婚，我建議妳趕快加入修改民法親屬篇的運動，匯集大家的力量把自己堅持要選的那個婚姻命運改好一點。婚姻既然是男女兩方的合約，妳當然希望合約上的權利義務是雙方平等均攤的，婚約的中止也應該是雙方都有一樣的權力完成的。

再提一件事：在民法親屬篇尚未修改之前，妳若還是執意要投入婚姻，但又想保住自己的財產和其他方面自主權，那麼，妳可能得被迫採取先小人後君子的態度，以處理合約的審慎精神來設立一些基本的權限規劃，並且公證成立。男人可就不必設立這些自保的措施了，因為，民法不但保障他們的權益，連妳的權益也劃給了他們。

這種必要再一次凸顯愛情與婚姻是兩碼事。在愛情關係中妳可以昏頭，妳可以全心全意，妳可以不計代價。但是，愛情的捨己忘我在婚姻的合約精神中只是愚蠢的自虐而已。妳還是想清楚一點，維持妳的自由和自主吧！

為什麼妳應該同居而不結婚

女人對婚姻的憧憬是自小開始被培養的。

每一個她愛聽的童話故事都以王子和公主結婚為結局。每一次辦家家酒時，她都練習如何和鄰居心儀已久的小男孩手挽著手，在野花叢中走向預期的幸福快樂生活。每一篇她愛讀的愛情故事都遙遙指向一個沒有人管束只有人愛護的安穩小家庭。

於是她渴望白紗和鮮花綴滿步道的那一天。

即使有無數過來人向未婚的她暗示不要對婚姻期望太高，即使連她自己也不時有立志做不婚族的衝動，但是那個仍然嚮往婚姻等待婚姻的女人還是暗暗地抱著一絲不悔的希望：她相信別人的婚姻不幸福大約是因為相知不夠，不善經營，她相信別人的丈夫出軌大約是因為妻子不夠體貼，或不能一塊成長。至於她自己，她相信自己是有智慧有能力撐起一個比較完美的關係的，她也默默地相信自己不會像別的女人那麼不幸——這世上一定還有不錯的男人，她只需要等候機緣遇到他而已。

對這種還寄望婚姻的女人而言，婚姻是個歸宿，是個不再流浪遊盪，停下來休息睡覺的安穩避風港。他在燈下看報，我在桌邊織毛衣的溫馨畫面散發無限的安全感。

可是，在婚姻中追求安全感的女人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這種安全感不在女人掌握之中。

讓我們分兩部分來看這個問題。經過多年的努力，大家愈來愈看清楚：民法親屬篇對婚姻關係的規範非常不利於女人。如果女人不要任何一點自主權，如果她願意一切追隨老公的意願，如果她不介意老公掌控她的財產，如果她情願接受老公的一切處置（包括有關情婦的安排）——那麼民法的規範對她來說是沒什麼的，反正再爛的命她也認了。但是，只要這個女人不甘受擺布，想保持一點點自我的主權，民法的框架便會讓她感受到其中的不平等。實在的說，婚姻的法律內容根本就是把女人降級成為二等公民，這種二等公民享受的「安全感」事實上是一種奴役。

有人或許想：我和男友感情深厚穩固，他是個老實忠厚的人，不會那麼沒良心，要和我對簿公堂依法辦事吧！

話是不錯，只要沒有糾紛衝突，法律看來是與妳無關的。可是，在這種條件下的安全感也未免太脆弱了，女人的安全感若要仰仗男人的良心、責任感、慈悲、或是道德原則的話，就表示那是建築在流沙上安全感。主控權在他人手上，妳還談什麼安全感呢？

以此看來，女人一向被教導向著婚姻前進，以婚姻為歸宿，這是個完全不利女人的做法。而且現行婚姻規範尚未修改到男女平權的地步之前，女人最好不要結婚，如果想要有人愛有人陪，並不需要結婚才辦得到，同居與結婚只是一紙之差，卻是自由與奴役之別。

或許妳會爭辯：可是，同居沒有名分啊！

不錯，不過，如前所述，婚姻給妳的名分是姓他的姓，生他的子女，給他妳全部的財產，獻上妳

的自主權。

妳還是不放棄：可是，女人終究是要結婚的啊！

誰說人生來是要做奴隸的？大概妳是被婚姻的夢幻迷昏頭了，才會那麼急切的要穿戴上二等公民的枷鎖。請記住，白紗只穿一天，枷鎖戴上就不容易拿下來，因為民法把鑰匙也交給了男人。

女人渴望婚姻是一個在文化中長久培養出來的傾向，我們不但要為自己解毒，更重要的是切斷婚姻神話的傳播，不要再讓年輕一代的女人再懷抱著婚姻夢想長大。她們應該努力鞏固自己獨立自主的能力，她們應該義無反顧的愛自己想愛的人，她們更應該充分享受並經驗愉悅的性活動。至於結婚與否，顯然和這種自足的人生無關，也就不必當成什麼大不了的事了。

愛情

第六章

速食愛情其實很快樂

臺灣的資本主義社會變動大而快，加上專業主義不發達，就業陞遷的前景堪虞，在這種社會環境內，都會女性當然對愛情的看法比較務實。

她們可以和陌生男人到賓館狂歡一夜，隔天便拎著包包毫無眷戀的走掉，若無其事的回到辦公室；她們也可以在穩定的愛情關係之外，輕鬆地來一個聚得簡單、去得乾脆的速食戀愛。

有人懷疑，她們所經營的那種男女關係不是「愛情」；也有人主觀地說，這類女性的心靈一定空虛。但我認為，那就是愛情，而且，她們大都很快樂（要是社會不給她們加上無謂的壓力，她們會更快樂些）。

現代女性最有機會發展愛情的時機，是在學校就讀階段。原因是生活沒有太多壓力，她們有充分的時間和機會，與異性由相互欣賞、認識、做愛、交往……一路發展成愛情。

然而，一旦走出校園，生活形態便完全改變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吃的是速食，東西舊了就丟，身邊的一切總是不斷在汰舊換新。再加上臺灣專業主義不發達，女性很難掌握長久的一生志業，這種環境的變動和不安定感，便往往促使女性產生一

種務實的觀念。她們覺得追求長久、穩定的事物，其實只是一個夢想——包括愛情也一樣；與其無奈的等候天長地久，倒不如盡情的享受只要擁有。因為，「至少我還擁有過一些」。

進入社會的女性，人際關係也許變寬，但由於受到沈重的工作壓力和年齡等現實因素的考量和影響，根本無法與異性深入交往。想想看，如今上班族每天多半需要耗費兩、三個小時的交通時間，再加上八個小時的上班時間，回到家後，便累得癱在床上，睡眠可說是她們最奢侈的享受，哪兒還能抽出時間來發展一段不一定成氣候的感情呢？

基於這種現實的考量，許多女性便坦然接受速食愛情了。她們已經看出，如果不跳出既有模式，一味追求傳統的長久穩定的愛情，最後可能會失望——社會變動那麼大，有什麼是真的永恆的呢？

當然，她們對長久的愛情關係並不排斥，只是不容易得到而已。而那種不需承擔責任的愛情，既容易到手，又沒有壓力，為什麼不去追求？因此，追求短暫的快樂和滿足的速食愛情便形成了。

如今，年齡在三十歲上下的女性對愛情形態的選擇，歷史包袱最重，是追求情感最辛苦的一族。她們是由舊的愛情觀陪著成長的，新的社會現況又不適用，所以內心經常出現矛盾和沮喪的狀態。再加上現在十幾二十歲的女孩，有很多人已經擺脫貞操和永恆的愛情一套觀念，率性的「瓜分」她們的男人市場，因而造成三十歲年齡層女性更多的心理不平衡。

其實，速食沒什麼不好。沒有速食，太多的女人會被趕回廚房，花一大堆時間做該死的填肚子活動。沒有速食愛情，也會有很多女人眼巴巴的期待遙不可及，甚至永遠不會出現的長久愛情。

過去，女人將愛情視為生命中最重要部分，為了愛情，她們可以犧牲人格、自尊，甚至生命。然

而，這種愛情真的比較偉大？比較了不起嗎？

我不認為。

以前的女性是男人的附屬品，男人不給她飯吃，就等著餓死；不給她尊嚴，就等著被糟蹋。唯其如此，女人必須用心與男人建立良好的關係，以保障自己的生活。而這種手腕最直接的表現便是愛情。

如今，女性角色變得獨立，不依賴家庭、不嫁人，一樣活得很好。這種條件，反而讓女性有機會發展不帶條件式的愛情——愛情就是愛情，不需要貴賤、身高、年齡、是否能穩定長久等等。

女性能夠在愛情上獨立，許多保守男人卻還無法接受這種事實。例如，許多男人還是非常在意自己的太太、女朋友，在他之前是否和其他男人「快樂」過了。

男人的這種心態，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已習慣既得利益的操縱者，要他們如女人一樣的解放愛情，由一個操控女人的角色變成與女人平等，這個過程和腳步自然是比較緩慢的。

但是男人這種心態是壓抑女人的，是不能再繼續下去的。當速食愛情的女性愈來愈多，愈來愈肯定自己的情慾生活時，這些男人也就不得不調整自己了。

當然，現代女性對愛情也不都是那麼務實。許多已經擁有穩定情感關係的女性，便不願、也逃不開那種關係的枷鎖。她們對愛情還是存著浪漫唯美的幻想。例如，每天在家煮飯帶孩子，晚上守在電視機前準時看愛情連續劇的女性，很多便屬於這一類型。

不過，社會的現況預示我們，這種忠誠只把女人陷入更大的依賴，在變故發生時手足無措，這比

拿得起放得下的速食愛情危險多了。

人的心理是歷史和社會的產物，不管現代女性對愛情抱著何種態度，都是有歷史淵源和社會背景的。所以，如果看到女性在經營她們快樂的速食愛情，可別「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字眼形容。其實，那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愛情模式啊！

（按：本文為何春蕤口述，貴族雜誌編輯鄭花束整理）

不再與青蛙接吻

從小時候起，女孩子便被青蛙王子的故事吸引。想想看，如果自己也有那麼一天，在無意中表露仁慈而救回被變成青蛙的王子，然後結成連理，那有多好！

童話畢竟是童話，事實永遠比童話殘忍。一張美國的卡片便一語道破地寫著：「要找到王子，你還得吻不少隻青蛙呢！」關鍵就在這裏：如果女孩子執意要找個理想的王子上嫁，那麼她可能得在泥淖中一隻隻地試周圍的青蛙，有些看來有王子相的青蛙在一親之下，搞不好會現出原形，只不過是一隻癩蛤蟆而已。

難怪有愈來愈多的女性感嘆：「天下的好男人都到哪裏去了？」

其實，就現代女性所渴求的男女關係——那種平等的、互助的、溫柔體貼的、風趣多樣的關係——而言，「好男人」大概不會是傳統推崇的「剛毅木訥」、「敦厚老實」、「刻苦上進」、「獨立自信」等等，因為後面這種男人基本上不能、不會、不肯，或甚至不屑按照女性渴望的那種多情方式過日子。

一旦認清了這一點，渴求情感、渴求平等男女關係的現代女性就不必再吻青蛙找王子了。畢竟，

除了自稱是王子的青蛙之外，男人池中還有許多被排擠在主流之外的魚蝦蟹蚌，他們可能有點娘娘腔，可能浪漫不實際，可能背景薄弱，可能不求上進，可能優柔寡斷，可能收入不穩等等。但是，對一個有能力、有自信的女人而言，這些所謂「不可取」的社會條件根本不重要，她又不要「依靠」這個男人。事實上，這些非主流的男人由於其不利的社會位置，反而比較可能和女人建立起非主流的——即非壓迫性的——男女關係。

換句話說，有女性意識的現代女性如果想要一個與傳統父權模式不同的男女關係，那麼，她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眼光投注到那些與傳統父權理想不合的非主流男人身上。一旦不再尋找王子，她們便不必再吻青蛙了。

天長地久

情話愈來愈有實質內容了。

在資訊不發達，物質又很匱乏的三、四十年前，浪漫小說和情書大全教我們用「海枯石爛，地老天荒」來描述不變不滅的愛情。聽到這種雖不實際卻浪漫得可以的臺詞時，情侶們心中有無限的甜蜜，模模糊糊地感受到那分朦朧的永恆，也在嚴格的層層禮教管束中透過這種誇大的言詞建構出只屬於兩人的有情天地。

現在，誰還相信這種明知不可能的承諾呢？

可是，憧憬還是得有的，特別是對那些適婚年齡的女性來說。於是，我們有了「天長地久」，但是一點也不朦朧了。

首先，這個字勾連的是手錶廣告中的深情男女（一九九三年周潤發所拍的一個手錶廣告，以「天長地久」為標題）。明知現實中不太可能有此情感，於是故事得用電影的方式放在五十年前的昏黃歲月中訴說，歷史時空的差距其實正凸顯了天長地久在現代只有手錶能勉強承諾。

若是你堅持天長地久在現代也必然可能，那麼你一定會想起林子祥和葉倩文在媒體中欲言又止地

營造的才子佳人故事。一九九三年演唱會上兩人互看的眼神在臺下千百對情侶自我期許的祝福中幻化成滿場的「你選擇了我，我選擇了你。」把KTV的曖昧大聲地唱滿體育場（當時則盛傳二人的曖昧婚外情）。

當然，你要是真的不信有此堅情，還是可以由這四個字出發，來追尋短暫交會時的歡樂：「何必天長地久，只要曾經擁有」在小木屋賓館壁上的木框內訴說著一夜凋零的木槿式奔放。

正是，愈是不可能天長地久，就有愈來愈多的商品和消費活動來填滿天長地久的巨大虛幻。

分手總在當兵後

當兵的男人最怕的就是「兵變」。苦心營造的情愛關係竟然在男人「報效國家」、盡「好男兒的義務」之時毀於一旦，不禁令經歷兵變的男人百思不解，怨恨女人薄情寡義，有的甚至採取玉石俱焚的慘烈措施。

其實，分手總在當兵後並非完全是女人的責任，其中還有其他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男女雙方因社會環境不同而衍生出來的差距在當兵期間日漸加大。服過兵役的男人常常稱呼那段期間為數饅頭的日子，也就是說，無所事事混來混去的日子，反正任何遠大的計畫與志向在這兩三年中都必須停擺，一切都要等退伍，男人也因而常常表現出因循苟且懶散無力的生活態度。反觀與當兵者同一年齡層的女友，她在此時由於就業或獨自就學，對社會現實的認知日趨成熟；出於她女性依賴的社會位置，她會特別強烈地要求男友刻苦上進，並對未來的事業發展定出明確的方向。這種對現實世界的高度關切遇到男友漫不經心或者消沈無志的反應，常常會導致女方的不滿，也可能引發念頭要改換一個更「成熟穩重」的伴侶。

除了前述常見的社會原因之外，我們還可以換個角度來考察兵變的形成。

男女雙方的交往其實是透過觀察對方在各種狀況中的反應及表現來歸納出對方是什麼樣的人，會以何種方式來對待自己；換句話說，所謂了解對方，也就是經歷過各種情況下的相應，以致能夠預測並把握對方的言行情緒。

在臺灣的一般求偶過程中，男女約會の場合及狀況都比較單純一致，比較少有多樣的機會來認識對方在生活及情緒上的各種面向，一旦男方當兵，軍旅生活的特殊狀況及強大壓力會迫使男方展現在某些平常場合不會有機會表現的反應。

這些出人意外的表現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第一種是情緒性的。軍中的訓練本來就旨在磨去個別的主任性，使每個軍中人都成為唯命是從的機器人，因此才有「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的說法，這種非人的折磨通常會為入伍之人製造出極大的挫折感與憤慨不平。在休假出營與女友相會時，這些不穩的情緒難免表露出來，極有可能被女友詮釋為脾氣不好、情緒不佳等等的人格特質，種下分手的惡果。

另一種特殊表現是情慾性的。男方在軍中單調但過分壓抑的制式生活中，特別需要渲洩，軍中一貫傳統的、視尋歡為正常男性必經過程的那種彼此炫耀，也激發男性對情慾的渴求，這些慾望於是在與女友短暫少有的相聚時光中強烈的表達出來要求滿足。這對男方來說是自然愛戀的表達，但對比較壓抑的女人來說卻傳達「你只是要我的身體」的訊息，也有可能使女方做出對兩人關係的新評估。

從這幾方面來看，兵變絕不全是女方追求現實因而移情別戀，這其中還牽涉到軍旅生活的非人化以及它對個人的深刻影響。對懼怕兵變的人而言，如何改變這個非人化的制度才是要務。

第七章

女人 · 男人

女人好吃？

那是當然的。小吃攤上、冰淇淋店裏、零售櫃前，處處都看得見大小女人愉快地享受各種食物。不過，如果就這樣結論說女人特別愛吃，那倒也不盡然。一旦我們把眼光調轉到比較正統的飯店或是啤酒屋等「休閒吃所」，就會發現男人也會吃、愛吃、好吃得很。

這個場所上的差異，標式出男人和女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對於吃這件事勾連了不同的意義，以致於在吃的實踐上體現出不同的內涵。

第一層差異當然是男女的經濟實力。從幼時的零用錢到青少年的交友錢到中壯年的應酬錢，再再地顯示出男女社會位置的重要性不同，因此男性的經濟實力多半在分配上被賦予較大的空間來運作，如果再加上社會中本來的同工不同酬或同能力不同工，那就更看得出為什麼男性比較有經濟能力在正統吃所進行其於公於私的社會活動，而女人則多半選擇比較邊緣的、經濟上台算的地方去吃自己愛吃的東西。

經濟實力上的差異，當然不能完全解釋男人和女人的吃，這裏便牽涉到另一組差異：男人在這些場所中表現的吃，多半是手段性的，也就是說，為了應酬、為了友情、為了公務等等「正當」等理

由，而採用了中國文化中最常見的社交方式——吃——來與人共處，而且出手也很慷慨，這種豪爽還往往被視為男人應有的氣度。相反的，女人在各個非正式的場所中吃得滿足、吃得愜意，常常表現出了吃而吃，而且為了自己喜歡而吃，既不講求氣派，也不會硬要表現大方而和別人爭著付錢。

經濟實力與目的手段這兩組差異，其實掩蓋了另外一個有意思的價值判斷，那便是對吃的本質是什麼的看法。我們常聽人說「民以食為天」是強調民生的重要性，可是，在（男性）菁英們口中的「民」以食為天，卻隱然是站在高姿態冷眼旁觀萬民的吃食活動，這也同時呼應了西方強勢文化對「吃」這種「低等行為」的歧見。換句話說，男性菁英們認為，吃由於是出自人類較低賤的本能需要，因此「有識的君子」絕不可屈就於它的引誘，而應該追求另外一些更高尚、更重要的成就，即使要吃，也總是有「正當名目」的。

對於這種吃的歧視，固然牽涉到男性智識階級本身因優勢而來的優越感，但是同時也暴露出男人和女人在吃上面被賦予的不同角色。女人通常是食物的準備者和烹調者，她的社會角色與責任促使她注意口味、質感、價錢、變化等等和吃相關的資訊與實踐，她會找尋新的食譜、嘗試新的食物，計劃著下一頓、下一天要吃什麼、買什麼材料、算好什麼時候準備什麼。而這一切都被男人視為瑣碎的、無聊的、浪費時間的。君子（男人）則必須遠庖廚，不能讓「想要吃什麼」這種低等的願望污染他過人的腦力——只要女人準備妥當後通知他上桌就好了。男人更不能讓準備食物及烹調食物這種浪費體力與時間的瑣碎事務，占據他寶貴的生活內容——他只要上桌時表現吃得很滿意，就算對得起燒飯的女人了。（至於男性大廚們或者一般會燒菜的男人，則有「手藝高超」、「不恥下烹」、或者「體貼

女人」這種褒獎的標籤來合理化其作為。」

這些互為表裏的性別文化差異指向一個重要的事實：男人其實並不是不愛吃、不講究吃、不想吃，很多時候他們這些慾望與渴求，要不是被「正當的」、「必須的」社交理由掩蓋，就是被「君子遠庖廚」的傳統心理所壓抑，以致於他們無法對「吃」——這種最基本的人類需要——採取更主動公開的享受。而更可惜的是，他們竟然不得不把那些主動享受吃的（女）人化為低等、墮落、瑣碎的表現，以證明自身是正確的或高尚的。

談到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致上來說，男人和女人由於社會位置的不同，在吃上面也就表現出不同的關注。女人的注意力，毫無保留地投向和吃相關的色香味，她們不吝於免費的試吃，也不怕實驗新菜，吃對她們來說是一種探險、一種享受——如果不要每天都輪到她烹調準備的話。由此觀來，許多已婚女人喜歡上夜市小吃攤進餐，這並不表示她們偷懶或好吃，外出進餐對她們來說是一項很重要的休假，給她們暫時脫離繁瑣家務的機會。當然，對那些常常在外上班或應酬因而外食的丈夫而言，他們是無論如何也想不透小吃攤的魅力的。

如果說已婚婦女喜歡在外面吃東西，是對例行煮飯公式的消極抗議，那麼單身女性對零食、小吃的執著，可以說是對寂寞無聊時光的填充。很多人提起單身女性好吃便說是性壓抑的變相表現，這當然有幾分道理，可是，用這種方式來變相地表達某種需求是有其特殊條件的。她必須有點財力、有點時間，或者即使是工作時忙碌萬分，下了班之後卻是不知如何打發時光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們會發現不止女人，連男人也常常用和吃相連的活動來排遣寂寞——如抽菸、喝酒，只不過同樣的歧

視也存在於這個差異的表現上：（男性）抽菸、喝酒可能製造出憂鬱傷感等令人同情的形象，（女人）不停的吃可就令人非議了。這也難怪不少女性不敢在男性面前盡興地吃，只得人前少吃、人後大吃了。

總之一句，女人並不特別好吃，她們之所以總和吃攪在一起，絕對是有社會的、分工的、經濟的原因的。

最後，讓我換個方式把文本的論證重述一遍。

大家都認為女人很愛吃，但是，讓我們來看看以下的幾件事實：

第一，男人在外用餐的次數場合（應酬請客）比女人多得多，更不用提男人吃的量也比女人多。

第二，男人在吃上面花的錢比女人多。放眼各個高價位的中式餐廳飯店，滿桌豐盛的酒席菜和供應不停的飲料幾乎全是男人在吃。

第三，男人吃得比女人好。不但有各式各樣的酒宴大餐，還有媽媽或太太為他們精心製作的佳餚。

反觀女人。她們簇擁在小攤小吃零食之間，用最經濟的方式，精打細算地換取最多種類的消費（頂多吃一客有限價位的歐式自助餐或西餐牛排來豪華一下）；她們常常是食物的準備者，但總是最後一個上桌的（因為她忙著烹調下一道菜或必須先餵食幼兒）；她們若是想休息一天，一家子外出用餐，便會被經常外食應酬的丈夫投以白眼（「我好不容易在家吃頓飯，妳卻要出去……」）。

妙的是，這個花得少、吃得少、吃得不好的女人卻被視為「愛吃、貪吃」，這又是什麼道理

呢？

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她缺乏正當的理由來合理化她的吃。男人可以理直氣壯的說他吃是為了事業交際應酬或為了補充辛勞終日的體力。女人則不能用「為了提升家務勞動的效率、補償辛勞」等類似男人的理由；她要是吃，那就是貪圖口腹之慾。

這個差別待遇再度凸顯出一個事實：只有男人做的事才被視為是真正偉大的正當的。

所以說，女人並不比男人更貪吃，只是因為男女不平等所製造的效果使女人「看起來」貪吃而已。

男人好色？

卡維波

在上一篇《女人好吃？》中，何春蕤發現男人在外吃飯的機會比女人多，在吃的花費上比女人多，男人吃的品質比女人多。而男人之所以不被認為「貪吃」，乃是因為男人以「為了事業工作」當作「正當理由」來解釋他吃的機會多、花的多、吃的好。由此可見，雖然一般人說女人的家務工作有多重要，有多偉大，它還是不能形成「正當理由」，結果女人的「吃」被看成是為愛吃而吃，也因此形成女人貪吃的形象。

其實「男人好色」的形象也有類似上述的原因。

首先，女人的性活動並不見得比男人少，因為異性戀男女性活動的對象往往就是彼此，男人在進行性活動，當然也就是女人在進行性活動。

可是女人之所以被認為「不好色」，很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她們總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需要以一些「正當」理由（例如，為了表示愛他，為了拉住他的心，或者為了履行太太的義務等等）來解釋自己的性行為。

女人對性的態度因此常是被動的：性是義務，是交換時的籌碼，是不得不做時才做的事。正如同

男人在吃上面露出的態度：吃是為了交際應酬、補充工作的體力等等，是不得已阿！

女人不覺得自己享受性行為是「為性而性」，正如同男人不覺得自己是「為吃而吃」一樣；而女人不覺得自己好色，正如男人不覺得自己好吃。

男女的食與性之間的相似關聯，隱約指向的正是男以食、女以性互相交換的關係模式。當有一天男女的食性不必交換時，男女才會被認為一樣好吃，也一樣好色。

〈何德何能〉的兩性狂想

我的她，美麗而善良

聰明而簡單，深情而倔強。

我心似海，她卻只是像個小孩，

悠遊嬉戲於淺灘，不知深海的可怕。

我想她永遠不懂我的複雜，

所以在她的面前，我也跟著簡單起來。

她離開家，說要跟我一起流浪，

我要她別為我癡狂，她哭著罵我小壞蛋。

她的真，沸騰我心深處的冷，

讓我愛她那麼深，也讓我為她不忍。

因為她永遠不知道我有多壞，

所以在她的身旁，我也就跟著乖了起來。

她像是一條清澈蜿蜒的河，任性地流過我的一生，
輕輕地洗去我的深沉，靜靜地陪我度過多少黃昏。

我常想究竟我何德何能？

老天會賜給我這樣一個好女人，

我何德何能，我何德何能，何德何能……

（聰明而簡單，深情而倔強……）

（黃舒駿〈何德何能〉歌詞）

一首流行歌曲之所以能觸動大眾的心弦，除了打歌造勢的形象營造外，歌曲本身也必須和一般人的慾望和狂想連上線。最近黃舒駿的〈何德何能〉便是一首勾動兩性狂想的歌曲。有意思的是，男女兩性的聽眾對這首歌的蘊含有截然不同的詮釋，也凸顯出他們在這首歌曲中依本身的狂想而構築的不同世界。

女聽眾深深為這首歌所感動，主要是因為歌中那個女孩的清純竟然能使浪子回頭，使一個歷經滄桑的男人死心塌地的守在身邊，還「乖」了起來，這個轉變滿足女性聽眾好幾方面的狂想。

一方面，歌中女孩的純真無性是我們社會中一般認為的理想，女孩能單憑著本身的特質而引人愛戀，不必真正做什麼，也不必狂熱地需要男人，便自然地有改變人心之力，實在太完美了。

另一方面，這女孩純到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明瞭，當然此處的無知最主要是對「性」的無知，女聽眾聽到此處，不禁深深羨慕她的純潔而暗自祈願能消除自己那些不潔的念頭與需求。

三方面，純真女孩使浪蕩男人定心的故事更進一步暴露，女性在大多數狀況下無法掌握男性，常被遺忘在男性的生活圈外，常擔心男性變心他去，因此這個完美的故事才會如此動人心弦。

四方面，女聽眾模模糊糊地意識到，有經驗的、歷經滄桑的男人比較可取，他們會比較知道如何來愛她們，呵護她們。

總之，女聽眾的狂想是：我就是那女孩，我就是那麼單純，我的魅力使得再壞的浪子也死心塌地留下來，至於我不了解他，那無所謂，他愛我就好。

可是，男聽眾在歌中進行的狂想卻很不一樣。

正如女聽眾不若歌中女孩那麼純真一般，男聽眾也不如歌中浪子那麼瀟灑，而後者卻共同但單純的有同一狂想：如果我也能和浪子一般，漂泊多年，「壞到」極點之後，還是能有純情少女不計一切地愛我，那有多好！這種漂泊和「壞」其實都是指同一件事，嚐過許多女人的滋味。因此，我們可以由此看出男聽眾的狂想是希望自己可以在享受過許多女性之後還找到一個未被別人享受過的女性，何等完美！

但是更妙的是，歌中雖然一再說這個浪子有多壞，有多世故，我們卻不得不懷疑他的自我描述。如果他真的那麼成熟，那麼有經驗，為什麼還要找個傻瓜蛋似的、什麼也不懂、甚至根本不了解他的女性來愛呢？除非，除非他根本沒有他自己吹得那麼世故成熟，也沒有他自己想像的那麼「壞」，他只是一個缺乏自信、恐懼罩不住女人、因此必須用「我很壞、我很壞」來哄人哄己的小人物，而且他必須找一個什麼都不行的女孩，只有這種女孩才會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忠心守候。

換句話說，男聽眾的狂想正是在本身「無德無能」的境況中才被這首歌喚起。

由此看來，〈何德何能〉所勾起的兩性狂想恰恰反映了我們這個不敢做自己、不敢愛、只能藏在幻想之後摸索兩性關係的社會。

星期五的男人

星期五俱樂部的午夜牛郎就像高級的舞女、酒女、妓女一樣，在豪華隱密的休閒娛樂空間內，以一萬五以上的夜渡資代價從事最古老的賣身以謀生的行業。

在賣身以謀生的行業中，一次賣斷，終生伺候一人的姨太太看來比人盡可夫的妓女可取，可是，同樣人盡可妻的星期五妓男卻沒有像一次賣斷、伺候一人的小白臉那麼「衰」，而且根據一個非正式的統計顯示，百分之四十的男人不介意自己也從事牛郎行業。到底是什麼神秘的原因使得星期五的妓男看來那麼令人欣羨，遠超過他們的女同行呢？

其實說穿了，在這些價值判斷背後運作的還是徹底滲透我們這個社會的男女支配邏輯。

正因為這個「男支配女」的邏輯說，女人不應該工作，應該被男人供養，而且女人在男女的關係上要從一而終，因此按照這個邏輯來看，姨太太看起來比妓女可取。

在同樣一個邏輯中，男人不能被女人供養，而應該出賣勞動力來糊口，因此星期五的男人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不像小白臉被人供養，我有工作，我也是出賣身體勞力的，而且下班以後我還是好漢一條。」再加上同樣的一個邏輯還說，男人的女伴愈多就愈顯得他強壯，有男人味，星期五的牛郎

不但得人多也得財多，難怪對那些信心與條件不足的男性來說，真是羨煞了這個占盡一切便宜的行業。相對的來說，男女邏輯的運作卻使得做同樣工作的妓女看來下賤而可恥。

可是在星期五妓男的現象中，我們同時也看見根深蒂固的男女支配邏輯有了裂縫，開始動搖。干擾男女支配邏輯的是我們社會另一個強有力的邏輯，那便是「多錢的可以嫖少錢的」金錢邏輯。

由於社會條件變遷，現在多錢的女性有更大的主控權來運用金錢，可以用大把的鈔票買到暫時屈就的男人來陪酒、伴舞、脫衣，甚至提供其他「服務」。換句話說，金錢邏輯暫時而且局部地懸置了男女支配邏輯。不過，由於男女支配邏輯的根基十分強固，這個金錢邏輯必須提供極大的報償才能動搖男女支配邏輯，因此星期五的牛郎價碼極高。

可見，星期五俱樂部的「多錢女嫖少錢男」是藉著金錢邏輯來干擾「不允許女嫖男」的男女支配邏輯。但是，金錢邏輯並沒有完全取消或顛覆男女支配邏輯，何以見得？

男女支配邏輯固然不允許女嫖男，但是卻允許不管多錢少錢的男人都可以嫖女人，這也就是說，多錢的男人可以嫖高級妓女，少錢的男人也找到春風一度只要五百元的私娼。如果男女邏輯已完全被金錢邏輯所取代，那麼我們應該會看到不管多錢少錢的女人都可以嫖男人的局面。可是，至今我們卻只看到「多錢女嫖少錢男」，而看不到五百元一次的妓男讓少錢女來嫖。換句話說，男女邏輯的繼續運作使得廉價的妓男無法出現。

或許有人會說，目前之所以沒有五百元一次的妓男，是因為男人的生理條件使得接客次數有限，故而必須提高價格以維持利潤，這是金錢邏輯運作的結果，與男女邏輯無關。

撇開本來就建築在男女邏輯之上，某些男人可笑的惜精如金心理，即使男人不能做五百元一次的職業妓男，也可以做五百元一次的零工妓男，況且，比起一小時五十元的速食店或便利商店零工，還算是頗高收入的職業，可是，我們卻仍然找不到五百元的零工妓男。事實上，男人寧可免費讓女人睡（至少他可以說自己佔了便宜），也不願意為了五百元而被佔據主動位置的女人「嫖」。（大丈夫豈可為區區五百元獻身？）可見男女邏輯還在運作：少錢女找不到五百元妓男正是男女邏輯對金錢邏輯的干預。

金錢邏輯與男女邏輯之間的繼續互動還有待歷史的觀察。

星期五與善良風俗

桃園出現所謂的「星期五餐廳」，而且發生女客為牛郎爭風吃醋、教唆鬥毆事件，警方認為這門行業有悖善良風俗，立刻嚴加取締。

到底這個行業違背了什麼善良風俗呢？

首先，它違背了我們這個文化只許男嫖女、不許女嫖男的「善良風俗」。滿街滿巷的色情理容中心、指壓油壓、KTV、酒廊，不知有多少男人在揮金如土的買女人，也不見警方大力取締，甚至還常聽說警方和情治單位的人也在其中「休閒」。現在聽說新增一門顛倒此種「善良風俗」的行業，警方於是奮力維護男嫖女的社會風氣而大加取締。

其次，這門新興行業違背了我們文化只許女人以各種交換方式（包括婚姻）寄生於男人的經濟實力之下，而不許男人「不事生產，撿軟飯吃」的「善良風俗」。一旦這個邏輯顛倒過來，男人既陪酒又賣身，而女人則有實力予取予求，警察先生便悚然而驚，趕快全面掃蕩了。

星期五餐廳中還發生了另一種違背「善良風俗」的事，那就是女客為牛郎爭風吃醋、教唆鬥毆。原本做為性的目標物，讓男人為她爭風吃醋的被動女人，現在居然取得了主動追求的位置，還能發號

施令指使某些男人去打另外一些男人，攪亂了男人的兄弟情誼，這還了得！認定一切應該由男人主導的善良風俗於是便勞動警方來維護了。

由此看來，警方所維護的「善良風俗」顯然是有性別歧視的。正是因為這個立場，他們才沒有掃蕩所有的色情行業，禁止一切的嫖妓行為。而警方全力取締星期五餐廳，只不過是借用公權力及善良風俗之名，來遂行歧視女性、繼續壓迫和剝奪女性愉悅之實而已。

女廁

天佑與文嘉初次約會，兩人對對方的印象都很好，眼角眉梢的情意也愈來愈濃，談了幾個鐘頭仍興致勃勃。在花前月下的氣氛中，天佑已經去了好幾次廁所，文嘉卻仍然不動聲色，直到天佑提議去看晚場電影時，文嘉才低聲要求去洗手間「一下」。至於文嘉這偉大的廁所之旅是何情況，天佑當然不會知道（他也沒想過，因為他又忙著上廁所了）。不過，讓我們先提出幾件和文嘉的行為相關的事實。

事實一：一九九〇年年底美國德州的一位少婦因為內急難忍，女廁又排了長龍，故而進入門可羅雀的男廁方便，被起訴「違反市法」及「搗蛋」，百般折騰後才被法院宣判無罪。

事實二：根據最近泌尿科醫生報告，女性的膀胱炎患者有日漸增加的趨勢。女性的尿道比男性的短，憋尿時往往把尿液及其中所帶細菌逼回腎臟，也可能造成腎盂炎或腎臟功能衰竭。

事實三：據統計，台灣的小學女生有嚴重的憋尿傾向，廁所間數不足，下課只有十分鐘，遲到教室會挨罵，因此有不少小女孩早晨出門上學，直到晚上回家才上廁所。

面對這些脛關全國一半以上人口的嚴重事實，我們不得不擱下天佑心中暗譜的戀曲，而先來檢視

一下我們的女廁。

女性憋尿的傾向一直都很普遍，這也難怪。在我們的文化裏，男性只要背轉身去，把自己掏出來一小截，就可以就地解決（連衣著的設計也為他們特別在前面開一道缺口，關閉自如），可是女性就麻煩了，不但得找個有掩蔽的地方（背不背轉身的結果都一樣），還得裸露身體的三分之一才能進行（可沒聽說服裝設計師為女性設計出什麼「方便之門」），要是沒有天時地利人和，想小便還挺麻煩的。

過去，女性的生活空間以家居為主，內急的時候比較容易解決，而且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之內，憋尿的頻率及強度也相對的減低。可是，現在女性就學、就業、外出的比例及時間長度都急劇增加，常常處在不熟悉的空間與人際場合中（不管是在學校、在公司工廠、在逛街、在旅遊、在跑外勤、在公關過程中），因此就必須時時面對內急而無適當地點解決的困窘狀況，這也就是為什麼近來女性憋尿的傾向及後果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

妨礙女性正常如廁的因素總括起來有三方面，最深層的原因當然是滲透我們社會的性壓抑心理。大多數人還是把生殖、泌尿、性這三件事情聯想在一起，因此造成（特別是未婚）女性很不願意表示自己有小便的需要，害怕別人會聯想到某些器官的存在，幻想器官的裸露，然後把女性的生理需要擴大成性需要，那可就破壞了清純形象。唯有憋尿，故做無事狀，才顯得自己既能自制又是無慾的。

第二方面，女性雖有自發的憋尿傾向，但是這個潛在的傾向卻在我們的社會環境中極度的惡化。在學校裏面，嚴格的作息規律與風紀管理使得下課的十分鐘時間成為唯一可以合法有尿意的時間，工

廠內女工不准隨意離開工作崗位去上廁所，否則要扣工錢，公司內女職（店）員也不能太常上廁所，否則會遭經理白眼。這些措施當然不是針對女性而已，但是由於女性所費的時間較長，使得她們成為批評與限制的最直接受害者。

第三方面，也是最徹底妨礙女性如廁的因素，便是硬體設備的缺失。男女廁所即使面積一樣，坑數卻相差甚遠，三間女廁的面積可以提供六至八名男性同時使用，再加上女性如廁，脫穿之間需要比男性長二至三倍的時間，這種懸殊的使用效率當然使女廁經常大排長龍。此外，廁所的衛生狀況是使女性卻步的另一個主要原因，男性可以蜻蜓直立，點水般進出，時間又短，再髒也可以忍受；女性則必須屈身或蹲或坐或懸，穿脫之間飽受衣服受玷污、身體染細菌的威脅。廁所的一般規劃也不盡合意，不是太黑、太小、缺水，就是門鎖盡壞，完全沒有私密性或安全感，難怪時有性騷擾或性攻擊的傳聞，更使女性視公廁為畏途，採憋尿為上策。

做為充分參與現代公共領域的女性國民，我們要求免於憋尿的自由。社會生活的過度規範及硬體設備的缺失，我們要求政府負責。學校及職業場所的作息時間應該有彈性，尊重女性的生理需求，體貼我們的實質困難。在硬體方面，新的女廁必須有更人（女）性的規劃，舊的女廁要全面改建：女廁的坑數應該是男廁坑數的二至三倍（其實，為個人衛生計，我們並不要求採用抽水馬桶式），每間門後應有掛廁和置物架（我們才空得出手來「辦事」），女廁的燈光、門鎖是基本要求。（西式速食店能，為什麼我們不能？）

如果不能享用一個合理的小便環境，可想而見的，會有愈來愈多的女性染患各種泌尿的疾病。這

不但對我們社會整體的健康與生產力是一大損失，還可能導致女性集體援用國家賠償法，訴請鉅額的
憋尿補償金呢！

資本主義、性別與國家篇

第八章

專業與性別

為什麼大廚都是男人

「女人永遠比不上男人。」

這是男人常說的話。說這話的男人最喜歡用的例子就是：「你看，就連女人號稱最擅長的事情也是我們男人做得最好，事實上，最出名最有成就的大廚有哪個不是我們男人呢？」

其實，所謂大廚也就是以燒菜為專業的人，而一般來說，無論什麼職業，只要投注專業的心力，自然會做得比非專業的好。換句話說，問題不在男人女人的能力如何，而在誰佔據了專業的位置和資源。

既然我們看見的大廚都是男人，我們不禁要問：為舌妹女人不能投注專業的心力來做廚師呢？

答案是：我們的社會及工作環境既不鼓勵也不保障女性發展專業的職能。專業往往是一生的志業與鑽研，但是，女性的就業常被視為結婚前的暫時過渡，或是貼補家用的經濟來源，或是子女長大後填補空虛的替代活動。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只容許女人以家庭為事業，要是有一個女人發展在家庭以外的一生志業，往往被人扣上工作狂、女強人、或心理變態等等帽子。即使她不在乎這些名稱，也會在工作場所中面臨各種升遷及薪資方面的歧視。

這種不利的整體工作環境造成雇主從不嚴肅的看待尊重女性員工的專業能力及可能發展，也使得許多女性仍然受困於家庭為重心的觀念，無法在自己所長的事上發展出事業的精神與表現。

考量這種工作上的表現，我們需要用實質的措施來保障並鼓勵女性投入專業生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並構築女性的社會角色以及家庭內的分工形態，那麼在未來我們也許會有許多傑出的女性大廚。畢竟，大廚的例子顯示的不是男人的能力比女人強，而是專業得比較有機會做得比業餘的好。

專業與性別

一九九三年六月護理人員法的實施與修正引發爭論。簡單來說，護理人員長期以來待遇偏低受到剝削，以致於受過正規護理教育的專業護理人員不斷流失，在有照的護士難求，而許多醫療院雇用低薪無照的密護工之狀況下，遂有是否應掃除密護之爭論。但是在我看來，護理人員法的實施與修正吵出了醫生與護士間不平等權力關係的真相。

我們不必追究個別的有照護士是否盡職或個別的無照密護是否夠格。

我們要問的是：什麼原因使得醫護之間產生那麼大的薪資與地位差距，以致於有人搶著進醫院，以便日後做醫生，而護理專業的人卻不斷轉行？

這個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顯然和性別有關。

同為專業專才，（主要是）男性的醫生是決策者，（主要是）女性的護士則是聽命執行決策的人，這個職權區分，頗為吻合我們社會中的性別成見。（有許多人相信只有男性能在危急的時刻做出正確的決策。）

站在第一線，日日與患者相處的護士即使對病情或其他狀況有獨到的觀察與見解，這些知識並不

會被嚴肅的對待或尊重，更不會像醫生的「專業知識」一樣，被系統的整理並發展，而只能當口述歷史般在護理姊妹間流傳下去。

此外，在許多診所內，醫與護的關係並非專業同儕之間的合作，而是赤裸裸的勞資剝削關係。由於護士的性別，這種剝削所採取的形式是要求她承擔醫生診所內外一切與女性傳統職責相關的雜事（買菜燒飯、打掃、看小孩）。

護士的專業在勞動市場上得不到尊重和報酬，這使得女護士無法在事業上得到發展。諷刺的是，由於這些專業被視為有利於養兒育女照顧家庭，因此反而使護士們在婚姻市場上成為搶手貨。顯然，女人的發展還是被限制在家庭中。

這正是父權體制下男女不平權的真面目：女人的專業訓練只有在有利於女性傳統職責的領域內受到重視，想要真的在專業領域內做終生志業的鑽研就困難重重了。

專業的積累

做為一個寫作的人，我常常接到各種印刷媒體記者或編輯的電話訪談或專業企畫邀稿，交談片刻後我就立刻意識到兩件事情：第一，她們都是女性，第二，她們經常是上任不久的新手，而且沒過多久之後，再打電話來的又是另一批新手。

在飯店吃飯時與結婚已四年的公關閒聊，她正為前途而困惑，無法決定是不是一兩年後就應該辭職，好回家生小孩。旁邊一位帶著孩子的年輕母親則盤算著過兩年孩子再大一點的時候回公司上班。

這些故事都是女人的故事，男人從來不會想到要為結婚、家庭或孩子中斷自己的事業。

也因為這樣，女人很難在工作中積累出一生的志業來。她們常常一開始工作便抱著遲早要離職成家的預期心理，工作既是過渡的，也就不必以專業的眼光來考量，即使過了幾年再回到就業市場，女人的觀點仍然是：她是為了消磨空巢期的寂寥，是為了打發時光。

這種看不見的自我設限使得許多女人永遠停留在進出很方便但不需要太多訓練及技術的低價職位上，沒有專業的積累，也沒有升遷的年資，到頭來，女人還要嘆自己能力不足，時運不濟。

除了自我設限之外，就業市場中的成見也大大的影響女人的志業發展。我們以目前愈來愈多見的

工作夫妻為例，已婚、有小孩、但是有專業訓練的妻子找工作時，雇主會說她不適合這個職位，因為她有家庭之累，有後顧之憂。但是當已婚、有小孩、也有專業訓練的丈夫去應徵同一工作時，雇主卻欣然同意雇用，說是這樣的男人心理比較穩定，而且沒有後顧之憂。

正是這種引以為當然的成見，使得女人（無論已婚或未婚）在家庭與事業的糾纏矛盾中，無法全心投入專業的積累和自我的實現。

以國內婚前有工作的婦女每三人便有一人因結婚而辭去工作的統計數字來看，女人想要有專業的積累，首先就要改變她們對工作、對職業的過渡看法，而且還要同時改變我們社會對女人的刻板成見與要求。

穿什麼上班

——專業形象與衣著

國際服裝設計師在衡量港臺兩地女性服裝的市場上注意到一個極明顯的差異：香港地區有大量的女性上班服展售，市場銷路也好，反觀臺灣則仍然是小花小草、綴滿蕾絲的淑女裝當道，極少有能夠投射專業形象的上班套裝。（雖然兩者的價位相去不遠。）

這個差異可能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說法是臺灣沒有足夠從事專業工作的白領職業女性來支撐上班套裝的市場。這也就是說，處於決策位置、有專業職能的女性還是很有有限，因而市場也尚未提供構成她們專業形象的重要衣著指標。

如果這個說法為真，那麼我們可以間接地了解，臺灣中產階級婦女運動無法長足開展的原因之一，可能在於我們沒有大量從事專業工作的白領職業婦女來形成一個自信獨立而有專業精神支撐的女性階層。要是我們有這麼一個女性階層，那麼她們追求卓越、追求突破升遷極限的自利性目標，很可能會和婦運追求平權、追求解放的目標結合，而成為婦運的火車頭；她們的獨立與自信也比較容易形成強有力的女性另類文化，以便對抗那限制了她們發展的父權觀點主流文化。

第二個對港臺女裝差異的解釋則是，臺灣雖有大量從事專業工作的白領職業女性，有足夠的購買

力支撐專業形象的套裝市場，但是由於她們在工作場所中受到極大的壓抑，即使在工作職位上已經獨當一面，卻仍被期望以淑女的、男性慾求對象的、而非競爭的形象進出工作場所，以免直接的、明顯的挑戰男女性別分工的高下規範，因此，她們上班時仍然穿淑女裝來避免勾起更大的敵意。這種顧忌和壓抑也使得那些有潛力但是需要用最具體的、切身的方式來肯定並鞏固自身專業能力和形象的女性，不敢充分展現身體的自得與信心，反而阻礙了她們可能的發展。

上班套裝標誌著一個女性的專業職位與能力。在女性能力與專業精神已經被肯定的西方脈絡裏，或許職業女性要爭的是不必以衣著來建立專業形象；但是，在我們這個還無法平等尊重女性專業能力的社會中，或許我們要努力的是肯定那個專業形象的具體標誌。

中年就業

兩則和中年人就業相關的故事。

有人問一位年輕主管為什麼一定要找工讀生來做辦公室內的瑣事，而不肯考慮雇用中年婦女來做這些任何歐巴桑都可以做的事。主管的回答是：「我可不習慣請一位年齡像我阿姨的人幫我跑腿、倒茶。」

學校裏的助教愁容滿面，因為上級主管責怪她們沒有處理好一些管理教室的相關事務，但是，助教們也有苦說不出：「主管分配給工友先生的例行工作常常由我們一肩扛起，只因為我們實在叫不動工友先生，他根本不用我們這些年輕女孩的話。」

以上兩個故事凸顯出同一個問題：中國傳統長幼尊卑倫理的運作使得現代工商業所要求的工作紀律施展不開，因而阻礙了勞動力的充分使用，也干擾了企業想達成的生產效率。在這雙重的考量之下，難怪市場外有大批懸置的中年勞動人口，而市場內卻轉而引誘年輕學子提早進入就業市場了；因為，在我們這個傳統倫理尚未褪色的社會體系中，唯有當資本主義不講人情只講職責的工作倫理，與中國固有的傳統長幼倫理不相衝突，而且「恰巧」互相搭配時，企業才得以充分運用勞動力。

當然，對一個努力追求工業升級、希望勞動力充分使用的社會來說，閒置的人力是極大的浪費。就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預期的是，如果臺灣想要進一步資本主義化，想要有更高的生產力（效率），那麼，要不是把這些不合企業需求的中年勞動力推入更基層的工作崗位，以使用工作性質上極端的貴賤之分來強而有力地取代傳統倫理的運作，不然就要在工作範圍之內徹底拆解傳統倫理架設起來的人際關係，以便讓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得以充分實現。

不管走哪條路，進退不得的中年勞動人口都需要做出很大的一番調適，「長幼不分、倫常淡薄」恐怕是追求資本主義式效率、建立專業主義的工作場所中的常態了。

電話簿與專業主義

資本主義的普遍發達及深入程度，很多時候是和專業主義的普及和發達程度成正比的。而專業主義的普及和發達程度則可以在我們的電話簿中一窺端倪。

就現代社會的需要而言，一本電話號碼簿最大的功能是提供消費與服務的資訊。換句話說，如果一位消費者需要找尋某種商品或某種服務，他應該可以由電話號碼簿中找到相關商家的電話號碼，從而確定在哪裡可以找到他想要的商品或服務。由商家的眼光來看，這也是一項必要的廣告措施，可以透過電話簿中的列名來告訴消費者本店的存在，並進一步邀請消費者來電話或直接上門，以便增加生意的可能性。

從這個角度來閱讀我們的分類電話號碼簿，我們很驚訝的發現在眾多商號的名稱中竟夾雜了極大數量的私人名字，這意味著許多商家並沒有用店名來登記電話號碼，那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利用電話號碼簿的免費廣告功能。

商家這麼做當然有他們自身的考量。有些（特別是小型的）商家依賴的是原本建立的人際關係網或相近地區會路過的人做為可能的顧客群，他們根本不會覺得需要透過一本毫無人性的電話簿來吸引

一些不會到他們區域來的顧客。

另外有些商家則希望顧客直接上門來當面談生意，而不要利用電話到處問估價。對他們來說，價碼是最高機密，不能隨意告訴連面都沒見過的人，與其浪費時間和精力接電話，倒不如專注在那些已經送上門來的顧客。

這兩種原則代表的是一種傳統的做生意方式，是在整個消費市場尚未被大資本整合淘汰完畢之前的經營方式，我們也看得出來它們在發展上的侷限性，專業主義自然也很難在這種條件中生根。可想而見的，這種商家的繼續存在有賴於自身的邊陲化，也就是說它們只能存在於被孤立的小型地理區域中，或是消費資訊不發達的鄉村角落裏。

私人姓名充斥於電話簿中商業分類簿的另個原因則和臺灣的服務業及流通領域中的資本規模以及消費文化有關。臺灣常有一些小資本的業主不斷從事各種不同的生意，這個月開餐館，半年後就關門改開電玩店，然後因為流行情趣商店，又轉而經營後者，所以很少有長期經營某種行業或商店的情形。這樣一來商譽信用的積累就只能靠個人而非經營的商店招牌，商店名稱因此在電話簿中並不重要，因為很快就會過時，搞不好還帶來逃稅時的不便。像這種一窩蜂追求暴利不斷改變經營行業的狀況，當然也就談不上什麼專業主義了。

在商業升級化，小企業一步步遭大企業吞食的過程中，可想而見的，我們的分類電話號碼簿上的私人名字也會一個個消失。

資本

第九章

想要飯碗就少吃飯

——節食與工作倫理

很多人認為女性現在一窩蜂地節食減肥是為了新的審美觀點影響，也就是說，這個時代崇尚苗條瘦削，因而這股流行風潮及伴隨的商品廣告造成了許多女性加入減肥中心採取「節食」（節食並非不吃，而是節制飲食）。

可是，一套新的審美觀或任何新的宣傳說法，單靠本身並不一定保證會被大眾接受成為主流的價值觀（歷史上充滿了失敗的文章以及為上市便被摒棄的產品），新的事物或看法若要深入人心，造成改變，還必須和另外一些既存的、重要的生活組織方式或生產方式相呼應，彼此支持。

在節食減肥的案例中，新的理想體型和工商社會的新工作型態的雇傭關係配搭連結。換言之，新的理想體型瘦削與活力是一個標記，它標示了（某些階層）女性的社會功能與角色已由家庭主婦轉變為職業婦女，與此轉變相輔相成的是一套新的女性行為規範與身體價值觀，而這些行為規範與身體價值觀則反過來更進一步鞏固職業場域中的工作倫理，甚至促進整體工商企業的生產與運作。下面我們就來分析這個案例。

在女性唯一的出路是婚姻及生育的社會中，奶大臀圓、富泰結實的女性體型式最理想的。這種女

性有福相（圓滿的臉），有生兒子的本錢（寬大的骨盤），是各戶人家選媳時優先考慮的對象。相對的，單薄瘦削的女性被視為福淺命薄的潛在病號，不但不容易生兒子，連生不生出小孩都有問題。除非這些女性還有其他可取之處（如家世財產方面的優越性），否則，在一般的狀況下，母性職責就是主導了女性的理想體型。

然而，反觀今日的工商社會，當白領階級的職業婦女不斷增加時，在媒體中呈現出來的理想現代女性體型，要不是苗條修長的如模特兒般，穿什麼都好看，要不就是瘦削精明，如女強人般，做什麼都勝任愉快。這兩種典型顯然都脫離了傳統母性和生育掛帥的範疇，重新塑造出新的體型典範——「瘦而狠」（lean & mean）。

在這樣一個講求精力與效率的社會裏富泰的女性也有了新的文化意義。普遍的觀點是：她們好吃懶做，意志軟弱，能力不高，而且是跟不上時代潮流的。除非這些富泰的女性同時提供另一些比體型更有社會說服力的表徵（如衣飾品味、言談風度、身份地位等等），來表明她們根本不必顧慮體型，否則，她們多半會被視為失敗人生的範例；未婚的會找不到對象，已婚的會遭遇婚姻危機，有職業的必然工作不力，操持家務的則會懶惰邋遢。

這些價值判斷之所以能生根，和我們的社會型態有密切關連。在生育掛帥、母性至上的傳統社會中，富泰結實的女體自然是理想體型，但是，在工作倫理掛帥、效率第一的高度工商社會中，表徵活力象徵、聰明能幹的瘦削體型便大行其道了。

以上的二分法或許還是太簡化了一些，讓我們再深入一些來看現代婦女的體型問題。

工商社會為降低勞動成本並提高個人消費能力而鼓勵女性大量就業，由此而來的女性角色及社會功能轉變，特別是中產職業女性的增加，卻凸顯了一個迫切的需要，那便是，舊女性必須經過改造，以適應新工商社會的工作倫理要求。於是，本來只在私人領域（家庭）中活動的女性，必須擺脫原來被動、守成、散漫的個性，在改造過程中轉化為主動、進取、自律等等為公共領域工作倫理所必須的新人格。

這個改造的過程最初是透過學校教育的規律、作息來強制執行，佐以一般常識性的生活智慧（「早起早睡身體好」等等），但是，這些兩性都適用的改造機制只不過初步塑造了生活架構，對營造階層優越感以推動更強的競爭動機，並間接有利生產體系來說，可就不大夠用了。

為了進一步促成女性內化並不斷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實踐並鍛鍊新工商社會所需要的新人格，最方便而有效的方式就是連結她們一貫對美及外型的追求及競爭，且在這個原有的競爭心理基礎上進一步營造有利於工作倫理的競爭動機。

於是，一個由於節食而瘦削合宜的女體，不但仗著新身體審美觀向他人誇耀令人稱羨的身材，同時也在工商社會的價值脈絡中向世界宣告：「我有高度的決心和毅力（採行節食健身），也有高度的自律及自制（來執行節食健身）」。

這種宣告是中產職業婦女在工作崗位上想要出人頭地的必要表現。因為，對白領經理階層的女性來說，經常性地維持成功的節食，要比「怎麼吃都吃不胖」來得更可取可貴；不節食就瘦的身體是天生體質如此，與意志和決心無關，但是節食成功的身體卻需要堅定的意志與高度的自制，唯有擁抱節

食，規律健身，才可以表現自身符合了工商社會對就業員工的倫理期望（自制∥堅強∥服從∥負責）。

此外，如果說勞動階層婦女之所以較少體型方面的困擾是由於來自工作的消耗和生活的壓力，她們維持瘦削體型的動力充其量也只不過來自外在的壓力；但是白領階層的婦女生活優裕，休閒時間多若是還能維持體型，那麼，顯然她們即使在工作場所之外也恪遵工作倫理對理想體型的要求。也就是說，她們已徹底內化了新的身體審美觀，這種內化了的道德規範（節食∥意志∥工作能力）更強化白領職業婦女的優越感與成就感，節食也就成了一種階層地位的表徵。此時，所謂「節食是為了健康」只不過是個表面的說詞。

節食雖然在改造婦女的過程中呈現為工作倫理的外顯，階層地位的表徵，但是這個改造婦女的事業卻巧妙的獲得龐大的、實質的社會資源與力量來支持。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個改造的事業本身也發展成一個賺錢的事業，成為這個社會的生產事業的一個重要部分。唯有這樣有力的物質條件，才可讓新的身體審美觀和價值觀由工作場所擴散到工作場所之外，由白領職業婦女階層擴散到其他階層女性人口，由原本只是企業對員工的工作倫理期望轉化為員工內心對自己的要求，成為構築日常生活的自然環節。

這筆龐大的社會資源與力量就是有暴利可圖的奢侈工業和休閒工業。舉凡健身操的衣帽鞋襪、運動器材與空間、休憩場所的設備、減肥藥物或食品、休閒飲料與餐點特殊的休閒地點與活動形式，甚至無微不至的專人照拂與個別諮詢——這些商品與服務以及相關的廣告促銷正以驚人的成長率占有我們的生產工業，進一步營造我們的生活世界。

奢侈工業與休閒工業投下大量資本來生產並推銷這些配合新身體審美觀和價值觀的商品服務，固然是為了賺錢，為了自利的動機，想創造更高的利潤，但是，更重要的是，這些商品和服務所宣傳的生活方式與審美觀，同時也間接強化了與新身體審美觀相呼應的工作倫理（負責、毅力、自制、服從），這不但有利於奢侈休閒工業本身的生產過程，也有利於其他一切工商企業的運作與紀律。相應的來說，有利於資本主義生產及運作的工作倫理也必須以商品的形式出現，透過市場的力量來深入人心。

總之，這和新身體審美觀相關的奢侈休閒工業的整套生產體系都可以看成是對工作倫理的「促銷」，而這種工作倫理是為了鼓勵女性更加肝腦塗地的為工作效率。當然，這筆龐大的「促銷費用」最終還是由女性的荷包中掏出來的。

事實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就像節食的案例一樣，人自己辛苦工作賺錢，以便花錢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能為企業賺更多錢的人。

附記：

這篇文章是用「政治經濟學」的架構來分析「身體」。在新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中，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常只被歸諸於意識形態或政治領域，而被認為不在經濟領域內運作。這篇文章則指出新馬學說所忽略的一點，即，新意識形態或新論述的形成均需龐大資源的支持，而這已超過國家機器或單一生產部門的負擔，故而必須納入現有經濟運作的環節；易言之，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已逐漸在市場領域中進行。

誰的智慧？誰的財產？

自從第一世界的美國寄出貿易法三〇一條款來迫使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立法保護（美國的）智慧財產權以來，本土的言談中逐漸順應美方的意思，形成了一股道德的壓力。許多人責備國人文化水準不夠，為養成尊重他人創作的態度，也有人批評國人貪便宜，不肯遵循「使用者付費」的基本義務。

這股道德呼聲的壓力，扣連上本地經濟新貴迫切需要他國肯定的渴望，儼然形成一股沛然不可禦的正義力量，外對友國感到歉疚，內則自慚自責。

在道德譴責之下所掩蓋的是智慧財產權的歷史形成過程以及智慧財產權所蘊含的不平等權力關係。

大眾傳播學者馮建三先生曾經明確地指出，智慧財產權這個觀念的興起，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它和資本主義的逐步擴展齊頭並進，於是越來越多的生活現象被列入私有財產，從有形的物質財貨到無形的思維及人際關係，無一倖免，凡事都要論費用、論交易、論利潤。

馮建三還指出，過去美國在傾銷其美式意識形態到第三世界時，就從不提智慧財產權。當各國抵制這種「美國化」的趨勢時，美國還指責這些國家不自由，不讓資訊自由流通。現在則搖身一變，以

政經壓力干預我國國民直接取得國際資訊的管道。可見，「智慧財產權」的本質是政治力與經濟利益交互作用的結果，和「道德」沒有關係。

這個歷史溯源及分析再次肯定文化觀察家迷走先生所言：智慧財產權其實是個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其中凸顯的是臺灣的資本主義發展正在與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作更深一層的結合，故而必須自我調整，以配合體系內的規範與遊戲規則。（為加入GATT而做的調整也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但是官方及資產階級卻以提高臺灣國際地位的國族主義政治號召，讓人民犧牲自身的利益，接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買辦階級的剝削。）

這個政治經濟學的脈絡使我們意識到，單單關注智慧財產權的法律層面和道德層面只不過進一步掩蓋中心國與邊陲國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也模糊了邊陲國內權勢階級在此立法過程中的不均等利益分配。

讓我從另一個層面來看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共有的文化資源，一旦生產出來便可以在不同的時空、文化、權力的脈絡中供人運用，以創造更多的（各種）資源。

不管是第一世界大國向第三世界新興國家施壓，要求建立智慧財產權的立法保障，或是本地資本家向立法院施壓，要求比照辦理以保障自身權益時，這些所謂「保障」同時也在某一程度上限制了文化資源的使用、運用、挪用（因為這些文化資源現在變成了不得隨意運用的智慧財產），從而壓抑了一般人民文化的活力，更強化了文化資源的貧富不均。

本來在需要凝聚共識，需要塑造命運共同體的認同感時，文化中已為大眾熟悉的成分往往成為最方便有力的資源，藉著這個共同的理性認知或情感經驗來呼召個體加入認同，形成集體，方可建構出抗爭的主體。缺乏資源的弱勢社會運動最需要這種免費的大眾文化資源。

從這個角度來看，智慧財產權的設立限制了這個文化資源的運用，或者更正確的說，它把文化資源的運用權交給了出得起價錢的人，而那些一無所有的人則發現自己同時也一無可用。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眾文化中創造出來的聲望、知名度、形象本來就建立在羣眾的付出上，是他們付出時間金錢和心力，去看節目、買錄音帶、寫信送花、到KTV點唱、蜂擁到機場或影友會，因而使得某些文化產品被視為有利可圖而必須加以護衛的「智慧財產」（你我的塗鴉或個人寫真因無利可圖，未被吸納入市場，就不被視為智慧財產）。

可是現在，取之於大心的卻被人自大眾手中奪去，大心養出的文化資源卻變成少數人的私有財產，還立法保護其壟斷的利益，這就是智慧財產權的實際效應。

當然，以上所說意味著智慧產品就像大心運輸、教育、通訊等，不應成為受市場完全支配的商品，也唯有在這種情況下，智慧產品的生產者才會得到更多的尊重、更大的保障以及創作的自主性。

論自主消費

近年來，消費者運動逐漸擴展，在許多與消費者相關的事件與問題上提出意見，倡導輿論，保障消費者權益，也在這些活動中對社會大眾開始建立其公信力。

消費者組織雖然有不少成就及貢獻，但是由於他們在生產的決策及過程中並沒有參與及發言權，發揮的功能也就只能是被動地對發現的現象加以警告或杯葛、抵制。這種被動的、片面的、現象層面的處理方式在解決根本問題上顯然不足。

消費者最常用的策略之一便是訴諸製造廠商的良心或社會道德的尺度，可是這個良心或道德的產生及轉變卻較少被人探討，消費道德及形成的機制也甚少被討論，本文就想由一些常見的例子來展示消費者道德的形成，也間接對消費者運動的應走方向提出建議。

大家都還記得「需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或「一絲一縷，當思來處不易」的傳統道德，曾幾何時，這節儉的美德已被視為過時，代之而起的是對「氣派」、「品味」、「精緻」的追求。

對這種消費型態的轉變，各家有不同的說法。

有人說，四十多年來的勵精圖治，已經使得臺灣由貧轉富，生活形態的這種轉變正反映了執政者

的各項政策是正確的，因此，國民消費形態的轉變是個可喜的現象，只不過有「少數一小撮人」太過奢靡，破壞風氣，如果加以勸導，如推行「梅花餐」，就可以扭轉局勢。

也有人說，世風日下，道德敗壞，食慾使人追求金錢，追求享樂，正所謂「飽暖思淫慾」也，如果加強儒家的精神教育，用古聖先賢的格言來警醒大家，必定能對物慾橫流的傾向產生扼止的功用。

這兩種分析都是膚淺的，沒有根據的。

一個社會的生活形態，通常為了滿足其成員食衣住行等需要，而有相對應的工作活動及組織方式。農業時代生產模式的侷限性，使得它只能勉強供應社會成員的生活必需品，必須縮衣節食，故而推崇節儉為生活準則，以免浪費。民間傳說中，浪費糧食的人死後在陰間受苦便是這種意識形態的明顯表達，而諺語中的盤中飧與一絲一縷正是必需品的典型代表。

工業社會的初期，機器力尚未達到理想的大量生產程度，而且如果想要有更大規模的生產以獲取更大的利潤，便需要資金的累積與再投入，農業時代的節儉美德有助於資金的累積，對工業發展仍然有用，故而還被保存下去。

工業生產發展到了一個地步，生產力大幅提高，必需品生產的產量與存貨大大超過市場的吸收量，世界市場的強烈競爭也降低利潤，進而使得再投資意願低迷。擁有資金者面對這個新局面，為了避免風險，不是縱情於享受累積的財富，便是把一部分有限的資金投入金融業，或是投資到仍具有高度利潤的非必需品及奢侈品；另一方面，民間由節儉而積累的小額游資，由於找不到發揮方向，也呈現飽和狀態。這些條件使得節儉不再是切合實際需要的美德，因而整個社會的生活形態走向消費，走

向服務，也就不是什麼出人意外的現象了。

很明顯的，工業社會不等於消費社會。只有當工業生產發展到某一程度，使得利潤普遍下降，投資減少時才會出現消費社會。換句話說，消費社會是工業社會的晚期形態。

以上談的是形成奢侈性消費的結構性原因，臺灣社會的奢侈浮華則有其個別的直接原因。臺灣的簡單加工再出口經濟，依賴外界訂單，有訂單時需要大筆資金周轉，無訂單則不需資金，因此資金流轉不很穩定。有時候有人急需資金但貸不到，有人有大筆資金但不知如何用，像這樣資金供需失調的情形，隨處可見。為了使資金流轉迅速及滑潤，標會、地下錢莊和高利貸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這樣的經濟結構中，奢侈性消費也有促進資金流轉迅速，潤滑的積極作用；換句話說，奢侈性消費是使大筆鈔票回流的手段。

這個消費社會不是一天造成的，它要成為可能，不但有上面所談的客觀生產條件及生活水準，還必須在改造社會心理上做工夫，要不然，生產的物資多而民間因節儉而很少購買，會造成投資者更大的危機，這裏就需要消費道德來取代勤儉美德了。

所謂「消費道德」便是調節和指導人們在消費方面的生活、行動，和人際關係的意識形態之總稱，此處的意識形態包含了原則、思想、願望、情緒和其相應的實踐。它的主要原則並不是追求一般消費，而是追求「體面的」、「高級的」、不斷換新的消費。這樣的消費不再侷限於生活之必需品，也包括了非必需品。這種消費道德不是膚淺地鼓動人無意識無目的地吃喝浪費，相反的，消費道德扮演的的重要功用之一便是為了渴求無抑制的物質享樂和消費提供合理化的條件，它不但要使人們有購買

慾，並且要使他們覺得購買和消費是正常的合理行為，不但不是「浪費」（字面上便有貶意），反而是一種高尚的情調，足以做為生活的目的與人生的價值。簡單來說，消費道德就是向人宣稱：消費才是「道德的」。

從實際生活的層面上來說，消費道德是一個新的生活形態的運作基準。它的內容包羅萬象：有的傳達新的產品標準——要新奇化、精緻化、多樣化、豪華化、複雜化才好，最好還要「舶來化」；有的教你如何運用閒暇時間——閒來沒事就去逛街，即使不買東西，看看也好，逛街也是一種「正常嗜好」，算是一種獲取「知識」的方法，絕不比去圖書館看書差；有的指導購物，甚至人生——買東西要趨新競奇，不要吝於拋棄舊的，「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在這裏有深厚意義，那些一年到頭穿同樣衣服、騎同一部車的人是「習慣的奴隸」，是落伍保守的象徵；有的把消費和心理健康聯想在一起——心情鬱悶時，不是找些建設性的活動或仔細分析本身的問題，而是買東西宣洩，花點錢心理便好過了；有的傳達不同的審美觀——任何東西都要和它的環境相配，商品不是買一件，而是買一套，因此身上的衣著飾物或室內的格局擺設，必須同一款式，同一色調，同一設計，同一流行，否則便不美、不和諧、甚或「土氣」了；有的宣傳人際關係是用消費來衡量的——對太太的情感必須用數克拉的鑽戒來表達才算是真心誠意的，對子女的愛心用各式玩具衣物來代表而不只是時時的照顧與支持；有的暗示個人的成就與價值建立在他的消費形態上——看一個人穿什麼、吃什麼、用什麼、買什麼就可以了解他的「品味」好不好，有沒有「水準」，人所消費的東西的質與量正襯托出他的品格等等。

在這些意識形態影響之下，購買及消費不但在量上面大幅度增加，在質上面也有了根本的改變。消費不再是生活的一個小環節而已，它變成了價值判斷的指標、思想行為的準則。一句話，消費掌握了生活的步調與節奏，成了人生的最高境界與最終目的。

奢華宴樂並不是消費時代才有的新鮮玩意兒，古代的王宮貴族、近代的富商大亨都以高度的享受為生活的主要內容，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以前的奢侈，只限於少數特權階級身上，而且這種以享受為人生目的的道德觀，也從未成為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而如今，節儉不再是主流道德，消費反而成了大多數人的生活常態。事實上，消費道德在內容、形式和普及程度上也都遠遠超過了過去的世代，而且正以無比龐大的通盤強勢，隨著無孔不入的傳統系統，向廣大的群眾包圍上去。

消費道德最早及最主要的傳播媒介便是廣告。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以及無處不有的廣告招貼無時不在引誘我們購買，刺激我們的消費慾。這些宣傳當然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它們總是預設了一個社會形態。因此廣告不單單推銷商品，同時也推銷某一種生活方式，某一套社會倫理，以及某一組價值觀。廣告中的商品鑲嵌在各種人際場合中，愛迪達跑鞋穿在身著閃光運動衣、看來生活愜意而也錢有閒做有養健身操的中產婦女腳上；雀巢咖啡的香味在滿布西式家具的客廳中，替男女主角的含情對視添上幾許朦朧的浪漫氣息；百事可樂拿在修長健美、生氣盎然的青春男女手中，益增可人；連老祖母含飴弄孫的天倫景象中，也少不了牆上的合歡冷氣。這些廣告暗含的訊息是：消費不但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然成分，甚至是某些人際關係或竟是人生意義的必要條件。沒有這些消費品，就沒有辦法得到那些我們想要的親情、友誼及幸福，擁有了這些商品，便擁有了令人欽羨的身材、年紀、享

受及生活方式。

除了廣告此一特殊形式以外，消費道德更透過廣播、電視、電影、報紙、雜誌及其他大眾文化向群眾灌輸幸福就是盡量多消費和享樂的觀念。於是在電影及小說中，我們看見男女主角的戀情在豪華別墅裏開展，而且必然延伸到一些裝潢富麗的交際場合上；報紙雜誌上以專欄介紹最新潮流款式的服飾及享受，新聞與廣告巧妙地在此結合；影歌星被塑造成功偶像人物，是消費形態的領頭先鋒。這些推銷方式表面上看起來是純淨的，不過是故事劇情的需要，或新聞報導供消遣而已，並沒有為某一特定商品做廣告，可是，它們佔據了大眾傳播的孔道，以某些影像與觀念充斥我們的耳目，它們所蘊含的假設及價值觀便悄悄地潛入了我們的思想與行動。

消費道德動不動也仗著法律做後盾來證明它的合法性——延伸出去便是合理性。例如，在工業先進國家的稅法中往往大開抵、扣繳稅的後門來刺激國民購買不動產或耐久性消費品，越是出手闊綽，甚至是舉債揮霍，就越有資格成為「免費公民」。反之，不購買而積存的收入則因累進稅率而加大課徵，這種種措施都製造出一個印象——不花白不花——消費是絕對有利的，合理的。

消費道德在塑造我們的消費習慣之餘也間接地影響我們在其他方面的思想行動，最大的影響便是把消費當成一切人類活動的模式。消費是一種消耗行為，消費道德鼓勵的則是「為消耗而消費」，不是「為需要而消費」，這樣一來，在消費過程的前後及中間都缺乏反省與思考，只是一味地追求消費那一剎那的快感。

舉個例子來說，受消費道德洗禮的大心在閱讀時也反映他們的消費觀。選書時以暢銷書排行榜為

依歸，選雜誌時以最易提供最多瑣碎消息及刺激的為準，連閱讀的時候也是以快速「消耗」為目標，而沒有耐性「消化」書中的思想內容及意理。消費道德不但影響讀者的選購及閱讀習慣，也直接左右了閱讀材料的生產者——作者及出版社，於是雜誌及書籍的出版都以包裝為第一考慮，在外觀上力求流線化、風格化，在內容上則追求趣味化、簡單化，甚至一段就是一行，也就是說，一個思想單元只以一個簡單的句子陳述，而沒有進一步的論證，這些超短段落快速跳接，簡單明瞭，完全無需咀嚼。

前面講到消費道德使人視消費為「自然」，甚至是「當然」，是生活的「常規」，這個意理從深一層來看，還有它更大的背景。消費道德預設的是：百貨充斥的市場是社會的理想形態，在這種狀況中，人才有充分的「自由」選擇「自己想要的」商品，而且只要人肯努力工作便會有錢，有了錢，想買什麼就買什麼，這便是「自由」（或「自主」）的真義。

但是，消費道德所假設的「自由」（或「自主」），事實上是虛構的。顧客固然有權選擇商品，但商品的生產與提供卻不操在他手中，生產什麼商品、定什麼底價、經銷到什麼區域都是由製造商來決定，顧客只能在所提供的有限選擇中挑揀，而不能告訴廠商應製造什麼樣的產品來滿足他的需要；他只能照廠商所開的價錢購買，而不能照商品的實際成本購買；他只能照減價時廠商開的條件享受折扣——買三件才算一百，或購滿一千元才贈送禮品或打折扣——必須超額購買或家買非必需品，而不能說「我只需要一個，請你按照比例算應打的折扣給我」。這樣的交換過程怎能說是自由呢？這就好像大家常說的笑話：「你當然有自由，你可以吃也可以不吃。」

再推廣一些來看，很明顯的，消費道德不是自發的，而是逐利且可得利的集團透過他們掌握的大

眾文化及傳播孔道，所灌輸操縱的消費習慣、觀念及情感，其目的當然是為了「利」。這個「利」又可由三方面來看：（一）社會大、無休止的購買可使有權支配生產者（資本家）直接獲利；（二）對商品的渴求心理既已被描寫為現代社會的常態且可引以為傲，這種渴求便可做為推動工人努力工作的誘因之一，對資本家當然也有好處；（三）社會大眾若養成消費道德，認為不消費的人吝嗇無知，沒有水準，認為不消費是反社會的行為，大家在消費上的實踐既然與資本家的利益相合，自可直接間接地強化與鞏固資本家的權力。

總而言之，消費道德基本上是強勢社會集團合作的結果，它的普及也是為那些少數人謀利的。消費大眾一無對傳播孔道的控制，二無對生產內容及分配的控制，只能任資本家宰割，比較敏感的人雖有時消極的抗拒外來強加的產品攻勢及價值灌輸，但也只是「雖敗猶榮」而已，比較不敏感的人則根本視這些強加物為自然，充分實踐消費道德，而不覺得自身受操縱或壓迫了。

談到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清消費者各種拒買、緩買、選買及品質要求、訴訟賠償等措施的侷限性。基本上來說，這些行動建基在實用的觀點上，只就各個片面的問題做現象層面的對抗或自衛，是被動的。事實上，若不把消費放在社會背景中來看，若不對消費者本身在意識形態層面所受的操縱做徹底的追究，則任何反抗的措施，都可能是徒勞無功或局部暫時有效的。視消費道德為社會病態或道德敗壞的結果，都沒有了解問題的核心，而且這種「義憤」很可能是消費道德為本身在擴散過程所遭阻力而提供的發洩閘門，有擾亂視聽的分心作用，但只能搔癢卻永遠打不到痛處。若是消費者組織由官方有關人士出頭組織，或民間企業出資贊助，那就更居心叵測了。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自主的消費必須建基在自主的生產和分配上面。如果生產決策的決定因素不是消費者的生活所需，而是工廠及經銷商或其他相關人的經濟或其他利益，在這個生產制度之內是不可能談自主消費的，消費者不但在消費內容、消費方式上受人限制，就連對消費的態度也要受人操縱影響。要有真正自主的消費，消費大眾應努力於生產決策的掌握以及價格、分配的控制。某些體制內消費者運動組織的錯誤，在於他們是生產決策者與消費者的權力平等，彼此制衡。但是，在目前的生產體制內，生產決策者與消費者是主從的關係，消費者運動的劣勢地位也就不言自明了。唯有當生產決策者與消費者合而為一時，自主的消費才可能實現。

環保必須控制資本

中產的消費者是很敏銳的。他們非常注意日常的資訊，一旦聽說什麼食物對健康有害、哪種洗衣粉會污染環境、哪家的漢堡肉有問題，便會立刻警覺而做出對策，用拒吃、拒買或向消基會投訴來解消危機。

中產的消費者也很會照顧自己。他們會裝設空氣清淨機，以確保家中的空氣品質；他們會特地在超市找尋號稱無污染、無殘餘農藥的精緻蔬菜，回家之後還會用大量的清水清洗，以確保家中成員的健康；他們更接受廣告的宣傳，小心地用各種產品保養皮膚和頭髮，不讓它們和都市中污濁的空氣直接接觸，以免污染物傷害到自己的身體。

就是因為中產消費者這麼仔細的、熱切的關注日常生活的每一層面，市面上才會出現大量以環保、天然、純真為號召的高價新產品，讓中產消費者點點滴滴地營造出一家家自足安穩的生活空間，就連號稱人間仙境的各種售屋專案，訴求的也是中產消費者這股自保的執著。

可是，中產消費者沒有想過的是：與其花錢花時間找尋並清洗蔬菜水果，為什麼不肯組織壓力團體來迫使農業生產上的改革？與其加裝淨水器或喝瓶裝水，為什麼不能要求主事者徹底改善水質？與

其買產品保養頭髮皮膚，為什麼不堅決要求環保署執行渴望清淨空間的民意？

大環境的淨化與保護不是個別家庭的清掃，也不是都市的環境衛生；它是針對污染源——由污染工業到養豬戶到核電廠到高爾夫球場，針對政府的主事者所做的嚴厲要求與監督，它是對沒有付出社會成本的私人暴利迎頭痛擊。更簡單地說，徹底的環保是對資本、對生產的直接控制，是我們在生產決策的層次上有權力干預任何對環境生態不利的舉措，而這種徹底的、根本的解決方法才是不使消費者坐以待斃，反而可能以自主性掌握社會方向的有力策略。

環保是我們對社會環境主控權的保衛戰，因此，不是什麼環境清潔衛生的自保或個人的公德心，而是對資本和生產的控制。

階級

第十章

鄉鎮公車族

——她們是誰？

社會資源分配之不公常常是沿著城鄉的界線發展的。而這不公平的分配往往造成弱勢者更形弱勢。

大都會區人口密集，交易熱絡，享受較大的稅源，因此可以提供合理的路線、班次、公車設備及服務，甚至連基本車資也比較低廉。

而且，由於乘客眾多，又多半具有中產意識，公車政策只要稍稍不合民意就會立即遭到抗拒和批評，經營自然也比較上軌道。

相較起來，臺灣省各地連接縣市與鄉鎮郊區的地方公車就沒有那麼好的條件了。它們不但幾乎年年漲車資，還經常威脅要取消路線，至於班次和服務，那就更不能和都會區相比了。

鄉鎮公車經營者的說法當然是利潤取向的：搭乘地方公車的乘客日漸減少，總不能叫公司虧本倒閉吧！

說得不錯，搭乘公車的乘客確實日漸減少，但是鄉鎮公車的乘客是有很特殊的弱勢屬性的。在地方公車日漸縮減的同時，有辦法的人已經買了自用小客車或摩托車，可以自由的來去了，那麼剩下來

必須仰賴公車的人又是誰呢？

是那些每天清晨把自家種的多餘蔬菜拿去市區零售市場口擺攤的農家婦女；是那些因家庭從事漁牧業，居住在偏遠鄉間的邊緣人口；還有一些老弱婦孺，家中雖然有別的交通工具，但是通常被一家之主的男性開去工作，甚至下班之後開去應酬找情婦。這些老弱婦孺若想享受一些基本的活動性，若想維持與外面世界的某些自主性聯繫，就非得倚靠大眾運輸不可。

這便形成鄉鎮公車特有的階級及性別特色：搭乘地方公車的人多是下階層的弱勢族群，尤其是女性居多。（而都會區的市公車上比較沒有明顯的階級或性別屬性，由於都會公車尚稱便利，除了下層人口外，中產階級也固定搭乘市公車。）

在臺灣社會劇烈兩極化的過程中，鄉鎮公車的弱勢階級和性別角色，再度提醒我們正視社會資源的分配問題。

金錢與性

——雛妓

談到雛妓，一般人心浮現的總是被無知父母賣至娼戶的原住民少女，這些在階級、種族、性別的社會區分上都占弱勢的少女遭遇如此不幸，因此很自然的成為同情與義憤的對象，而政客們也很聰明的召喚了有同情與義憤的民眾加入抗議的慢跑秀。（一九九三年底，法務部長馬英九和內政部長吳伯雄率領民眾在臺北市著名的紅燈區華西街舉行慢跑活動，以宣示政府掃除雛妓的決心。）

為雛妓現象義憤填膺的抗議群眾可能認為雛妓的現象是一些喪心病狂的人造成的，因此覺得只要針對這些人設立嚴厲的規範或處罰，問題便解決了一大半。

可是，根據臺北市社會局與警方的統計，如果我們以七十八年到八十二年間輔導雛妓人口分佈為指標，原住民僅占百分之十四，被賣的僅占百分之九。這麼大比例的非原住民而又自願從娼的少女人口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很明顯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我們社會的巨大貧富懸殊。

臺灣在股市狂飆和土地炒作的熱潮中靜悄悄的進行了一次重大的財富重分配，有者愈有，無者愈無，奢華宴樂的場所紛紛成立，為節省人事開支的成本，大量僱用年輕在學只想賺點零用錢的孩子。

在工作中，他們親眼看見社會的不公，有人一擲千金，面不改色，而回顧自己，不僅前途遙遙，連奢想一步步走到那種氣魄的程度也希望渺茫。男的還可以寄望工作、事業，以及某種獨力謀生，女的則在社會既有的安排（婚姻、養兒育女……）中看不到什麼指望。

年輕的少女們紛紛下海，並不是因為定力不堅，耳濡目染。她們自願的扶擇其實正凸顯我們這個社會沒有給她們希望——再怎麼努力，到頭來也只是做個薪水少得可憐還要兼顧家務的「現代婦女」。那又何必？

雛妓的問題不在人心而在制度。不消除貧富懸殊，不消除男女之間的不平等，金錢與性的交換還會持續下去。

讓勞工說自己的故事

我們常常聽人說，好的文學就是要描寫人性，也就是要描寫最基本的、人類共有的經驗與感受（如親情愛情生老病死等等）。

可是，即使在這些看來相似的經歷上，我們卻往往因為社會位置不同，可運用的資源不均，因而別人對待我們態度不同，結果發展出極為差異的經驗與感受。

比方說，就一個事業輝煌騰達的人而言，他對人生充滿樂觀的看法，他有信心可以為孩子提供優異的成長環境，他享受著周圍人的羨慕，住在不愁風雨或房租的華廈中，他也覺得自己十分重要，可以做許多大大小小的決策，很有成就感。對佔據著這樣一個社會位置的人而言，即使生了病，他也可以期待最好的醫護復健，他承受著各方上司下屬的關懷，生病反而更顯出他的重要，因此生病就不是那麼一件嚴重痛苦、會影響家人生計的事。

在另一方面，對一個早出晚歸勞力勞心的工人而言，他的薪水有限，前途不穩，由於可掌握的資源太少，孩子的教養和前途都不看好，不常也不受人尊敬或重視，一旦生病，不但沒有能力負擔完善的醫護，有時甚至危及全家人的生存。對這些弱勢社會位置上的人而言，人生中常常經歷的事情往往

形成重大的危機，他們對生老病死的態度也比較傾向宿命式的悲觀。

從這個簡單例子來看，所謂基本的、共有的人類經驗只有在原始的、尚未分工的初民社會中才存在。一旦文明逐漸發展，社會益形分工，人與人之間存在著權力大小不平等的階層關係時，人類的經驗、感受或世界觀也就有極大的差異了。

既然社會位置不同的人實際上過著極為不同的生活，有著非常不一樣的经验與感受，更有極為不同的利益所在，那麼，文學就應該為他們提供表達的管道，使所有的人都能夠找到對生活方式和經驗感受的描述，能夠更明確的建構出自己的聲音，自己的觀點。

可是，我們的社會卻沒有為弱勢位置上的人提供管道，讓他們由自己的位置出發來看世界、看生活。相反的，我們的大心媒體充滿了單一的說法。最近電視上不斷出現一家報紙的宣傳廣告，以黑底白字宣告：「臺灣人形遍天下，臺灣的錢淹腳目……我們要做尊貴的世界公民」云云；這裏所描述的經驗及期望絕不是我們這些既沒有機會環球旅行，也不可能坐擁大量金錢的人所能想要的。如果我們在本本地都已經不能有尊嚴的活著，不被社會看重，又如何做尊貴的世界公民？

再進一步來看，勞工的生活世界在我們的媒體、資訊、教育、文藝、娛樂中都沒有得到適當的呈現。電視劇中描寫的是中產的，都會的男歡女愛；社會大心對勞工的印象和體認也多半止於「工人好吃懶做，破壞投資環境」；我們的教育制度雖然口頭上說勞動神聖，卻又不斷用升學主義來強調唯有讀書高；我們沒有幾本描寫勞工生活的小說，沒有幾部拍勞工的電影；連大心娛樂的場所也保留給有閒有錢的中產階級。

在這樣不利的社會條件下，勞工由媒體及資訊管道中所接受的價值觀和常識，有許多是對勞工本身不利的。比方說，目前臺灣社會的共識之一就是投資環境惡化，而各方輿論也把責任歸屬給紛爭不斷的工人運動，好像為自身權益而抗爭的工人應該為全臺灣的經濟困局肩負道義的責任。這種輿論——透過以資本主義發展為考量的學者以及為雇主代言的政客——充斥於我們的媒體中，不斷地施加壓力及罪惡感於勞工身上。

但是，這種對臺灣社會的評估是有立場的。「投資環境」指的是「賺錢環境」，投資環境良好就是說老闆可以用比較少的資本來賺大錢；也就是說，工人勞動所生產出來的價值遠遠超過他們的工資所得。換句話說，學者所謂投資環境的「惡化」是相對雇主的利益而言，就工人來說，這種「惡化」正意味著工人權益的提高以及剝削程度的降低。就這樣的角度而言，媒體及學者們對「投資環境」的「客觀評估」完全沒有考量到勞工的立場及利益。

此外，一般工廠常常用「管理」及「效率」等聽來有點專業的名詞，來教導勞工學習並執行新的勞動規範。為了方便生產程序和監督管理，工人一律在指定的空檔時間去上廁所，為了配合機器設備以及生產線的安排，工人往往要站在一些十分麻煩的、不稱手的位置，長時期維持一些可能傷害身體的姿勢或動作。這樣看來，所謂的效率與管理並不是什麼客觀中立的積極概念，而是為資本的運轉及利潤服務的。

凡此種種，都顯示了我們周圍常見的價值觀和普通常識往往是出於特殊考量的觀點，而不一定代表工人的利益，有時甚至掩蓋了勞工的利益。

從這方面來看，勞工文學創作有其重要的文化意義。透過對自身勞動生涯的描述與反省，透過對工廠的發展與工人之間的關係的回顧，透過對勞工家庭關係及雇傭關係的權力分析，勞工及其子女可以逐步發展自己的利益觀點，凝聚自己團結抗拒的聲音，更可以間次發展出勞工對社會國家其他層面議題的立場，建立起自己的發言力量來表達勞工的利益。

文學創作不是中產都會智識人口有閒有錢有品味的專利消遣，它也應該是勞動者認識自身社會處境的管道之一。

弱勢者沒有私有財產權

——更新都市？

一九九三年年底，內政部營建署草擬了一個「都市更新條例草案」。根據該草案，政府主管機關可因種種考量，劃定地區，公告實施重建或改建，只要二分之一以上所有權人同意便可逕行實施。另一方面，一般地區的土地與建築只要有三分之二以上所有權人同意，亦可申請更新計劃。

這個高舉「改進整體都市景觀」的立法其實頗有問題。

首先，我們觀察到公權力在某方面的大幅擴張。按照這個條例，主管機關可用「避免重大災害」或「配合興建重大建設」，由上到下「主動」劃定區域更新。可是，前一個理由是個假設性的考量，主管者可以自由心證，後一個理由則極有可能圖利唯一有能力進行「重大建設」的官方或財團。如果真要依法執行，我們倒願意看到政府為「避免重大災害」而主動劃定各地無數不合安檢的大樓為首先更新的目標。

再者，這個擴張的公權力公然挑戰憲法所規範的私有財產權。在劃定更新或申請更新的區域內，即使是所有權人，也會因為別的所有權人的意願而被強迫接受「更新」，違抗者將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並課十五萬元以下的罰金，所有權人不但喪失了自主處理（或不處理）自己財產的權力，

護產時還會依法受到頗重的處罰。

這個草案表面上看起來合乎民主的原則，尊重的是大多數所有權人的意願，但是事實上，那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願意更新的業主當然是在更新中有利可圖，或與財團早已講好條件的，他們在拆遷的過程中比較沒有後顧之憂，因此也樂觀其成。唯有那不同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他們或因眷戀鄰里，或因除此棲身之地外別無所有，因此拒絕搬遷，他們雖是弱勢，但是憲法也應該保障其私有財產。

如今這個草案做的就是以多數暴力來重新分配都市中寸土寸金的空間，而在這個重分配的過程中，弱勢者的私有財產權也蕩然無存了。可見，所謂自由經濟保障私有財產權之說是絕不包括弱勢者的。

國家

第十一章

「激情」過後

——為何社會很難統一？

在一九九三年九月的同一星期內，海峽兩岸各自凝聚了高度的期待，尋求國際地位的認定。那邊要的是主辦公元兩千年邁入號稱中國人的二十一世紀的奧運主辦權，這邊則在紐約敲鑼打鼓的齊集各派人馬造勢要重返聯合國。結果雙方都遭到了挫敗。

從媒體的呈現看來，「似乎」兩岸的人民都經歷了極大的戲劇性情緒起伏，由全面的熱切期待到自我安慰的繼續努力，這種在國際層次上的出人頭地「好像」是全民的共識。

可是，這恐怕也是表象而已。

注意到這兩件「大事」的人也非常明白它們的象徵意義遠大過實質意義。以中共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來看，根本不在乎主辦奧運可能帶來的小利潤，重要的是那種當今政權終於實現承諾帶領中國「翻身」做大國的成功形象。同樣的，臺灣花大錢進入財務拮据的聯合國並非寄望改變「價廉質差」、「富而無禮」的國際名聲，而是在國際地位的認定中尋求國內執政者跨海談判正當性。

這麼說來，這些在國際舞臺上的大動作的實質效果是向內的。它們把國家（也就是當前政權）的身分認定及地位，推到首要關切和頭條新聞的中心，不但吸納了各種社會力來為國家所用，也用國族

認同來統一充滿著社會矛盾的內部。但是它們似乎忘了，當社會內部人民在經濟貧富、土地擁有、城鄉生活水準上差距懸殊時，這個社會是很難統一的。

畢竟，當嚴肅的聲音在媒體上宣告「我們要做有尊嚴的世界公民」時，茫然以對的是在本地全無尊嚴的弱勢者，或者尊嚴在混亂的交通、危險的都市環境、惡劣的生活品質中消耗殆盡的小民；點頭稱是的則是那些亟需以國家地位來保障或推動他們海內外投資的人士。

有人說，中共不應花大錢急著去辦奧運，而應積極改善人權。同樣的，臺灣應當先做的是加入保障環境、消費者、勞工、婦女、宗教、殘障、同性戀等弱勢團體的世界性組織，以督促政府改善本地弱勢者的人權。

大爺受辱記

一九九三年夏天，有一群臺灣觀光客在異國使用信用卡因而受辱。這一事件在兩、三天之內竄升為頭條新聞倒是個值得思考的現象。

消費者花錢而受辱當然令人氣憤，但是這個氣憤是否能得到適當的回應，得到同情的支持，而且後來得到期待的補償，倒要看施辱的那一方是誰，還要看受辱的消費者的其他身分而定。

臺灣長久在美國日本的政治、經濟強權籠罩之下，雖然經常受兩國之辱，也未曾聽說過有什麼激烈的反應，更不用說以全面抵制來要求道歉賠償，這一次刷卡事件的反彈聲浪與氣勢恐怕和對方是與我們不太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歐洲小國有點關係。

此次受辱的消費者特別引人注目，因為他們同時也有另外一些優勢的社會身分，不但是用得起信用卡的中產有智階級，更是有法律顧問做後盾，有公司機構出頭爭理，深明形象和信譽對信用金融業有多重要的商場人士。透過媒體的熱情關懷，這些消費者在異鄉受辱，絕非同為消費者的返鄉老兵在香港機場受辱可堪比擬。

更有意思的是，中產消費者在異鄉受辱事件恰巧扣連了臺灣新貴的脆弱自尊以及眼下迫切進行的

國家身分認同營造活動，連外交部也主動出擊，積極表明嚴正立場，召喚全體國民來感同身受，並同聲撻伐。回過頭來看每日層出不窮的性侵犯事件，那些受辱的女性國民不但得不到支撐以便振振有詞的要求公道，反而還要承受控訴時的二次傷害，要不就深埋一生的羞辱在心底。這裏的公道又有誰來同聲討回？

當然，我的意思絕非在否定這群受辱觀光客的正當權益，或他們採取的策略，我只是藉著分析他們受到重視的背後原因，勾連到另一些不受重視的弱勢群體，在主流一致的聲音中發出一些噪音、雜音，免得主流力量利用觀光客的受辱而成了最大贏家。

選舉

有位朋友說得好，「選舉就是有錢有勢的人動員無錢無勢的人出來表態」。意思就是說，選舉並不會真的改善我們的生活品質或社會不公，選舉只不過為有錢有勢的那些人提供一個機會較勁，勝利的人便會有許可證在任期內進行各種活動來更增加其錢與勢，而無錢無勢的人則繼續在邊線外奮力的活著。

對選舉完全不理會的人有些是因為這般看透了選舉而不想管選舉的事，但是有更多的人根本沒想過要把選舉列入注意範圍。他（她）們或是在 PUB 中流連竟夜，在 KTV 中縱情歡唱，或是在地攤上忙於謀生，在地下工廠中揮汗拷貝偶像照片與錄音帶，或者竟只是賴在沙發上用遙控器一遍又一遍的瀏覽六十個頻道。不管如何，他（她）們的生活已建構成沒有空間容納選舉的激情或義憤。

看到這種情景，總有一些熱情的人義正辭嚴的勸誡他（她）們放下冷漠：「你不要以為選舉不重要，被選出來的人所制訂的政策絕對會影響到你的。」一面說，一面還在臉上泛起一層因為親身參與重大歷史事件而來的神聖光采。

可是，對那些不想也根本不理選舉的人而言，選舉根本不重要。他（她）們正忙於進行一件真正

重要的事情，那便是營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邏輯。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種在私領域中的營造絕對是重要的，因為連公領域也非常看重這種營造。若是私領域中運作的方式和邏輯嚴重的違背公領域所規範的模式，而且還有擴散的趨勢，公領域透過選舉而來的正當權力便立刻會以暴力加以制裁或甚至撲滅。歷史上不少小團體、小公社、小教派，都是在這種情況下消失的。

由此看來，選舉之所以被視為「重要」，是建立在公領域對私領域的管轄和宰制上。

於是，不理選舉的人有此狂想：

假如他們制定了法律卻沒有人遵守，假如他們選出了官吏卻沒有人聽令，假如他們舉辦了一場選舉卻沒有人理會……

後記：

這篇短文刊出後，周奕成先生在一篇題為「〈給我報報〉地方版」的文章中（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提到這篇短文，並有所批評。

由於周文是在談〈給我報報〉的脈絡下提及拙文，涉及頗廣，我無法在此針鋒相對地回應他，所以僅能大略談談我的看法，目的在於澄清拙文。

周文認為我的論點：

或許顯示出一些「去政治化」的傾向，以及對臺灣社會欠缺現實感與歷史感。如果能具體分析縣長選舉的政治經濟意義應該可以看出土地及資本是核心問題。地方派系為了地皮炒作而動員，任何一個縣市長的當選人，都會因為其職權而對該縣市的土地資源分配造成重大影響，這也直接衝擊了每一個人的居住問題，形塑了每一個人的營生方式。光從這個面向看來，「私領域的營造」，難道不是和公領域、和生產關係、和所有其他人的政治參與密不可分嗎？人們的汲汲於私人營生活動，而無暇從事政治行動，難道是自願的而非被排除、被宰制的嗎？

首先，周文似乎把目前這種民意調查式的選舉看做「政治參與」，這是值得商榷的。此外，很明顯的，在目前這種選舉下大多數人的命運不會因選舉結果而有所改善，對這些人而言，她（他）們對選舉的論述策略應該是什麼呢？難道要繼續歌頌選舉的重要嗎？

我在正文中說：「選舉之所以被視為『重要』，是建立在公領域對私領域的管轄和支配」。這也就是說，公領域對私領域有重大的影響，所以我完全不否認許多無暇從事政治行動的人是被生活所迫而被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的。周文因此根本沒有碰到我文章的重點，亦即，如果這些被迫排除在政治過程外的人不能透過目前這種選舉改善其現實，那麼還有什麼其他策略呢？

我建議了一種（但絕非唯一）策略，也就是私領域世界的營造。這個策略的背後有許多預設，我並沒有在文章中把它們提出來。其中之一，也是正文比較明白提及的，就是私領域的營造也會對公領域有所影響。我很明白，在傳統父權的權力圖象中，這種私對公的影響或「私人即政治」的想法是比較不具地位

的。但是我們應該開始思考這種另類政治的可能性。

「私人的汲汲營生」並不等於我所謂「私領域的營造」，這是我在文中並未說清楚的。但是對各種私領域內的實踐（汲汲營生在內）均可以首先在論述的層次上加以肯定，賦予新意義，而這就是私領域營造的第一步，之後還要有更多更新奇的論述來談論「私」的實踐，使之不同於原來主流談論這些實踐的方式，並且使之成為某些主體反抗主流權力的論述。

周文在提到我的文章「對臺灣社會欠缺現實感與歷史感」或者「……是核心問題」時，都顯示了他的立場是某些對現實有客觀認識的菁英主體，他們已經把現實分析透徹。但是問題是，其他的人怎麼辦？跟著菁英做投票部隊？其他人所面對的臺灣社會現實和歷史因此都是虛幻的？

或許菁英們可以先承認別人的現實也是現實，別人的實踐領域（臥房）和菁英的實踐場域（立法院）一樣重要，別人關心的核心問題（像性高潮）和菁英所關心的核心問題，具有同等重要的平等地位，這雖然是第一步，但是已經改變了一小部分現實，改變了這個社會「菁英——群眾」權力邏輯，改變了菁英的身段。

我們沒有（國）家

——弱勢者的反戰立場

戰爭的敵對情勢往往沿著國界樹立起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高牆，強調「我們是愛好民主和正義的國家，我們不能坐視國家利益受威脅，因此我們必須起而捍衛我們的生活方式」。在這些崇高的旗幟之下，一國之內的輿論往往產生極大的強制性，要求全國同心，槍口向外，並且用愛國心的尚方寶劍斬殺異議的聲音。

一九三八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正當歐洲為即將爆發的戰爭而悸動時，著名的英國小說家兼女權運動者維琴尼亞·吳爾芙卻在經典名著《三塊金幣》中，提出了對戰爭的強烈批判，為弱勢者的反戰奠定有力的基礎。

在主戰者強調「我們」有共同看法、共同利益，因此有共同立場的同時，吳爾芙卻指出，這個「我們」是不可能的。做為一個女權運動者，吳爾芙一針見血地宣告，女性並不分享（大多數）男性對戰爭的狂熱。她認為男性之所以好戰主要有三個原因：在經濟層面上，戰爭是男性職業生涯出路之一；在心理層面上，男性由戰爭中獲得莫名的興奮與快感；在社會角色上，戰爭為男性提供了陽剛特質的表現機會。而這三方面都和女性絕緣，因此吳爾芙認為男性沒有權利要求女性採取相同的好戰觀

點。

如果說主戰者強調「我們」是一國的，以達成同心同德的目標，那麼吳爾芙的反戰策略就是強調「我們」不是一國的，來瓦解這個「我們」。而且，我們之所以不是一國的，並不是因為我們之中有男有女，有窮有富，有殘障、雛妓、無殼蝸牛等等，而是因為社會資源在我們之間的分配不均。

換句話說，當一個社會吝於將資源投入改善弱勢者的生活環境、教育機會及品質、職業出入等等重大問題時，它也不能奢求弱勢者贊同或支持優勢者的政策決定。吳爾芙沈痛地指出，當時英國用大量社會資源培養男性、教育男性，為他們開啟職業的大門，卻只用極少量的資源照顧女性的發展和需要，因此吳爾芙向那些高舉「我們」大旗的人提出尖銳的辯駁。

所謂「我們的」國家有史以來大部分時間都把我當成奴隸，它拒絕提供給我教育的機會，也不讓我分享它的財富……因此，如果你堅持要為保護我或「我們的」國家而加入戰爭，那麼就讓我們冷靜而理性的說清楚：你加入戰爭為了要滿足男性所獨有的「好戰」的本能；你加入戰爭是為了獲得那些我從來沒有分享過，而且未來也不可能分享的利益；並不是為了滿足我的本能需要，也不是保護我或者我的國家。事實上，作為一個「外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需要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全世界。

對那些大談「我們國家」如何如何的人，吳爾芙的回應是：我和你不同國，社會資源的分配沒有

把我當成一個國民來看，我沒有棲身的家，因此我也沒有國家，我的命運是和全世界沒有家的人連在一起的，因此，我的國家就是全世界。

這樣一個反戰策略把國與國之間的差異，轉化成一國之內的差異，強調不同國家的人民之間有聯合的可能，更把國與國之間對資源掌握權的爭奪，轉化成一個社會之內不同群體對社會資源分配的反省，可算是吳爾芙的社會意識的最高點。

弱勢者的反戰意識不僅沿著性別差異來反省社會資源的分配，也在種族差異上顯示出社會的不公。美國一九九一年波灣的反戰運動在各主要成是如火如荼，據統計，黑人反戰的比例比白人高一倍，這一方面是因為黑人被派到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邊界的比例不尋常地高（黑人人口是美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但是伊沙邊界上黑人士兵卻占總出兵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但是另一方面卻更深遠地顯示，黑人平時的教育及職業出路都受到侷限，只得以軍旅為最後選擇，一旦戰事發生，他們又總是最先受徵召，最快上前線的一群，越戰時的死傷人數比例已反映出這個殘酷的事實，難怪現在黑人的反戰聲浪特別強。（同理，臺灣的原住民也因其處境而具有反戰的正當理由。）

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在目前所有的社會形態中都日趨激烈，戰爭不但沒有減緩此一惡化的趨勢，反而以愛國精神的感召掩蓋了實質的問題。在從軍報國的大傘下掩蓋了美國軍方以高額獎學金以及購屋補助為餌，軟硬兼施地引誘經濟弱勢者上前線。在媒體火熱地「關切」波灣戰事的種種特別報導中，遺忘了迫在眉睫的嚴重社會失業問題、愛滋病問題、飢荒問題、人權問題、環保問題等等。一時間，似乎全世界只有一件事在發生，所有因社會資源分配不均而產生的各種問題似乎都可以在波灣一

戰中解決。

弱勢者的困苦情境得不到抒解，他們的議題在戰況報導中淹沒，這正是弱勢者不得不反戰，甚至必須積極反戰的重要原因。戰爭消耗龐大資源於毀滅上，而未投入於改善具體生活的建設。關於戰爭的報導佔據了媒體，轉移了大眾的注意力，淡化了社會問題的急迫性與嚴重性，這些都賦予弱勢者反戰的正當理由。的確，在勞工被剝削，同性戀不容許結婚、無殼蝸牛買不起房子……的情況下，為什麼弱勢者要為資本家與炒地皮的財團去送死？

唯有反戰，弱勢者才可能再度聚焦於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不公，轉化關切世界局勢的抽象熱情為落實在改善本地的具體作為。唯有反戰，弱勢者才可能集結力量，在砲聲隆隆中開出一條「世界是我家」，人民與人民結合的和平道路。

知識／權力：誰在養小孩？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本來沿著土地與血緣發展的傳統人際關係也受到衝擊，資本流動的軌跡拉散了家族為本的命運共同體，留下的是一地各自為政、獨立作業的核心小家庭。

小家庭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顯然還是較受歡迎的選擇。年輕的父母不必受到上一輩的耳提面命，更不用太擔心朝夕相對所可能產生的親子或婆媳問題，感覺上有更大的自主權來建立小家庭中的權力關係。

可是，隨著家族影響力同時消退的，還有原先社群內被集體共同擁有、共同實踐的文化傳統與資訊。老一輩成套的懷孕、生產、坐月子、養孩子方面的民間知識，在醫學、專家、學術報告，甚至無遠弗屆的電視節目及廣告的光芒之下，被歸類為迷信、無知、不合科學的鄉野傳說。

民間常識的消退與邊陲化正對應了家庭權威的沒落，繼而代之的是一些不談輩分、不談關係、不談情感的客觀知識。這些新的權威當然挾帶著自十八世紀以來科學所享受的一切優勢進入每一個小家庭；但是，它們同時也以其統一的、一致的、客觀真理的姿態，抹去了原先家庭背景、地域、族群的可能差異及獨特性。

如果說在傳統社會中，生養是以家庭社群共同的經驗智慧來執行的照顧活動；那麼，在現代由國家帶頭，而以資本主義的發展為骨幹的社會脈絡中，生養是由專家及各種社會機構來統一尺度及方針的。小家庭中的父母若是太過「自主」，還會遭到各種法規和科學共識的制裁。

科學知識的霸權是靠著國家（透過教育）來支持的，而以上只是國家滲入家庭的例子之一罷了。子女的教養權，也就是親子之間的權力關係，早就被國家權力所干預及滲透，而且有越來越顯著的趨勢（像兒童福利法等即是一例）。

反社會主義還是反國家崇拜？

——也談歐威爾的《一九八四》

一般人在談歐威爾的名著《一九八四》時，常把歐威爾描繪成他是「反共」的。

當然，乍讀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受到冷戰心態影響的讀者立刻聯想到他筆下的世界是以蘇聯的共產政權為藍本，比較熟悉歐威爾的讀者則也會聯想到歐威爾是在表達他對一九四〇年代英國社會主義改革運動的失望。由這兩個線索，一般的結論是：《一九八四》是反社會主義的。

可是這個結論也許得太快太簡單了。

讓我們先看看作者歐威爾個人的一些經歷，或許有助於我們了解《一九八四》這本書。歐威爾曾擔任過英國工黨左派報紙的文學編輯，一九三七年他曾加入西班牙左翼民團對抗獨裁者法朗哥的戰爭。對歐威爾來說，對抗法西斯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是一體的兩面，所以他才親身加入西班牙內戰。

那麼歐威爾是否和其他三〇年代的社會主義者一樣，在四〇年代改變了原先的立場，不再相信社會主義了呢？

我們至少可以找到兩個證據，證明歐威爾並沒有放棄他的社會主義立場——他反對的是蘇聯極權式的共產主義，但是他個人的社會主義立場則沒有改變。第一個證據是：三〇年代改變社會主義立場

的人認為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那只是政客和獨裁者欺騙民衆的把戲。歐威爾則仍對平等抱著希望；他藉著《一九八四》中所謂反對極權勢力的宣傳手冊提到，現代工業的蓬勃，已帶來了經濟平等的可能性，原來的階級社會因此有解體的可能。第二個證據是：歐威爾仍然抱著希望，等待下層階級來實現社會主義，在《一九八四》中他不斷地重複：「如果有希望，這希望是在普羅階級身上的。」只有下層群眾才能擊敗「黨」的極權統治。

另外，歐威爾的描述不但適用在蘇聯共產政權上，連西方工業超級強國也在他的攻擊範圍之內。舉例來說：《一九八四》中所描繪的「真理」，事實上是一種極端的實用主義；真理是用來服務黨的需要。而在現代西方工業國家中，真理也變成了「多變的真理」，可隨時因大企業的需要而改變，因主流的利益而改變；「真理」是由「大多數」的「同意」而決定的，主流媒體所呈現的「共識」變成了真理，少數的聲音則總是異端、不愛國的共黨奸細。

再舉個例來說，《一九八四》一書詳細地說明了「雙重思考」（或「兩面思考」）的特性：人在腦中同時持有兩個互相矛盾的概念。一般人都認為只有蘇共或中共才如此思考，殊不知在西方國家，人們也常做「雙重思考」：當他們說「自由世界」時，往往是指反共的國家，而不管那些國家是否真的有政治自由；他們說「保障自由」時，往往只是剝奪其他國家或民族的自由，而促進本身的經濟利益（賺錢的自由）而已；他們說，應該多製造核子武器，以遏止核戰，維持和平，那就更像歐威爾書中的口號「戰爭就是和平」了。

同樣的，我們不也在自己的社會中看到同樣的「雙重思考」嗎？像講到「主權在民」時，貢寮的

人就沒有權利決定核四，講到「生命共同體」，絕不會是指同性戀與異性戀的生命共同體！

歐威爾雖然不反對社會主義，但是他卻反對國家崇拜。在國家崇拜中，國家的命運被當作最高利益，各種人民的實踐或抗爭則被收編為國家的打造工程。

這種以國家為崇拜對象的傾向並非現代才有，十六世紀馬基維利在他的《王侯論》及《討論集》（特別是後者）中，便已系統而冷酷地描繪維持國家存在及國家利益的權謀藝術。他所謂的「國家」雖是以君王為具體體現，但是在考量維繫君王的治權時，他的立論卻清楚的建立在「國家是崇高無上的」假設之上。

馬基維利之所以把人生存的目的及意義投射在人以外的國家身上，當然有其歷史原因。文藝復興時對人性和教育的樂觀看法，到了十五世紀末期已逐漸喪失吸引力，義大利本身現實狀況的苦悶粉碎了這種一廂情願式的理想主義，連年不斷的內戰與外國勢力入侵，更使得當時的人對上一代的樂觀人文精神感到失望。在義大利由中世紀開始的四百年權術傳統之下，馬基維利清晰地提出另一條出路，寄望由專制帶來和平與統一，由國家的權力集中而帶來力量與繁榮。歷史證明，他的理想在無意中種下了現代國家崇拜的種子。

歐威爾以《一九八四》總結了馬基維利之後另外四百年的權術傳統。他筆下的國家崇拜更加非人化，更加冷酷。關於這點，只要讀過《一九八四》的人均可領會，毋庸我多說。

現在常有人說臺灣已經從權威性領導過渡到民主化階段，並且朝向完全的民主社會政治文化進行。可是在我看來，就歐威爾所關切的國家崇拜，臺灣不但沒有什麼改變，而且變得更嚴重又更巧

妙。自從蔣氏遷臺後所開始的愛國主義或國族主義傳統，以及各種打造國家機器的工程（例如，為塑造國族而推行的國語運動、以及民意調查式的代議制選舉）均仍健在。不同的是，以前靠的是壓制，現在則藉著威權式民粹主義，求得被統治者的擁戴或積極同意（active consent）。

換言之，新的國家打造工程技術變得更細緻巧妙了。例如，為了適應舊強人瓦解後的權力集中問題，代表「全民」的正當性，要以直接訴求全民的選舉技術來呈現；另外，包括國會等民意機關在內的統治機器也開始了簡化、合理化、單一化的趨向，以求有效的、迅速回應的統治；在這種統治方式下，逃脫國家的社會空間縮小了，國家機器無所不在，激進或徹底的抗爭會變得較為困難。

如果我們把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放在烏托邦文學的傳統中，《一九八四》所描寫的總是個幻想的世界；可是，當我們把《一九八四》放在國家崇拜的傳統中來看時，這個幻想的世界就變成我們周圍的現實世界了。

文化 · 教育
篇

第十二章

文化觀察

原鄉不遠

——便利商店的呼喚

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鍾理和）

過去，在農業為主的生產制度內，人的歸屬感建立在對土地的認同和與鄉里的血緣關係之上，藉著各種宗教的、民俗的、節慶的儀式不斷鞏固那份熟悉的親切感。

在農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步破產的今天，現代人又要到哪兒去找歸屬感呢？失意徬徨的孤獨感有誰能分享？冷漠都會中的疏離感要用什麼方式來克服？

出去走走吧！推開窗，瀉一地的陽光，明亮光鮮的「ㄣ」便利商店看來何等溫馨！買杯咖啡，吃個熱包子，再買份今天的報紙。在購買商品的過程中，即使沒有人傾聽我的心聲、沒有人了解我的困境，但是在「歡迎光臨」的清脆招呼中，在收銀機達達的轉動聲中，在滿店豐盛的貨品中，我又拾回了勇氣與毅力繼續前行——

電視廣告這麼說。（這是在九〇年代初一個常見的廣告。）

廣告所承諾的歸屬感和溫馨感倒也並不太離譜。當現代都會人踏入便利商店時，他可以有如下的期待：首先，附近社區的居民多多少少都會來這店中消費或甚至休閒，這店就像舊時社區中心的土地公廟或傳統雜貨店一般，是個人群聚集交會之所，可以提供消費者一些熟悉的鄰里之感。其次，便利商店中商品的陳列與交易的過程都有固定的公式可循，這些儀式化了的活動和舊時土地公廟內的敬拜儀式類似，都使參與的個人感到自在與踏實。

換言之，便利商店做為新的社區認同中心，必須提供一套新的儀式與行為來建立並鞏固這個認同歸屬感，上述便利商店的電視廣告就正在嘗試為這套以購買商品為主的新儀式建構感情內容。

可是，便利商店做為新的社區認同中心又「新」在哪裏呢？答案是：便利商店雖提供了歸屬感與熟悉親切感，卻也同時除去了都會人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來構築的人際關係。在貨架間隨意閒逛挑選的顧客不必和周圍的人寒暄，不必回答一些可能侵犯隱私的個人問題，他的購買和消費等儀式性行為是完全不必牽涉到情緒和交際的，看起來是完全自主的。這種社區認同正是都會人需要的，是一種沒有羈絆的歸屬感。社區居民在購買與消費的儀式結束後，各自分道揚鑣，誰也不用管誰（no hassle, no strings attached）。

更確切地說，我們在廣告中雖看見溫馨有人情味的社區歸屬感，但是事實上它卻只是便利商店中物與錢易手的「物際關係」。而這個商品拜物教的新寺廟正是二十四小時為信徒服務的便利商店。

今天早上，你原鄉的血沸騰了嗎？來便利商店吹吹冷氣吧！

什麼人唱什麼歌

言為心聲。但是，由於我們的文化及教育沒有訓練我們談話的能力，疏於言詞、拙於交友的我們只得用唱歌來做為人際溝通的媒介，卡拉OK、KTV等以歌會友的休閒場所所在臺風行的事實，只不過凸顯了這個社交媒介的存在與新生形式而已。

從唱遊課、音樂課、合唱團到軍事訓練，我們的音樂素養在正規教育的範圍之內培育。唱歌，常常是年輕人的事，和學校、軍隊等場合分不開。

在另一方面，大眾媒體的傳播管道不斷地把通俗的流行歌充斥在我們耳中，打歌的頻率甚至使我們的新歌上市的第一週內便朗朗上口。由於有同樣的歌可唱，唱歌就成了文化經驗的分享。

這兩個主要管道傳來的歌曲（兒歌、民謠、軍歌、通俗歌曲），成為我們在團體交際活動中重要的資源。郊遊、旅行、同樂會時除了做團體遊戲這類統一活動外，便是個人的表演項目。在我們這個不重視專業型嗜好、未形成專業型休閒的社會裏，唱歌是個不需要專門學習、不需要特殊器材的表演形式，難怪多數人都備有幾條可秀之歌，在需要時推出抵數。

可是，為什麼團體活動、人際交往時非得要人表演不可呢？大家不能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談話，

彼此認識嗎？那不是更好的促進了解的交往方式嗎？（事實上，上層社會的正式場合中確實是用這種形式來社交，他們的經驗與地位，使他們不必唱歌，也能社交。）

可惜，要聊就得有題材，要聊就得懂得如何和別人持續交談的遊戲，要聊就得有和陌生人四目交接、由隔閡到有話可說的本事，而這種人際溝通的基本條件並非我們這個文化所著重的。

比方說，我們的教育就是用腦子來記，手來抄寫，要用口的時候也多半和課業內容有關，由老師問，學生簡答，從不提供也不鼓勵學生做主動的、持續的、有條有理的敘述和雙向討論。這種單向的獨白和我們的大班制、教育目標、考試掛帥、師資水準都有關係。像這樣呆板被動的學習環境，當然無法塑造出主動、犀利、自創話題的談話習慣，也無法訓練言談的技巧、禮貌與修辭策略。再加上一個親疏遠近分明的文化傳統，談建立在既有的血緣、地域、同誼基礎上，一遇上陌生人（求偶對象另有遊戲規則），便不知如何開口了。

當今休閒生活的開展促成更多人際接觸的機會，勞資及從屬關係的嬗變也要求成年人暫時擺下公事公辦的嚴肅面具，在公餘建立更多樣化的人際關係。在這些需求下，自我的表達及（新生的）團體的娛樂於是採取了學生時代便熟悉的表現方式：唱歌，在休閒工業提供的空間中（卡拉OK、KTV）唱起娛樂事業推銷的，或文化經驗中人人會唱的通俗歌來。

通俗歌曲固然被許多人視為格調太低，但是它抽象籠統的藝語或是生活小節的敘述，卻可引起大多小市民的共鳴，為他們模糊的慾愛賦予形體，為他們逝去的回憶著上色彩。即使被譏為肉麻入戲時，也可以諉罪於歌，反而證明自己開朗隨和。要是機緣巧合，聽歌人有心，還可藉歌表達情愫，以

補言語之不足，KTV、卡拉OK的特殊音響效果更彌補了可能乾澀的音色，為歌者提供幻覺般的自我形象。凡此種種，無不使唱歌成為現階段人際交往場合的最愛。

當然，唱歌的熱潮會過去，休閒工業的利潤動機也會在既成的文化及教育基礎上，繼續做某種轉化和利用，創出新的表達方式及交流場合。

過去傳統左派對什麼人唱什麼歌的分析，多半著眼於歌者的社會經濟背景，或歌曲的意識形態內容，也就是內容之階級成份的分析。現在，我們需要思考「唱歌」這個社會活動本身的文化意義，亦即，思考唱歌本身的非階級文化形式，以便更深刻的理解階級和其他權力形式的關係。

臺灣漢堡

——刈包！

刈包，是一種相當本土的路邊攤食品，它是一塊蒸熟的麵皮，對摺後在中間夾上燻肉、酸菜之類的佐料。最近在一個路邊攤上竟然看見它的招牌寫著：「臺灣漢堡！刈包」。

這個現象當然代表了（以漢堡為象徵的）新殖民主義文化對（以刈包為象徵的）本土文化的侵略。

對於這一種飲食形式的文化侵略，有人沾沾自喜，認為無需過慮，因為據說西方的漢堡、薯條、炸雞……等等都味同嚼蠟，根本比不上中國食物。

但是食物絕不僅是「可以吃的東西」；食物就是文化。

食物不僅預設了一套烹飪及材料選擇的規矩（例如，狗肉對西方人而言就不是「食物」），還預設了一套價值觀及一種生活方式。易言之，食物就是文化的構成部分。

如果今天漢堡是以「烏干達牛肉餅」的名稱，在傳統小吃店和其他中國食物一道出售，而沒有強勢文化和跨國公司的雙重推銷，它就不可能有多大的市場。事實上，當人們在吃漢堡時，他們吃的是「國際的麥當勞／美國感覺／中產氣氛／現代時髦……」等等一大串「味道」。這些味道之所以會對

某些人是「香」或「好吃」，是因為伴隨著漢堡的其他新殖民文化（電影、音樂等娛樂文化、工作制度與倫理、休閒文化）也一齊在改變本土的文化生態。

換句話說，飲食文化的改變不是孤立發生的，它對生活空間全面的改造；臺北越來越像美國，臺灣人越來越像美國人，而臺灣人吃漢堡則既是「臺灣與美國相似」的結果，也是原因。

但是刈包以「臺灣漢堡」的面目出現，不但呈現新殖民主義的強勢，也舉起了本土飲食文化抵抗侵略的戰旗。

這類本土飲食文化業者在跨國經濟的壓力下並沒有轉業加入正式部門，以「美以美」這類小型漢堡三明治速食店的方式趕搭便車。相反的，這個刈包的例子巧妙地挪用文化侵略者的名稱來保存並推銷自己，本土的刈包於是在新的招牌下繼續販售，繼續傳承。

新殖民文化對本土文化的侵略往往也包含了階級的成分在內。賣刈包的路邊攤服務的是中下階層的民眾，使用「臺灣漢堡」的名稱，當然是利用中下階層對象徵中產階級生活的「漢堡」之羨慕心理，可見這種反侵略手段表示已經依附或接受了侵略所造成的現實，如：「漢堡是好吃的」，而刈包之所以好吃只因為是臺灣的漢堡。

另一方面，中下階層仍多在非正式部門、傳統行業中工作，也多半以傳統方式進行休閒，保有較多的中國文化。中上階層則較西化，他們的工作場所多已為西方制度所管理，生活方式及休閒文化也相當程度地為新殖民文化所滲透。因此，新殖民文化對本土文化的侵略也成為中上階層對中下階層的支配優勢之一。（就這一點而言，常見的中上階層對中國文化的敵視態度有相當複雜的階級因素。）

即使如此，在新殖民主義之下受益較少的中下階層，仍然以其有限的方式來肯定自我，肯定本土文化：他們吃刈包，不買漢堡，但是去麥當勞上廁所。

司迪麥與豬哥亮

廣告的世界也是我們的世界。當廣告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隨著鴻溝並立時，我們的生活世界也可能有分裂的危機。洋味廣告與土味廣告的並存就透露著這個危機。

以洋掛帥的廣告呈現的是坐落於西式生活形態之中，挾帶著西方文化取向，連商標品名都洋味十足的商品（如司迪麥口香糖）。由廣告的內容與手法來看，訴求的消費人口群是年輕的、都會的、中產的，這樣的人群才可能以開放的態度來迎接廣告中的新潮價值觀與道德尺度。這群人有一定程度的教育水平，而且深受西方文化及資訊的影響，因而才能收受廣告中呈現的西方事物與語意，也只有這樣的人群才會容忍廣告中若隱若現的挑戰性與顛覆性，甚至與其反叛的情緒認同。

洋味廣告有時也直接使用洋文來表達訊息，美麗的西洋風景烘托著豪華房車或西式別墅，背景音效是一連串喃喃的感傷英文（或甚至是法文），觀眾聽不聽得懂倒不重要，重要的是那股異國的、浪漫的情調，才可能襯出商品的高貴氣質與濃郁感受。

洋味廣告的拍攝手法多是快速剪接、朦朧浪漫的，影像和語句都含混模糊，帶著幾分曖昧的指涉，但是與商品本身的實際功用保持頗遠距離，看起來不是賣商品而是賣某種感覺、某種身分、某種

情調。

在另一端則是以土為重的廣告，它們不營造氣氛，不提供感覺，而是單刀直入的指出困擾消費者的關鍵（如小兒哭鬧），然後呈現商品及其成效（吃了就不鬧了）。這些廣告所倚賴的是鄉鎮文化中的通俗人物所做的口頭保證（如鄉土味演藝人員手持產品，面露微笑），商品的品牌名稱也是根本土，很傳統的（如仙桃牌、黑杆標），如果是舶來產品，那便更需要熟悉的面孔來引介了。

這些安排顯示土味廣告的目標消費群是鄉鎮的、中上年紀的、倚賴熟悉事物的，他們重視的是實用性，不太喜歡轉彎抹角的廣告而情願直接了解商品的功效，即使廣告商要賣高檔的汽車，廣告的主打還是實用的貨車。這些觀眾的價值觀也是傳統的，品牌商還得取點生意發財吉利的名稱，賣「紅龍」、「發財」而不賣有外國名的豪華房車。

土味廣告的語言多半是方言，而且最常賣的商品是各種成藥。這暗示他們的消費人口群若身體不適時，不會像中產都會智識觀眾一般，立刻找醫生看病開藥，而會因為交通或經濟原因，就近找藥房買點成藥解決，他們對科學專業的信心與知識尚不足以取代街坊鄰居提供的親身經驗。

除了成藥以外，土味廣告也賣許多飲料，但是這些飲料不是運動的、休閒的，而是強筋活骨，恢復疲勞的。這也顯示我們的社會有一群人經常勞動時間太長，體力透支太大。相較之下，卻有另一群人閒暇時光太多，生活太無聊，需要休閒飲料來刺激一下，需要運動飲料來為有氧健身操添點鹹味。

這兩種廣告的並立雖然中間隔著時段及商品類型的鴻溝，卻不是毫無關聯的：洋式廣告挾其洋式文化的優勢，往往影響到，甚至宰制了土式廣告的呈現。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土式廣告也開始使用洋人

來賣商品，而且好像不添點洋人的認可就不夠力，因此豬哥亮的廣告背景中必須出現兩個洋妞伴唱，仙桃牌體健丸也需要豐乳肥臀的洋妞操著洋腔中文說「很有效喲」。（在體健丸的廣告中，洋妞不但增加商品效力的可信度，還順便帶進西洋的審美觀，取代本土女性原有的審美尺度。）

這種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支配雖然使土洋並立所代表的社會矛盾得到了緩和，甚至出現了某種暫時的「共識」（兩者並存於媒體中而且土味廣告也必須有點洋成分才能賣），然而這社會矛盾的兩極仍然存在，而且日益擴大，也使得社會整合的目標愈加遙不可及。

除了土洋兩極的並立外，在印刷媒體的廣告中更可看見另一種強烈的對比。一邊是整版的汽車或房屋廣告，透露著開朗希望的夢境樂土，翻到反面卻見密密麻麻的分類廣告，而在愈邊緣、愈密集的下端，就愈見到充滿血淚與頹廢的黑暗角落。

這便是我們身處的「命運共同體」，一個益趨兩極化的世界。而廣告，正以聲光影像宣告這個共同體的虛幻與不可能。

天堂一瞥，邪教烏托邦

一九九〇年高雄縣大社鄉發生了一起神棍斂財騙色案，引起廣泛的關切。這樁案件與臺灣其他的類似案件有所區別，是因為牽涉其中的女性人數多達數十人，而且並非因迷藥或特殊儀式要求而一時失身，反而是甘願捨家棄夫前來奉獻財產，並任憑壇主收用或匹配。

但是這樁共居案件卻也非獨一無二，國內外有許多所謂「邪教」都和高雄神壇有共通之處。單單在美國，六〇年代便有查爾斯曼生集團轟動一時，後為聯邦調查局以謀殺及搶劫罪名起訴下獄。八〇年代印度教法師巴關率信徒千人在奧瑞崗州買下一鎮，建立公社，他個人便擁有二十七輛勞斯萊斯名車，後來以違反稅法遞解出境。一九九〇年加州著名的模特兒經紀公司也爆發一案，發現麾下許多全球聞名的模特兒皆順從一名自稱一九八六年來地球的外星人男子安排財產及配偶。這些「邪教」違反各自時代的家庭制度與財產制度，和使徒時代原始基督教會的做法極為類似。

反文化、反社會的宗教性集團和合法宗教機構也有共同點，那就是財物的募集。只不過，合法宗教成員的甘心捐獻被視為「奉獻」，而「邪教」成員的甘心捐獻被局外人或改變心意的信徒稱為「騙財」。

故而，宗教集團是否被視為「邪教」不在於它是否「斂財」，主要是看這些團體的生活形態是否有損社會中已存在的、被認可的道德規範，及是否與既存的權力關係衝突。在這一點上，「邪教」成員之間開放的、不合一般習俗的人際關係與性關係直接挑戰了一夫一妻制度，以及家庭中的男女宰制關係，是局外人最無法接受的。

宗教心理學家認為許多宗教所提供給信徒的是一種強烈的歸屬感，以幫助他們克服個人所感受的疏離感，在這一點上，「邪教」與正統宗教的社會心理基礎並無不同。不同的是，「邪教」的信徒因為個人在現存社會制度內的處境而有更大的疏離感。

以高雄神壇中的女信徒而言，多為夫妻不和，或感情生活及性生活不愉快的女性。她們在正統的、建制化了的、只強調個人私密宗教經驗的合法宗教中，找不到克服疏離的力量；邊緣的非正統宗教則提供緊密的人際關係，成員間甚至以最親密的聯結方式：性，來認定彼此之間的親密共居。宗教信仰的神聖前提與集團領袖的旨意，也幫助信徒克服任何可能衍生的道德譴責感，讓她們擺脫壓抑與禁忌，在愛情和性上面都得到比過去更多的滿足，也難怪她們情願離家入壇。

「邪教」信徒公產共居的生活方式，固不見容於我們這堅守一夫一妻制但又不改進宰制性夫妻關係和性生活的社會，它卻在有限的時空中讓信徒瞥見了烏托邦的一角：愛情交流、性關係敞開、財產共有；無怪乎這類案件層出不窮。至於「邪教」的領導者個人是否腐化、或居心不良、或是耶穌般的聖人，這和「邪教」為何那麼吸引人是不相關的。

當然，「邪教」妄想以少數個人在孤立隔絕的空間中追求實現天堂，這種努力會遭到取締，這個

結局也是古今中外皆然的。而天堂的應許既然落了空，自然就會有一些「受害人」覺得受了騙，以出面檢舉來減輕重投家庭懷抱後所遭遇的道德譴責，結果也讓我們這些局外人苦惱地徘徊於思考「自願／受騙」的分野及社會小團體的自由及人權等問題。

不同國女人／
2
3
4

第十三章

電視媒體

誰怕大陸女星

大陸的娛樂雜誌報導了有關大陸女星陳沖、叢珊、張瑜在臺陸續推出劇集但是相繼失利的消息。

對於這個現象，大陸和臺灣的媒體各有其分析，妙的是，兩岸的分析卻同樣假設了一種由男性利益主導的普遍觀視習慣。

大陸的媒體說臺灣觀眾偏好清純的女星，因而比較不喜歡大陸來的這些年齡偏高的女星。這裏的玄機在於：女星的年齡其實不是關鍵所在，她們所投射出來的女性形象才是真正的原因。在我們這個由男性利益來主導的社會之內，觀眾要的「清純」是那種未經世故、心地單純、可以為傳統美德奉獻一切的女性，唯有這類型的人物刻畫才能支撐並鞏固有關兩性關係的普遍常識。在這個前提之下，即使像潘迎紫或劉雪華這些不再年輕的女星，只要她們仍然表現出好女人的清純美德而且在劇中終有善報，觀眾還是愛看的。

相對的來說，大陸女星在臺灣劇集中的演出，投射了成熟的、理性化的、冷靜的、在權力關係中運作自如的自信形象。由於她們的表演方式流露出一種臺灣女星尚未展現的內斂與堅韌，習慣了傳統女性形象的臺灣媒體還不知道該如何處理，臺灣媒體只得挪用我們最慣常的思考方式來理解並批評這

種獨立自信的女性形象——那就是用政治制度的隱喻來要求大陸這些「體制」下薰陶出來的女演員「必須突破體制化的演出」，「加入更多親合力和人性化之精神」，才可能受到臺灣觀眾的喜愛。

這種蘊含反共訊息的語言是另一種男性觀點的呈現。臺灣媒體所要求的「親合力」和「人性化」實際上是希望大陸女星們有更合乎本地女性形象的感性演出：比方說，劉雪華的情感澎湃、雙淚長流，或是潘迎紫杏眼圓睜、故作可愛。不管如何，媒體要的是最浮面的情感宣洩，因為他們相信女人就是淚水做的，女人關心的唯一事情便是情感方面的事。一旦遇上沉穩洗鍊冷靜睿智型的大陸女星，此間媒體的刻板觀念找不到印證，就只得用印象中對方政治體制的「冷酷」和「非人」來解釋，大陸女星的表演方式也就在男性的泛政治化傾向中犧牲了。

其實，在臺灣的現實中，許多女性早已脫出了清純形象的桎梏，她們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是成熟洗鍊、自信獨立的。對她們來說，電視劇中一貫清純賢淑的女性形象不但顯示我們社會過度的美化某些女性的無能無知，更在獨立女性追求自我實現的過程中形成一再的困擾。此時大陸女星的演技以及她們所投射的成熟自信女性形象為眾多女性觀眾開闢出各種可能發展方向，更鼓勵女性肯定自我，展現理性思考及果斷決定的能力，這種影響力可不是媒體對大陸女星的蔑視所掩蓋得了的。

在臺灣的影視事業日漸趨向分眾及小眾的腳步中，女性追求突破和自主的動力會為這些大陸女星的演技定出另一種正面的評價。

為何檢查電視？誰在檢查？

一九九〇年，一個逗笑的電視節目「連環泡」在王偉忠的策劃下推出了諷刺諧擬時事的皮偶秀，製作了一批和官員面貌神似但誇張的皮偶，並演出短劇，結果遭到被禁的命運。有人認為這種檢查是電視文化的危機，或威權政治的結果，以下我則想從一個更廣泛的角度來談。

在現代生活裏，電視可以說是最便宜的娛樂形式。就看電視的觀眾而言，不花車費、票錢或其他開銷，也不用顧慮衣著、排隊、品味，只要在自己家中的安穩環境內，一家大小就可以鬆弛公餘課後的疲倦與緊張，填滿沒有特定嗜好或活動的閒暇時光。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電視節目的水平趨向一個在知識分子看來偏低的層面是很自然的事。畢竟，電視節目分化（區隔化）在臺灣還在起步階段，尤其是熱門時段，三臺播出的節目性質與內容大同小異，既要符合最大異質人口的不同需要，節目就不能太突出、太尖銳，而必須中正和平、老少皆宜，就像狄斯奈普通級的電影一般。而且，就大部分民眾看電視的目的或者電視被賦與的功能而言——鬆弛身心，消遣煩悶或孤獨，以便恢復體力精力投入第二天的工作——電視節目即使有刺激性或敏感性，也必須包裝在輕鬆的、虛構的氣氛中，讓觀眾不要太当真。

放在以上的框架內，一九九〇年發生的皮偶被禁事件可能還算不上電視文化的危機。它不過凸顯了現階段電視文化的功能尚不能包容太敏感、太刺激的題材及形式而已。

許多人對皮偶事件的反應總是把它放在政治的層面上來談，這大概市我們臺灣現階段泛政治傾向的影響。事實上，皮偶被禁只不過展現了大眾傳播媒體文化的界限，這個界限不單單針對政治上敏感的話題或表達，對非政治的內容或形式一樣是要檢查的。臺視「春去春又來」連續劇因暴力傾向而受罰，中視「京城獵人」連續劇因性暗示過多而受警告，此外，「天才父母」、「我愛芳鄰」都曾經因為劇情荒誕胡鬧，或者對男女關係的倫理道德做了不合中國傳統民情的描繪而遭到警告，這些最近的例子都市檢查制度現形的紀錄。

做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各個階層的檢查制度並不是只看政治上的成分。只要節目內容或形式逾越了電視被賦與功能的範疇，只要節目可能有損社會生產的持續正常運作，檢查的手都會伸出來，特別是熱門時段節目的篩選上。這樣來說，皮偶被禁也就不足為奇了，它再度顯示了日常生活的各層面原本便受到營造而且由國家機器繼續維持。

以上的說法點出了國家機制透過檢查制度的黑手所進行的社會控制，其實，檢查制度只不過是最明顯可見、屬於官方體制的控制，另外一些不太明顯的控制則透過非官方的方式表達。畢竟，政治上的威權體制並非社會中唯一的統治關係，父權體制下的親子關係、男女分工、師生倫常、上下禮儀，或者性道德、工作倫理等等，一旦遭受戲弄、質疑，或挑戰，不待官方的手伸出，一般衛道民眾也會用電話或投書表達「民意」，敦促主管要求改正。電視的「三朵花」便接到民眾抗議，說是對變態心

理的描寫太過火。中視「鋤頭博士」中對教官形象的表現也受到教官群的抗議。另外，像觀眾要求女主角必須從一而終、夫妻必須破鏡重圓、失足必須成千古恨等等，這些都標誌出大眾媒體的疆界是時時有人巡邏的。

皮偶被禁是不是敏感題材的末日呢？我想不會。在這麼一個工作強度日漸提高（也就是生產效率的提高），競爭愈來愈強，挫折感和不滿逐漸凝聚的環境裏，電視媒體的娛樂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只不過，社會複雜化，生活形態多樣化之後，觀眾也會因為興趣與關切的差異化而期待更多選擇的娛樂形式或更精緻的製作，若是電視承繼過去闔府觀賞的節目形態，當然無法滿足需求，結果觀眾流向錄影帶、MTV、小耳朵、第四臺等等出路就是必然的。

因此在可預期的未來，電視頻道的開放與區隔化勢必會實現，以滿足不同階層觀眾的需求。新聞局也許會一下子開放許多頻道，也容許敏感題材（如政治、色情、暴力等等）占據頻道與時段播出，但是，由於觀眾群分化，選擇增加，敏感題材的「刺激性」也會比現在「大家都看」的效果淡。

即便如此，官方也不會輕言取消檢查制度，因為這是權力的具體展現。而且不但官方要檢查，民間的保守勢力也會繼續監督。諷刺的是，不論官方或民間的檢查制度都有其侷限，有時他們對近在眼前的事物卻視而不見。

比方說，常常有衛道之士嚴密監督電視節目的內容，一旦發現有色情、暴力、政治敏感話題，或道德上可質疑的成分，便立刻大加撻伐，要求嚴格管理。其實，節目中直接的、明顯的道德逾越往往引發大眾的戒心，因而影響十分有限，倒是電視節目中有一些屬於無意識層面的成分卻是衛道之士察

覺不到也檢查不了的。

就以八點檔連續劇為例，一九八八年的一檔「雙面遊俠」，雖未在喜歡愛情與淚水的婦女觀眾群中獲得共鳴，卻在少年學子群中普受歡迎。表面上看來這檔戲劇有科幻的想像內容，迎合孩童們的好奇心理，但是「雙面遊俠」的整個劇情架構卻具體呈現了親子關係中最深層、最不能為人所道的「戀父情結」。

劇中的子女輩人物都在身分混淆不明的情況下，與父母輩發生曖昧的愛恨情感，結局則是父母輩偉大地以身相殉，拯救子女（及社會），迂迴地成全了子女無意識中的弑父衝動，也在子女的淚水中解除伴隨亂倫衝動的罪惡感。

可笑的是，衛道之士竟然沒有看到，像「雙面遊俠」這樣巨大的戲劇呈現，才會對那些正在處理戀父情結的少年們有真正的影響。

不論如何，電視節目的檢查或禁演或許沒有實質效果，也或許無所不在，但是我們一定要批判並終究衝破檢查制度；畢竟，檢查制度本身所代表的單一僵化思考模式是無法鎖住充滿矛盾和緊張關係的社會文化的。

金泡的幻滅

一九九〇年初，娛樂逗笑的電視節目「連環泡」推出了「金泡獎」這個主打單元，內容則是以諧擬方式諷刺或揭露媒體與商業利益、政治力量勾連的內幕，以及節目製作過程中對觀眾、媒體角色的一些荒謬假設或對待態度。未料推出不久後便自動取消。

至於「金泡獎」停播的原因，有可能是如印刷媒體所言，此單元「太過專注圈內祕聞，難引觀眾共鳴」，那麼，「金泡獎」的結束是個單純的市場運作問題，觀眾不愛看，節目當然播不下去。

可是，這個單純的市場取捨問題事實上卻透露出一些很有意思的訊息。

「連環泡」節目自從推出諷刺時人時事的單元以來，收視率高居不下，顯然該節目的觀眾頗欣賞這種以嬉笑怒罵來揭露世間百態的方式，也就是所謂「諧擬」（parody）的表現方式（這和當今印刷媒體上政治諷刺漫畫大行其道有相同原因）。

諧擬要想成功當然有其先決條件。首先，它所模倣諷刺的主題必須是觀眾所熟悉的。唯其在誇張荒謬的凸顯中認出原來要攻擊的對象，才能在觀賞中得到辨識的樂趣。

同時，它的題材最好具有高度時效性，一方面可以解釋為何要使用這種頗誇張、頗刺激的手法，

另一方面也可引起比較強烈的關注。

其次，諧擬的諷刺效果往往建立在觀眾所共有的一些不滿情緒上，唯其觀眾先有不滿，諧擬才會帶來發洩的滿足。

就這三方面來說，「連環泡」的諧擬單元可說是十分成功的。「中國電視史」單元以嘲諷的誇大表演指出電視節目內容之荒誕陳腐，所使用的素材是那些常看電視，以電視為主要消遣方式，而年齡又還足以記得一、二十年來之電視節目的觀眾所熟悉的，他們透過時空的差距回首前程，在喚回記憶的溫馨感覺中依稀分享了電視媒體及節目的長足進展，也在對陳腔濫調的諷刺中舒坦了心中悶氣。

「七點新聞」單元上檔後更進一步擴展諧擬範圍達到大眾關心的社會政治層面，題材常具爭議性，時效性極高。對那些在這個社會中有親身經驗因而有強烈挫折感的觀眾而言，「七點新聞」替他們發出了不滿的聲音，給他們一些安慰，對那些並無親身經歷但卻（由於道德關切感或其他原因）常看電視新聞或電視新聞雜誌的觀眾而言，「七點新聞」的內容戲劇化了本來一知半解的新聞，仗義提出質詢，滿足了他們求知求正義的心理需求，在我們這個現階段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七點新聞」的成功絕非偶然。

同樣以諧擬手法諷刺電視現象卻在觀眾群中慘遭滑鐵盧的「金泡獎」和以上兩個單元有什麼區別呢？

很多人說「金泡獎」只談小圈圈中的內情，無法引起觀眾的興趣，這個說法有兩個問題。首先，我們活在一個常被稱為「大眾傳播」的或「媒體的」時代。因此，這小圈圈內的人與事常常在小圈

圈之外營造出巨大的影響力，畢竟，是這些人的政策或言語行動占據並左右我們的資訊（也包含各種意識形態）管道。

更重要的問題是：「金泡獎」所公開的所謂「內幕消息」也並非內幕，只要是常常閱讀印刷媒體，不倚賴電視為唯一資訊管道的觀眾都已在其他地方讀到過這些「內幕」。事實上，「金泡獎」單元的諧擬效果正建立在對觀眾的這種預期上。

另一方面，「金泡獎」的內容固然是電視圈內的形形色色現象，但是它們的呈現卻可以為那些仰賴電視媒體，以電視節目中所呈現的世界為自然天成的觀眾提供一劑醒腦丸。透過「金泡獎」的諧擬，觀眾也許可以反省到自身所接受的資訊原來是經過「政策」和「檢查制度」選擇而來，他們也能看見電視節目如何和商品（包括歌曲，服裝、形象等等）的行銷緊密掛鉤，更可能研究主管單位及公眾人物的「默契」及「妥協合作」如何塑造我們的電視世界，甚至觀察偶像如何成為並且維持偶像的形象。

簡言之，「金泡獎」揭露的是電視世界的成形過程，正是電視螢幕必須沉默不說的。而且，這些「內幕」不但不是與觀眾不相干，反而是大有關係的。它們構築了觀眾所見的電視世界，篩塑了觀眾的資訊，甚至可能間接影響觀眾的判斷與行為。

假設這麼一個有可能發人深省、引人思考的諧擬單元真的不太受觀眾歡迎，那麼這個現象就暴露出「連環泡」大多數觀眾的心態。首先，他們是資訊來源極為有限的一群，靠電視媒體多過印刷媒體，因此諧擬的對象一旦超越他們平常靠電視所得的範圍，便無法引起他們辨識的樂趣。這種廣收資

訊之興趣的缺乏同時也反映出這些中產觀眾對目前電視節目的呈現或電視世界的狀態沒有太強烈的不滿，他們不太意看節目時順便接受商品推銷，不太在乎接收支離破碎刪減變形的資訊，也不太對惡性競爭所造成的水準低落，甚至還願意忍受管道壟斷下的缺乏選擇。缺少了對電視媒體結構的強烈不滿情緒，難怪這些觀眾不覺得「金泡獎」諧擬的表演貼心了。這，恐怕是「金泡獎」停播的悲劇意義。

第十四章

生活環境

今天別呼吸

你是不是有呼吸道的毛病？你是不是像臺灣地區的大部分人一樣，喉嚨多痰，咳嗽頻仍，而且容易感冒？

你知道是誰害你的？

醫生說，臺灣的空氣品質是最主要的禍首。

可是，為什麼空氣品質會惡劣呢？

氣象局說，是因為空氣中的污染懸浮粒太多的緣故。

那麼，污染懸浮粒又為什麼會那麼多，以至於在某些日子裏，氣象局還會警告民眾沒有必要就別出門呢？

氣象局的答覆很簡單：因為沒有風。哦！原來平常的日子裏空氣中也有過高的污染物，只不過被風吹散了，所以我們還能勉強存活。

今天空氣品質惡化了，不是因為沒有風，而是因為有人失職！

官方的無風說詞顯然是圖利未做好環保措施的工廠、燃燒廢棄物的不肖商人，以及無限制引進並

販售汽機車的廠商，也替官方主事者的私利與無能脫罪。

同樣的例子充斥於我們的社會。你不也為家中熱水器的安全與否提心吊膽嗎？

官方的說法是，民眾自己不小心（未開門窗或安裝位置不當）才造成每年上百條人命死於一氧化碳中毒。可是，同樣的熱水器裝在香港更狹小封閉的戶內空間卻未造成這種禍害，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要求安全標準高，加裝安全氣閥。而我們的官方卻圖利廠商，容許劣質的、危險的熱水器繼續販售。

自來水廠叫我們多耗能源把水煮沸久一點才喝，廠商向我們鼓吹要買過濾器或蒸餾水製造機，再不然就買瓶裝水來喝。是誰陷我們於這種惶惶自保的情境？

官與商之間的互利不是包工程時才有，現在是我們分割這對連體嬰的時候了。

無車階級的權益

——公營交通事業不應裁減基層員工

報載臺汽因營運未見改善，計劃在三年內裁減四千五百餘名員工，以圖精簡人事費用的支出（臺鐵也考慮跟進）。這次裁員對四千餘員工的生計來說是一大打擊，但是對倚靠大眾營運的民眾而言，又再一次證明了政府政策的偏頗與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

臺灣的交通混亂與擁擠已成了民眾對政府最不滿意的施政之一，但是我們卻看不見改善的曙光。捷運千呼萬喚始動工，而同時政府卻開始談興建大型購物中心，這顯然又是一個未有自用車階級設計的政策，因為只有他們才有交通工具開到市外購物，只有他們才有運輸的空間載運大包小包的商品返家。這樣的政策和發展汽車休閒工業及休閒據點一樣，都是再進一步鼓勵小汽車的成長與普及，對地狹人稠、污染與壅塞並劣的臺灣而言，實在不智。

政府近年來已經為有車階級開闢了更多高速公路，修建了立體停車場，劃出了街旁停車位，降低了關稅。但是，倚靠大眾運輸的民眾得到的「照顧」卻只是更狹窄的巷道，更污濁的空氣，更提心吊膽的行走經驗。現在臺汽大量裁減員工（幾近三分之一），無論由哪個角度看，必然導致路線刪減，班次減少，而司機先生兼任票務更會惡化駕駛服務，汽車工與清潔工的減少也令人為交通工具本身的

品質擔憂。

我們不禁要問：政府的政策與社會資源的分配到底要什麼時候才會考慮無車階級的需要？考量臺灣的現有環境，實在不應該繼續創造惡劣運輸條件以至於更多人被迫購買使用率很低的自用小客車。政府真正該做的是發展更多的大眾運輸，在城市與衛星鄉鎮間建立良好、便宜的交通網，不但要彌補無車階級多年來為有車階級的方便與舒適所付出的社會成本，更要盡力遏止自用小客車的成長。

無限制的工業發展政策已經為我們留下了環保的噩夢，我們不容許遍地自用小客車的虛幻經濟遠景使得有些人處處可去（只不過常常陷在車陣中），而另外一些人卻被孤立在鄉鎮偏遠地區。大眾運輸是社會的公共設施，不能以利益的盈虧來衡量；正如公園和街道不能因地價高漲而改建成住宅或商業大樓。臺汽或臺鐵等公營事業固然有虧損，但是如果政府不加檢討或重組，只單純的裁掉基層員工，那麼大眾運輸的萎縮或死亡所帶來的社會成本虧損將會遠超過金錢所能衡量，而且也將是無法逆轉或彌補的。

馬路如虎口，行人沒處走

【本報訊】日前一名婦女帶著兩名小孩在省道的路肩上被轎車撞到，夾在電線桿前，造成一死一重傷。（中國時報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四日桃竹苗版）

常聽人說，路是人走出來的。不過，證諸今世，行人不但再也走不出路來，而且還得避著路走。因為路是為車子而開的。

當行人和車輛在路口爭道時，有人想到一個號稱既保障車速又保護行人還施惠營造商的三全辦法，於是臺灣創下了最多行人陸橋與地下道的紀錄。可是這個設施是建立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上的：車輛按著正常速度刷的一下過了街口，行人則被迫爬上爬下才得保命。

在平面的街口，都市劃出了行人穿越道，說是行人集中定點穿越，大家都得方便。可是，道上的行人要是遇上了車輛，還是得避讓三分；畢竟，渾然忘我的新進有車階級渺小但急需肯定的尊貴姿態勢十分脆弱、不容許無車階級挑戰的。

遇上了交通單位要找代罪羔羊以斷定是誰在影響都會車流速度的時候，矛頭指向的不是亂換車

道、亂超車、亂停車的有車階級，反而又找上了這個氣喘吁吁、躲躲閃閃的行人，說是罰他個三百六十元就可以加快城市的運轉了。

這是個常見而且有效的障眼法。因此，交通品質惡化到天天塞車時，想漲費率的計程車司機與不甘被宰的乘客，都沒有去批評由始至終缺乏遠見與魄力的交通規劃者與都市建設者，反而在媒體及公聽會上彼此對罵。

最新的一招障眼法則順著有錢有權的有車階級，把他們對交通的不滿導向愈來愈弱勢的無車階級，把一切罪過推給時間同樣寶貴的行人。

如果照官方說法要把屬於行人的空間還給行人，那麼就讓我們在平等權利的基礎上來檢視都市空間的分配和使用吧！

核電異形

——他們為什麼一定要核電

核電工業是個已經繁殖得很大的異形。

搭配著核能研究在冷戰期間的長足發展，核電工業（和核武工業一般）集中了大量的資本，建立起核電軟硬體的設計、研究、生產、行銷及後續維護，每個環節都牽涉到大量的物力和人力。

單以人力來說，因應核電工業在本世紀中的高度擴張，學術領域中的核能科學家及專技人員多投入核電研究來吃頭路或申請研究經費，也透過核能工業所聚積的大量資本所形成的物質影響力，而在政府決策及預算上取得發言權。此外，他們在學術及教育的制度內也不斷生產出新一代的核電工作人員與技術專家。這種人力的累積不但擴大了核電的理論正當性，也強化了核電科技的影響力。

核能研究與核電工業之間的共生關係建構出一個由資本（體現為人力和物力的集中）堆砌起來的運作系統。和所有的工廠一樣，這個生產體系一旦就位並開始運轉，就必須不斷的維持生產，不斷的壯大自己，否則便無利潤可言，資本也就無生機可言。在這股再生產的驅力之下，即便可能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或民眾生命財產的危險，資本的考量總是向著利潤的。

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核電工業在先進國家內無路可走之時，會投向環保意識還不夠成熟的第三世界

——資本總要回收它的利潤啊！

核二廠再度因人為疏失而跳機，拉響了核電供應的警報。有關單位說「員工的危機意識太低」，因而沒有謹慎從事，是員工的錯。

可是員工的輕忽心態和原委會及核電人士一向的擁核宣傳是一致的：既然上面的人說核電如何安全、如何不污染，那麼，員工又何必要有那麼強的危機意識呢？在這裏，誰騙了人就很清楚了。

吹哨人

英文用「吹哨人」(whistle-blower)來指那些挺身揭發本身所屬公司機構單位之弊端黑幕的人。

吹哨人所面對的道德難題是：應該對所屬單位（特別是上級）忠貞，對本行專業的形象忠貞，還是對因弊端黑幕而受損的大眾忠貞？這三種忠貞不一定互相排斥，但是當對大眾利益的忠貞一味受到其他兩重忠貞壓抑，那就是吹哨的時候了。

在這種充滿爭議的時刻，吹哨人也會面臨現實權力的難題：那便是來自上級、同僚或其他不樂見爭議升起擴大的權勢之人以各種方式進行的反撲，而由於吹哨人通常居於低位或在決策權力圈外，他也最強烈的感受各方壓力。（我們別忘了，正是因為他在爭議的議題上無法施力，所以才只得採用正常管道外的吹哨來改變局勢。）

換個角度來說，愈是封閉的、階層架構嚴謹的、權力分配不均、而又無管道協調的企業或機構，就愈蓄積張力，也就愈有可能在爭議的時刻激發吹哨人發出警訊暴露這個機構的不合理運作。

從這個角度來看最近（一九九三年）的兩個案例就很有意思了。

其一，教育部所屬的機關學校由於哨音常現，竟然需要部內的政風督導小組設立「防止員工誣告、濫控執行要點」，以免「不當言論破壞機關形象」，更規範員工不可越級上告——也就是不准吹哨。

其二，在各項公共工程弊端百出，醜聞滿天之際，我們只聽見政客們推擠推拉責任歸屬之詞，卻不聞任何專業的工程人員出於道德正義感，出於對大眾利益及安全的忠貞，挺身吹哨。

不管是不准吹哨或不聞吹哨都是我們社會太過封閉的警訊。吹哨之人是今之聖人，因為只有他才肯因為大眾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前程。比起那些以為作官的道理便是「做人的道理」（台北市長黃大洲語）的官員來，我們就更需要吹哨人。

第十五章

教育

誰與成年人立約？

中國人「棒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的傳統名言，最重要的意義就是為父母師長確立自身權威時所採取的激烈行為提出正當化的說詞。

在權力關係中占優勢地位的父母及師長告訴棒下的孩子，「我們都是要你成器」；但是，這些成年人同時也相信，唯有以最赤裸的暴力方式才能讓孩子最快速的、最徹底的看清楚，是誰在當家做主，是誰的道理比較「正確」。

這個通俗的做法在過去站得住腳是因為在威權模式的社會中，大部分人接受父母和師長的威權地位，不懷疑他們的決策，故而還有「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種說法，志在維護父母的權威。

可是，現在不同了，威權體制一旦鬆動，父母師長與孩子之間原有的以上壓下的互動模式失去了道德上的支撐。也正是在這樣的脈落之下，一九九三年人本基金會才能推動「與孩子立約」的運動，希望對長久以來的體罰行為加以約束。

與孩子立約不再體罰，固然在某一方面使得成人與孩子之間的關係理性化，改善孩子的權力位置，可是，大人打小孩的原因並不只是因為大人要確立親子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畢竟，成年人同時

還陷身於其他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中：在孩子面前，成人可能表現為強勢，但是在苛刻的雇主和兇殘的配偶面前，她卻是被壓迫的、被剝削的、被侮辱的。

處在這些不利的社會位置上的成人顯然比較沒有動機和能力與孩子立約，甚至守約。因此，現在要問的是：對這些被壓迫被剝削，只有在位置更弱的孩子身上可以透過暴力得到一點肯定與滿足的成人來說，誰又來與他們立約，改善他們在其他不平等權力關係中的弱勢地位呢？

學生上電視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有愈來愈多的學生上電視了。不管是團隊競賽節目或是一般綜藝節目，螢光幕上總是看到一排排穿著整齊校服的年輕學子，或熱情地配合節目主持人製造效果與氣氛，或劃一地向偶像特別來賓喊著忘情的口號。

憂心者指出，學生應專心課業，這種對媒體對偶像的迷戀之風不可長，也有人指出學生容易被商業電視的表面虛浮所影響，以致甘心淪為節目中的活動道具。

可是，就學生來說，上電視為他們單調但充滿壓力的學生生活開了好幾扇活門。

從休閒的角度來說，除了郊遊、烤肉、唱卡拉OK之外，又多了一個集體活動的場所，可以不費一文地參與平日只能在螢光幕上遙望的歡樂場面。即使在節目過程中被要求集體喊口號或鼓掌，在沒有教官的監督或成績的壓力這類權威架構之下，願意合作是學生施與製作單位的恩惠，是他們對偶像的真情流露。這樣的集體休閒釋放出學生對權威架構的不服，轉而以學生願意接受的方式來展現他們的自主能力。

除此之外，學生也在電視節目的參與過程中體會到另一種社會報酬、另一套邏輯的可能。本來在

學校的脈絡中，只有成績好的學生或者乖乖聽話的學生受到認定與獎勵，現在到了電視臺，在一個萬眾矚目的媒體上，學生赫然發現，被看重的不再是成績、不再是聽話服從，反而是愈敢秀、愈敢講的學生受到注目。這種平常在學校被視為異類的表現，在另一個社會脈絡中得到肯定，對於過分要求單調一致的教育制度來說是有平衡作用的。

或許，學生上電視的「爽」勁兒正是對教育者的一個提醒：為什麼教室不能提供給他們類似的肯定與自主空間呢？

無教有類

一九九〇年，為了贈送國外的孔子塑像上的「有教無類」英文譯法，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國際文化會數度邀請學者研議，商討後，決定擴大對外徵求譯文，以尋找最貼切的譯文。

其實，所謂「貼切」當然是相對於特定的社會條件，即使孔子當年提出此一口號時也是相對於他的社會環境的。我們或許仍然可以由此歷史口號中，提煉出一個（相對於目前社會情境的）抽象的理想，來做為孔子教育精神的代表，但是這個抽象的理想要翻譯成什麼樣的英文，好讓生活在不同文化社會情境中的外國人也能心有所感，絕對不單單是個英文的問題。事實上，這個抽象的教育理想在二十一世紀邊緣的臺灣情境中應該如何落實、如何了解才是個更根本的問題。

在文復會與教授努力向外國宣傳中國人有教無類的同時，一位北市弘道國中的家長默默地在教育部門前進行絕食，以抗議國中行之多年的能力分班制度。這兩個和「有教無類」相關的事件於是並列構成一幅極其嘲諷的畫面。

對於所謂「升學班」的學生而言，不管有類還是無類，只要有教就好，反正在任何能力分班的制度之內，他們一定會出「類」拔萃表現優異。但是對所謂「放牛班」的學生而言，他們所受的教育是

「無教而有類的」（「你們這一班」，教了也沒用），替這個「無教有類」遮羞的則是另一個抽象的口號——「因材施教」。這種教育實際上所達成的效果，說穿了不過是對學生的篩選與（持續）區隔，一切所謂升學主義、考試掛帥等都只是這個最終目的的片面表現而已。

對學生的篩選與（持續）區隔，在我們這個社會中主要是透過「公正客觀」的評分過程來進行（公正客觀到統一考試、電腦閱卷計分和分發），按成績把不同學生送入不同的教育管道，再循序進入不同的社會職能軌道及階中。於是，考不好的學生入放牛班，唸職校，擔任中下層工作；考得好的學生入升學班，上大學，出國，享受中上的職位和薪水，這種分配看來就十分公平了。誰叫你讀不好呢？

可是，即使這些評分的方式（如考試、論文、寫作等）是絕對「客觀公正的」，讀得好與不好也絕對不單單是個「讀書」的問題，它所牽涉到的是「讀書」這個活動所坐落的整個社會的階級生活。

我們可以信手例舉幾個明顯影響學生表現的因素：嬰兒期或幼年期的營養問題、成人照拂的程度與性質、學前玩具或啟智材料的供應與使用、家庭空間的分配與品質、成人的期望與督促、社區生活的支持與鼓勵、教育機構的品質與社會定位、媒體建構的慾望與形象和學生實際體驗之間的差距、社會職能的分配方法與可能發展。凡此種種，無一不牽涉到整體社會資源的分配與運用。而這個大環境的階級安排，在大部分狀況裏都先行地影響到一個學生踏得上哪一條社會職能的軌道，教育的實際功能便在重覆肯定這個分配的合理性。即使偶爾遭遇一些異數，有些學生意外地踏上了不該上的軌道，而且不能或不願按牌理出牌，教育機構也有它一套「合理的方法」，要不就終究收編異數，要不就

「公正地」將他們三振出局。

簡單地說，我們的社會是個階級社會，下層階級很難流動到上層去，而上層階級又要以一些看似客觀公平的篩選制度來保障自己的子女持續地留在上層階級。眼下的教育正是這種為階級社會服務的篩選制度。評分、評等、好壞學校之分、升學班放牛班之分……都是這個篩選制度的一部份。

從這個角度來看，弘道國中家長對能力分班的絕食抗議，應該是一個對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抗議，而這件事情在鬧熱滾滾的考季中出現，無異是把此間教育的本質徹底揭露，更是文復會諸公的臉上打了一個大巴掌。

校園民主

——「民主治系」與「教授與學生共同治校」

校園「民主」的理念僅止於大學法中宣示的教授治校嗎？

在我看來，由於目前大學中的教師以男性占絕大多數，因此所謂「教授治校」的理念恐怕只是校園權力結構重組過程中已經占有優勢的男性坐地分贓而已，不但無能處理性別不平等問題在校園中的各種呈現（如校園性騷擾、護理課程的內容安排、女生宿舍門禁問題等等），也無能公允的對待校園中師生之間的權力不平等問題（如文化大學美術系罷課事件中凸顯的系主任獨裁現象、以及各種課程的教學評鑑遲遲無法推行等等）。

為了真正落實校園民主，下一階段的努力目標應該是學生與教授共同治校，在平等互敬的協商中處理校園中的各項事務。這種權力結構的進一步鬆動、開放，將可讓校園中占大多數但十分弱勢的學生有機會參與決定和他們切身相關的教育過程，也可以讓已占大學人口百分之四十九但一直居於從屬位置的女學生有機會展現她們的關切與利益。

這個民主化的過程首先要從系所的層次上做起，目前各大學的系所在課程安排、師資延請、研究發展、學生管理等方面仍然有權力過度集中的現象，而當擔任系主任的人有當官的心態的時候，這種

權力的集中就形成了既不民主也不進步的狀態。

因此，民主治系最主要的目標就是系務決策權力之分擔。這不但包括各級教師有權與系主任共同決定系務發展的各項決議，同時更要把至今妾身未明（常常被當成工友來使喚）但是已成實務靈魂人物的助教們，以及占系所人數絕大多數的各級學生，都包含在決策權力圈內，使他們能在平等的權力位置上參與塑造和他們息息相關的事物。

教育既不是單面的灌輸，那麼教育的具體呈現——教程——也應該是學生與教師集體協商的結果。過去常有人說學生不夠成熟，知識不足，因此應該由教師（特別是權力位置上的資深教師）一手決定學生要接受何種教育。這種出於強勢位置的父兄心態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教育不是教死的知識，而是教活人如何創造並使用各種各樣的資源，而這種使用和創造的能力所牽涉到的絕非被動的接收，而是主動積極的運作。在這一點上，學生參與課程與教程的規畫、任課教師的指派、評分與教學評鑑的設計等等，都會直接有助於這方面的學習。教師們也可以在同一協商過程中革除威權心態，學習如何和學生在平等的立場上互動，唯有這種自我革新才可能調教出擺脫權威性人格結構的下一代。

教育是師生共同學習的具體過程。對習慣做權威的教師而言，校園民主或許帶來不安，因為師生不平等關係的動搖意味著其他不平等關係的動搖（如親子關係、兩性關係、尊卑關係等），也就是自我的重新定位。但是，與其做遲早被民主列車輾過的死傷人口，何不上車來一齊共創未來呢！

後記：

本文中的「民主治系」理念正是中央大學英文系在過去一年中努力推動的。具體的目標包括：

一、系務會議的成員不但包括各級教師，也包括助教及學生代表若干名全權出席。此後學生若有意見或構想，不必用請願或大字報等體制外、由下向上的管道來要求改變，而可以把他們的想法放在系務會議的協商環境中接受考驗，更可以民主運作其他成員支持通過議案。

二、系務會議由系主任召開，但每次開會由系務會議成員推舉主席主持會議，即使學生或助教也有機會擔任會議主席。而為了做好準備，每次系務會議可先行推舉下次的主席，以便與系主任商量會議議程。

三、系務會議之下的各個工作委員會成員由系務會議代表推舉產生，而且每個成員不得在兩個以上的委員會中任職，以免權力過於集中，而且可以保障所有成員皆可在不同的委員會中參與實際的系務運作。

四、各班級的導師人選由學生票選決定，以便產生最適合和學生溝通的導師，而且各個課程每學期皆由學生做教學評鑑，以確保雙向交流的教育過程。

罷教也是一種再教育

反對賦與教師集體罷教權的人最喜歡用的理由是：教師們應顧及學生的權益，即學生的受教權。於是我們驚訝的發現，連排課陞遷都操在上級教師及行政人員手中的基層教師是校園中的二等公民，而為了剝奪他們唯一的抗爭權，反對罷教權的人竟然動用到在校園中最不受重視和保障的三等公民——學生——作為藉口。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位學生的權益著想，我們一定要賦與教師有集體罷教權。

罷工、罷課、罷教，在中國歷史上曾做出可歌可泣、推動歷史靜展的貢獻。不論是民國初年反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或是五四時追求傳統文化的蛻變，甚至在一九九四年文化大學美術系學生追求創作自由的抗爭過程中，這些看來激烈的手段不但樹起了對抗強權的人權大旗，也為周遭的社會建立了積極的正面的教育功能。

罷課或罷教不是中止教育，相反的，罷課和罷教是再教育，是展現另類教育之可能。從天安門的民運學生到文大美術系的抗爭學生，他們在罷課活動中仍繼續著民主大學式及小草藝術學院式的自主教育活動，在廣場開放的空間中重新思考教育的內容。這種對自身權益的體認，對教育體制的省思，

以抗爭作為一種教育形式的經驗。這都不是制式教育、考試掛帥的短視教育可能提供的。

因此罷教教師在抗爭活動中的觀念傳遞和對話思考，可以形成對於學生的最佳身教，使學生深切體認到自身的權益不可輕忽，並且在和教師平等交流的空間中形成嶄新的師生關係。

有人或許以為中小學的學生「身心尚未成熟」，因此罷教權應加以限制。持這種論調的人大大的低估了當前複雜的媒體社會對孩子們的催熟影響，更忽略了罷教可以幫助學生自小摒除奴性教育，學習維護自身權益。更何況中小學的教師是教師中的弱勢，他們所受的壓迫和限制也最大，他們的罷教權應該可以為中小學的學生提供最佳最深刻的身教。

如果反對罷教權的人真正地關心學生的權益，那麼，他們應該做的是主動為學生的權益而戰，支持學生的罷課權，而且支持學生爭取參與校務、系務、課務的權利，支持學生發展對教師的教學給分進行評估和考核。唯有這樣，才是真正維護學生的權益。可是，我倒懷疑，當學生真正集結，要求提昇學生權益的時候，這些反對罷教權的人士又會擋在學生前面，推說學生不成熟，不懂事，阻止學生爭取自身的權益了。這種兩面人作法又是什麼樣的身教呢？

惡雨將落

高等教育正在戲劇性的轉變中。

首先，面對甚囂塵上的高學歷失業人口問題，教育部檢討大學人力規劃，決定整合現有過度分化的系所，並凍結或限制公私立院校增設系所的申請。

高教司的看法是，這些具體的策略可以帶動大學院校發展整合性的彈性學程，朝社會需求取向發展，以便應付社會景氣及國家建設的需求變化。不過，在臺灣的社會脈絡裏，這恐怕只是一廂情願的夢想而已。

「整合」是近年來學術界教育界亟欲突破既有思想框架的努力，其目的當然也是尋求對新的社會現實做出相應的新詮釋和新了解。但是，這種整合不是裁併系所，也不是把兩三個看來有點關聯的系所併連在一起，更不是另開一些硬把兩個學術領域湊在一起的課程。

事實上，整合是重新思考並質疑既有的分類方式、組織方式。而整合要撼動的既然是知識的架構，它必然也會撼動我們的世界的架構，而唯有這種徹底的思考革命才可能以前瞻的作為來迎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愈來愈快速的變化。

這種前瞻性的、突破性的思考革命在大多數的案例中是由新的一代、新的思想工作者推動的，因此，任何一個想持續有學術發展的系所學校都必須在雇請師資時考慮到能否定期輸入新血，延請不同思考模式或學術專業訓練的新人。

然而，在臺灣大專學校員額高度被控制的狀況下，想要增添員額就必須靠增設系所；這樣一來，教育政策一方面想有新的突破的教育內涵，一方面卻又凍結新設系所的做法就有點令人費解了。

其實，高學歷人口失業的現象並非來自許多人所說的「學非所用」，而是因為企業及政府沒有在需要高學歷人口的產業領域內投資或投資不足，而這一類的投資正是我們所謂的產業升級。

這樣說來，凍結教育與政府想要達成的產業升級實在是背道而馳的。

教育部的凍結預算措施當然反映了不利的經濟現實，而這些考量也必然會影響到大學的運作與教學。

一九九三年，各國立大學的預算已被大幅削減百分之八到二十不等，各種延攬人才的專案也暫時叫停，增添系所的申請案紛紛擱置，大學的人事也開始緊縮或凍結。教育部甚至通知某些國立大學在三年後必須自行籌措百分之二十的年度預算。

這些政策上的轉變對整個大學教育的運作有極其深遠的影響。最明顯的便是，高等教育將和目前醫療機構由救世濟人的崇高使命感轉向企業化經營的趨勢一般，逐步卸下百年樹人的社會清流形象，而開始談效率掛帥，講市場需求了。

為了要自籌經費，大學首先便得改變它自身的對外關係，它不但要結交企業人士，也必須發展社

區內的人際關係，以便建立一個廣大的、定期的支持基礎，從今以後，大學不但要辦教育，也得搞社交。大學人士的身段與自我定位顯然要做某種調整。

過去許多大學靠著建教合作、短期訓練等措施而籌措到不少經費，在未來財務自理的趨勢之下，大學得動更多腦筋來思考如何把看來與實用沒有直接關聯的知識與訓練，轉化成有利可圖、有錢可賺的事業來經營。在這種脈絡內，愈容易與實務連結的科系便會獲得愈多的重視與資源，這將嚴重影響大學的知識均衡發展。

在這些最明顯的調整過程中，資本的運作邏輯將漸次滲透校園中原來特有的

倫理與秩序，效率與利潤將成為重要基準來判定事物如何進行。一方面，校園的運作不得不與市場機制合拍，因而使得久被隔離塵世的校園更加「融入社會」；但是，另一方面，校園的自主性則面臨另一種力量的壓抑與扭曲。

是的，山風滿樓，惡雨將落。

灌水書

近幾年對消費社會的反思已促使有識之士注意閱讀、寫作及出版形式的轉變。

被消費觀滲透的閱讀以快速消耗為目標，不想（也無力）消化書中可能提供的思想內容。被消費邏輯主導的創作者則力求文句精簡，插畫生動，營造出片片斷斷似乎頗富哲理的閱讀經驗。閱讀材料的出版者則以包裝為第一考慮，外觀要風格化、流線化，書名則獨特化、口號化，以便在眾多陳列中吸引買主。大量輕薄短小、剪輯串接的灌水書陸續湧入書市，更令有識之士憂心，深恐這些營養不良的材料會進一步惡化青少年的閱讀及思考模式。

這些憂慮並非完全無理。灌水書傾向把文句格言化，在精簡或省節的目標下，不是模糊了思想論證的過程，便是把文句抽離了原本做為意義根基的語境，這種真空化的做法使語言空洞化、含混化、片斷化，結果所提供的閱讀經驗多半是膚淺的、輕易的、零散的，對常買此類書籍的年輕學子而言，好處實在不多。

但是有識之士在批評灌水書之餘，也應該思考一下，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使得灌水書輕易打入人心。

灌水書的最大消費，是年輕的學生，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學生們早已在正規教育中透過老師和參考書的重點提示、考試方式的制約等等，學會了片斷式、濃縮事實式的閱讀習慣，要他們做又花腦筋、又花時間的閱讀，恐怕還有點困難。在他們所接觸的大眾媒體中，以視覺刺激為主的音樂錄影帶、簡潔上口的單句廣告口號及眾多影視人物的瞎掰風，無不在在地強化年輕人對灌水書或資訊的吸收能力。

即使對成人讀者而言，灌水書也提供了一定的休閒功能。在一天工作家務的壓力和都市緊張壓縮的生活節奏中，想要排除憂慮和疲勞，好好用心讀一本書、思考一些事情也逐漸成為不可能，任何知性的輸入都得包裝在類似綜藝節目的輕鬆笑談、或新聞節目的清晰畫面中，才可能不費力氣地進入讀者腦中。

面對這個「好書」沒人看、沒人買、沒人出版的環境，有識之士大嘆世風日下，讀者難尋，可是，有識之士卻沒有想過，是什麼樣的資源分配，使得一般人無暇也無力培養看書的心情與環境？這個資源分配的方式卻又同時使得有識之士得以在書房的幽靜中，繼續創作那些已經喪失了讀者的著作與學術。菁英與一般大眾的疏離，是社會資源和知識資訊的不平均分配，也是階層化社會的特色。如果菁英想打破與讀者群眾的疏離，就必須打破階層的區別，也就是改造我們社會資源分配的模式、我們的教育方式、我們的生產和工作的模式等等。當群眾和菁英有相同的教養、閒暇與經濟環境時，他們自然會樂於讀「好書」了。

談人文主義

近年來，有些保守的學者常常主張以人文主義來羈勒科技發展的急進，儼然引人文主義當成人類道德精神及理想的凝聚。在另一方面，美國的保守基督徒（又稱基要派）則把矛頭指向人文主義——特別是「世俗人文主義」——認為人文主義是魔鬼的化身，想要控制美國生活的各個層面，吸引人離開正統基督教信仰。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反應出兩種對所謂的人文主義不同的定義，因此才造成態度上的差異。

這兩方面雖然都把人文主義的來源追溯到文藝復興時代，但是，他們所謂的人文主義已和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相去甚遠。

英文的「人文主義」一字的字源是拉丁文 *Humanitatis*，直譯為人文教育，意指一種教育方式或文化目標，以詩學、修辭學、文法學及道德哲學等科目為中心，主要由佩脫拉克及其後的人文學者推廣，在十五世紀達到最高峰。

一般人以為文藝復興就是佩脫拉克等的人文運動打倒神權主義，得到解放後的成果，事實上，人文運動本質上是一種教育運動，和反宗教的勢力無關。相反地，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運動者幾乎完全

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人文運動的主流傳統更認為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和人類其他活動有同樣的重要性。但是後代的人卻把所有的人文教育者統稱為「人文主義者」，並把現代的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視為十五、十六世紀人文運動的延續，而一概稱為「人文主義」。這種混為一談的做法自然抹殺了原始人文運動中的宗教情操。

「主義」一詞是近代的產物，在一八〇八年以前也根本沒有「人文主義」一詞的存在。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人文教育運動的基本精神是：（一）人的發展為中心目標及（二）希臘文學哲學古籍的發掘、翻譯、研究及模仿為重點；後者又要比前者更為重要及明顯。因此，人文運動和科學的發展沒有直接關聯——科學是十七世紀以後的產物，人文運動和宗教勢力的解體更沒有因果關係。其實，我們現在對文藝復興及人文運動的印象大部分是十九世紀的浪漫氣息和懷古情緒渲染而成的，和事實大有出入。

如果說十五、十六世紀的人文教育運動和宗教沒有多少關聯，那麼，基要派反對人文主義又是出於什麼樣的心態呢？

我們可以用兩方面來看這個傾向。一方面：如果基要派的確是反人文主義，它所反的也只是一九三三年杜威等人的「人文主義宣言」及一九七三年史金納等人的「人文主義第二次宣言」中所代表的「世俗人文主義」，絕非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運動。由於二十世紀的人文主義宣言宣稱宗教信仰就科學觀點而言是不可取的，基要派當然不會喜歡這個論點。此外，現代人文主義者以科學和理性為本的教育主張已深入美國學界，成為美國精神的一部分，排擠了清教精神的原有地位，更不為基要派所樂見。

第二方面：基要派反對人文主義所代表的知識進步，他們不但攻擊現代神學，連中世紀的神學大師阿奎那也被貶得一文不值。凡是不同於他們觀點的，一概是屬魔鬼的。由這個角度來看，基要派是一種僧侶式禁慾主義的狂熱表現，是一種反智主義。

可是，同時我們也看到另外一些反智主義傾向的人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變遷視為洪水猛獸，這些人一廂情願以為人文主義倡導的，是封建社會的人際道德，因此對人文主義讚揚有加，希望人文主義能在現代高度變化的社會中維持原有秩序。

保守派對人文主義所採的矛盾狀態其實並不難理解。一個社會的保守勢力多半以宗教衛道之士或文化固有傳統之說的形態表達；說穿了，都是既得利益團體在面對挑戰和新秩序興起時的自衛行動。

所以，保守人士贊成的不是什麼人文主義，而是既得利益的維持；他們反對的也不是什麼人文主義，而是新與變所帶來的挑戰與未決性。

第十六章

解放師生戀

師生倫理死了？埋了它！

校園強暴案和性騷擾案登上檯面以來，連帶著也使得各級學校師生之間的各種矛盾浮現，於是重建校園倫理之呼聲甚囂塵上，連教育部也開始思考以法規來明令規範校園中的師生倫理關係。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樣的發展呢？

性別的不平等權力問題同時存在於我們社會其他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中，因此，談校園性暴力和性騷擾問題時也必須談師生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同理，反對兩性間的暴力與騷擾，也就意味著反對師生之間的傳統倫理（也就是不平等權力）關係。畢竟，各種不平等權力關係是互相依存著運作的，我們無法想像一個兩性平等但師生不平等的社會，也無法想像一個師生平等而兩性不平等的社會。

以此來看最近的輿論傾向，我們不禁憂心忡忡。原本校園中的師生平等關係（老師透過成績評分來壟斷知識與權力間的聯結）一直被倫理的外衣所美化，使得任何挑戰此一平等關係的作為，如家長抗議學生遭受過分體罰或評分及分班的不公，都可以四兩撥千斤的用「愛之深，責之切」來推拒。現在經由性暴力與性騷擾案的揭發，我們好不容易才動搖了老師的崇高地位，黯淡了老師的神聖光環，暴露了校園也不過只是社會的一部分，而非什麼純淨無慾的莊嚴聖地。我們好不容易才看見了

一絲拆毀老師的倫理優勢，發展師生平等尊重對待的可能曙光，結果卻發現，由教育部到揭露騷擾案的某些學生，大家都嘆息師生倫理的死亡，更急於重新用更嚴謹的規範來扶起傾頹的師道尊嚴。

這種保守倒退的做法事實上只是邀請國家機器的力量進入校園來鞏固教師的形象，以便繼續維持師生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因此也可能間接維持其他的不平等關係，而這種發展對於追求兩性平等的女性主義者而言恐非福音。

揭露校園性騷擾及性暴力案，為我們爭來的不應該是更多的壓抑與更多的規範，而應該是更平等的關係與更開放的互動。為了女性運動的串連發展，我們要追求的，是校園的更加民主化、自主化，是師生關係的平等化、自由化。只有在這些全面的改革運動中，兩性的平等才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反校園性騷擾的運動是一個追求男女徹底平等的運動。很明顯的，師生權力的不平等強化並維持了男老師與女學生的性別不平等，所以，我們也要檢視什麼樣的校園「倫理」造成了「校園性騷擾」。

總之，反性騷擾不是反「性」，而是反騷擾。性騷擾和性壓抑的文化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徹底的反性騷擾因此意味著對抗性壓抑，追求性解放。

反性騷擾也不是反男人，而是反對男人以騷擾、脅迫、抹煞女人自主性的方式對待女人。男老師可以是女學生情慾的正當對象，不必享受什麼神聖高尚的形象與地位。

故而反性騷擾也不是反老師，而是反對師生的不平等權力關係，而且反對男老師利用這種權力對女學生騷擾。

師生倫理死了？原本的師生不平等關係死了？很好！讓我們大家動手埋了它！讓我們營造一個新的、以平等為基礎的師生關係、男女關係。

解放師生戀

隨著大學校園性騷擾及強暴案的聲浪擴大，某一種保守甚至開時代倒車的文化氣氛也正在形成，這種氣氛正把爭取女學生權利的運動成果，轉化為不利女學生權利、不利於男女平等的規範準則。

例如，由於男女平等的時代潮流，過去那種「男女授受不親」的兩性隔離做法已經在校園逐漸消失，男女同班同校，異性師生大方地相處說話，都已成事實。可是如果因為近來校園事件而使異性師生不再能坦然無顧忌的交流，不但使女學生受教機會低於男學生，也會使某種歧視女學生的暗流得到正當的藉口。

由於有心人把校園強暴及性騷擾和師生戀混為一談，連帶著似乎師生戀也變成一種不明說的禁忌，這和五四以來自由戀愛的歷史潮流正相違背。在目前校園性騷擾的揭發下，若能更明白徹底地解放師生戀、正常化師生的交往，將對促進女學生權利更有幫助。簡單的理由有二：

第一，在師生戀並非禁忌的狀況下，男老師和男同學在做為情愛對象上並無不同，女學生對於男老師也比較不會再有那種天真的「非性」看法，比較不會再將老師視為有某種神聖光圈、可崇敬依靠、或完全信賴的權威。男老師只是另一個男人，另一個可能愛戀女性但是也可能傷害女性的男人。

這樣一來，當女學生和男老師互動時，女學生更能警覺及維護本身的權益。

第二，自由戀愛應以雙方平等為基礎，這和不平等的師生權力是相矛盾的。因此，師生戀的正常化可迫使師生權力重新調整，否則糾紛將層出不窮。現在各校除了設立性騷擾申訴管道外，還應同時設立分數成績申訴管道，使個別老師不能再憑己意操縱分數的生殺大權。

在上述擁贊師生戀正常化的兩個理由背後，還蘊藏了一個「後」現代的教育理念。現代教育的目的其實是要讓人們覺得彼此都是平等而無差異的國民，所以在校內唯一被認可及凸顯的身分認同是「學生」，校園內的關係也只化約為師生關係。至於性別、性偏好、族群、階級等認同則被壓抑或隱而不見，因此潛藏的性別歧視或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均被壓抑下去。現在校園性騷擾的議題總算使性別這一身分凸顯出來，而「師生戀正常化」這類開放進步作法可使性別平等有助於師生平等，而在平等的師生關係下，會較難壓抑其他各種形式身分認同的浮現，這便會促進各種身份的平等。

有些人認為在師生戀關係中，師生權力既然不平等，女學生容易在師生戀中吃虧受害或處於弱勢，因此校園中不應開放師生戀。

但是這種說法忽略了現今社會中戀愛男女經常處於比師生更不平等的上下層級關係中，可是我們不可能禁止一切女性處於弱勢的愛情關係。單單質疑師生戀的說法，其實還是把「老師」看作一種特殊神聖的身份，還是把校園當作「聖地」，而這當然是因為教育是國家的重要意識形態機構，需要神聖光環之故。

或曰，為什麼不積極建立某種教師的專業倫理規範呢？這豈不是較簡單方便的做法嗎？一旦規範

設立後，大家各守其分，校園便恢復了平靜，豈不甚好？不過，歷來專業倫理規範的建立，莫不是藉著共識的營造及道德形象的投射，來鞏固專業權力的宰制。現在校園性騷擾案好不容易才動搖了教師傳統父權的權威，專業倫理或某種「自清自律」運動則將有彌補教師神聖或道德形象的作用，也就是強化師生的不平等權力關係，其結果則是終究導致性別及其他身分認同逐漸又隱而不現。

總之，站在女性主義女學生及弱勢身分（像原住民學生、同性戀學生、工農子弟、邊緣學生等）立場上來看，校園反性騷擾論述應當擴大連線，一方面和公司、工廠等社會上的反性騷擾聯線，另方面則要改變師生的不平等權力。

師生平等才是一切校園倫理的基礎，為了改造校園倫理，反性騷擾論述必須揚棄保守的「抓色狼以保處女」之類的形象，而和前衛的、進步開放的情慾文化結合，解放師生戀就是一種積極的提法。

師生戀

由男教授強暴女學生案引出師生的話題之後，媒體間一面倒的言論都在談如何防範師生戀，認為這種說法可以「保護學生的權益」。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種說法造成什麼實質的效果。

師生戀論述中的學生總是被描述為軟弱無力，輕易因為壓力而屈服，事後還只能忍氣吞聲的人。這種認為學生沒有思辨能力，沒有自我主張的說法，其實也常被用來證明為何學生無權參與校務課務，不能像一般國民一樣享受充分的人權。其實，學生表現出來的無能無力，極大部分來自我們教育制度所本之傳統人倫規範，所謂師生間的倫常關係正是一個極端不平等的上下宰制關係。因此，反對師生戀，只不過是防範老師對於這個不平等關係的濫用，並沒有根本挑戰或拆解這個不平等關係。相反的，以目前情勢的發展來看，這種論述反而有可能強化另一種不平等關係：教育單位對教員言行的監督與控制。

另外，師生戀論述一貫假設當事人是男老師和女學生。因此，學生軟弱無力之說也包含了對女性的歧視設定。正式因為我們社會中有大量論述描繪女人為軟弱被動的、必須為名節而息事寧人的，因此才會有那麼多女人眼睜睜的任人侵犯而無法想像自己有力抗議或反擊。女人對自我能力沒有期望、

沒有信心，更沒有機會鍛鍊施展，又如何能在突發事件中冷靜應變？因此，反對師生戀的說法有可能複製這個軟弱小女生的主體位置，對女學生的長遠發展而言，不見得全然有利。

有關師生戀的論述還有可能產生另一種效果，那就是，它有可能剝奪女學生求知的權利。雖是人平等的教育環境，但是目前大學的師資以男性為大多數，故而男同學常常因其性別而得到很大的方便，他們可以和老師在課外自由討論而不必顧忌，他們甚至可以和開朗的老師一齊喝啤酒聊天，稱兄道弟，在自在的氣氛下受到入室弟子式的薰陶。反觀女學生，本來上課時就不受重視，有些理工科的男教授甚至公開表明不屑回答女生問的問題。現在，在師生戀的恐懼瀰漫校園之下，即使非色狼的男教授們也戒慎滿心的面對女學生，對她們的求知求學來說，恐怕不是有利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學校不但可能有色狼男教授，更有一大批不善於或不願意和女學生打交道的男老師，他們無意識中對女學生的歧視或規避，現在在避嫌師生戀的藉口下得到正當化，這也不是女學生所樂見的。

師生戀之所以惹眼是因為它涉及了師生與男女兩組平等關係的交集。因此，對於師生戀的考量或討論，也應以改變這些不平等關係為目標，而不是更嚴厲的規範（也就是鞏固）這些不平等關係。

〈附錄〉

文章出處索引

頁碼	文章	發表時間	發表刊物
第一章 情慾解放			
14	性探索：多做少說的七〇年代	1994.3.18	中時人間
19	誰來說性	1993.3.6	中時人間
22	性，不危險……	1993.12.5	自立早報新人文版
27	打破處女情結	1994.6	貴族雜誌
30	女身女性	1993.6.28	自立早報新論壇
33	性感的女人	1993.11.5	中時人間
35	新女「性」三則	1991.8.16	中時人間
39	性解放的政治／卡維波 女「性」解放是反對勢力的重要環	(未發表)	
50	節	1994.3.9	自立晚報 3 版
第二章 情慾自主			
54	前言 「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情慾	(未發表)	
56	人權	1994.5.25	聯合報民意論壇
58	性解放教育從小開始	(未發表)	
60	臺灣情慾文化貧瘠	1994.5.27	聯合晚報 3 版
62	大聲說我要	1994.4.27	中時人間
65	我們女童	1993.12.17	中時人間
67	陳淑樺・陶晶瑩・性	1991.1.26	中時人間
第三章 家庭主婦／母親			
74	不「偉大」的母親，萬歲！	1994.5.8	聯合報副刊
77	懶女人	1993.9.24	中時人間
79	脫軌的女人	1992.12.9	民眾日報副刊
81	一餐一菜	1993.8.13	中時人間
83	私房錢	1992.11.5	民眾日報副刊
85	袋鼠媽媽喊救命	1992.5.1	聯合報家庭版
第四章 同性戀			

頁碼	文章	發表時間	發表刊物
90	同性戀拒服役	1994.2.3	聯合報民意論壇
92	異性戀霸權退出校園、媒體	1993.12.30	聯合報民意論壇
94	假開明與同性戀	1993.12.10	中時人間
96	阿比阿弟的秘密	1991.6.12	自立早報副刊
第五章 婚姻			
102	一面倒的專家	1993.12.3	中時人間
105	試婚	1993.9.3	中時人間
107	不婚 (未發表)	1994.3.6	自立早報新論壇
110	解「毒」婚姻		
112	為什麼你應該同居而不要結婚	1994.4	美麗佳人
第六章 愛情			
116	速食愛情其實很快樂	1994.1	貴族雜誌
120	不再與青蛙接吻	1993.1.22	中時人間
122	天長地久	1993.9.17	中時人間
124	分手總在當兵後	(未發表)	
第七章 女人・男人			
128	女人好吃？	1993.1	婦女新知
133	男人好色？／卡維波	1993.3.26	中時人間
135	<何德何能>的兩性狂想	1992.5.21	民眾日報鄉土文化版
139	星期五的男人	1991.5.24	中時人間
142	「星期五」與善良風俗	1993.6.25	中時人間
144	女廁	1991.3.8	中時人間
第八章 專業與性別			
152	為什麼大廚都是男人？	1993.6.11	中時人間
154	專業與性別	1993.7.9	中時人間
156	專業的積累	1993.8.20	中時人間
158	穿什麼上班	1993.6.4	中時人間
160	中年就業	1993.1.15	中時人間
135	電話簿與專業主義	1993.1.1	中時人間
第九章 資本			
166	想要飯碗就少吃飯	1991.4.19/20	中時人間

頁碼	文章	發表時間	發表刊物
171	誰的智慧？誰的財產？	1993.4.16/30	中時人間
174	論自主性消費	1987.5	南方雜誌第七期
183	環保必須控制資本	(未發表)	
第十章 階級・性別			
186	鄉鎮公車族	1993.3.5	中時人間
188	金錢與性	1993.11.19	中時人間
190	讓勞工說自己的故事	1993.6.12	臺北縣勞工暨勞工子女文學創作比賽得獎作品輯
194	弱勢者沒有財產權	1993.11.12	中時人間
第十一章 國家			
198	「激情」過後	1993.10.1	中時人間
200	大爺受辱記	1993.8.27	中時人間
202	選舉	1993.11.26	中時人間
206	我們沒有(國)家	1991.2.13	中時人間
210	知識／權力：誰在養小孩？	1993.2.4	中時人間
212	反社會主義還是反國家崇拜？	1994.7.15	自立早報副刊
第十二章 文化觀察			
220	原鄉不遠	1991.6.7	中時人間
222	什麼人唱什麼歌	1990.11.12	中時文化觀察
225	臺灣漢堡	1990.5.14	中時文化觀察
228	司迪麥與豬哥亮	1990.12.24	自立早報副刊
231	天堂一瞥，邪教烏托邦	1990.9.17	中時文化觀察
第十三章 電視媒體			
236	誰怕大陸女星	1993.6.19	中時人間
238	為何檢查電視？誰在檢查？	1990.4.26	自立早報副刊
242	金泡的幻滅	1990.2.16	自立早報副刊
第十四章 生活環境			
248	今天別呼吸	1993.4.2	中時人間
250	無車階級的權益	1990.12.20	中時意見橋
252	馬路如虎口，行人沒處走	1993.3.19	中時人間

頁碼	文章	發表時間	發表刊物
254	核電異形	1993.5.28	中時人間
256	吹哨人	1993.10.29	中時人間
第十五章 教育			
260	誰與成年人立約？	1993.7.15	中時人間
262	學生上電視	1993.2.19	中時人間
264	無教有類？	1990.7.16	中時文化觀察
267	校園民主（未發表）		
270	罷教也是一種再教育	1994.6.11	聯合報民意論壇
272	惡雨將落	1993.9.10/12.24	中時人間副刊
275	灌水書	1990.8.17	中時開卷
277	談人文主義	1984.1.27	美洲中國時報
第十六章 解放師生戀			
282	師生倫理死了？埋了它！	1994.5.16	自立早報副刊
285	解放師生戀	1994.4.25	聯合報民意論壇
288	師生戀	1994.3.27	聯合報民意論壇



爭取不受 壓抑的自主權

性別壓迫不是一個空泛籠統的概念，而是具體的社會組織方式與角色資源分配。在倡導“女性解放”，爭取“兩性平等”之前，必須先了解女性在現今社會的處境。臺灣的性別政治不但呈現父權制度的本土面貌，更勾連了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運作邏輯來塑造我們的性別角色。《不同國女人》以淺顯易懂的文字探究本土父權體制的物質基礎，指出階級壓迫和性別壓迫的密切關聯，深化我們對性別壓迫的理解和抗爭。

ISBN 957-596-319-9 (544.507)



00250



9 789575 963194